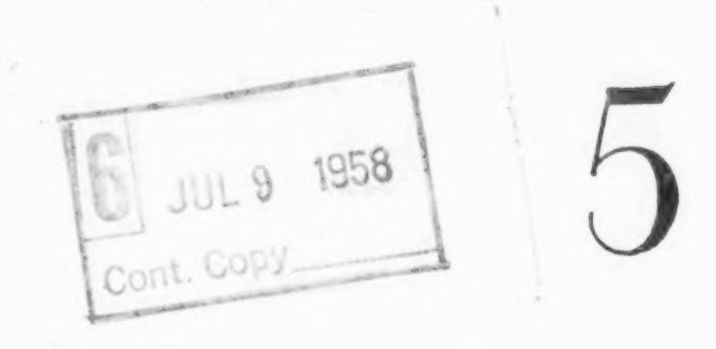




5

1958

世界歷史参考圖片（二十八）

意大利文艺复兴



圖一　彼得拉克。采自万·德·米尔："西洋文化圖譜"，頁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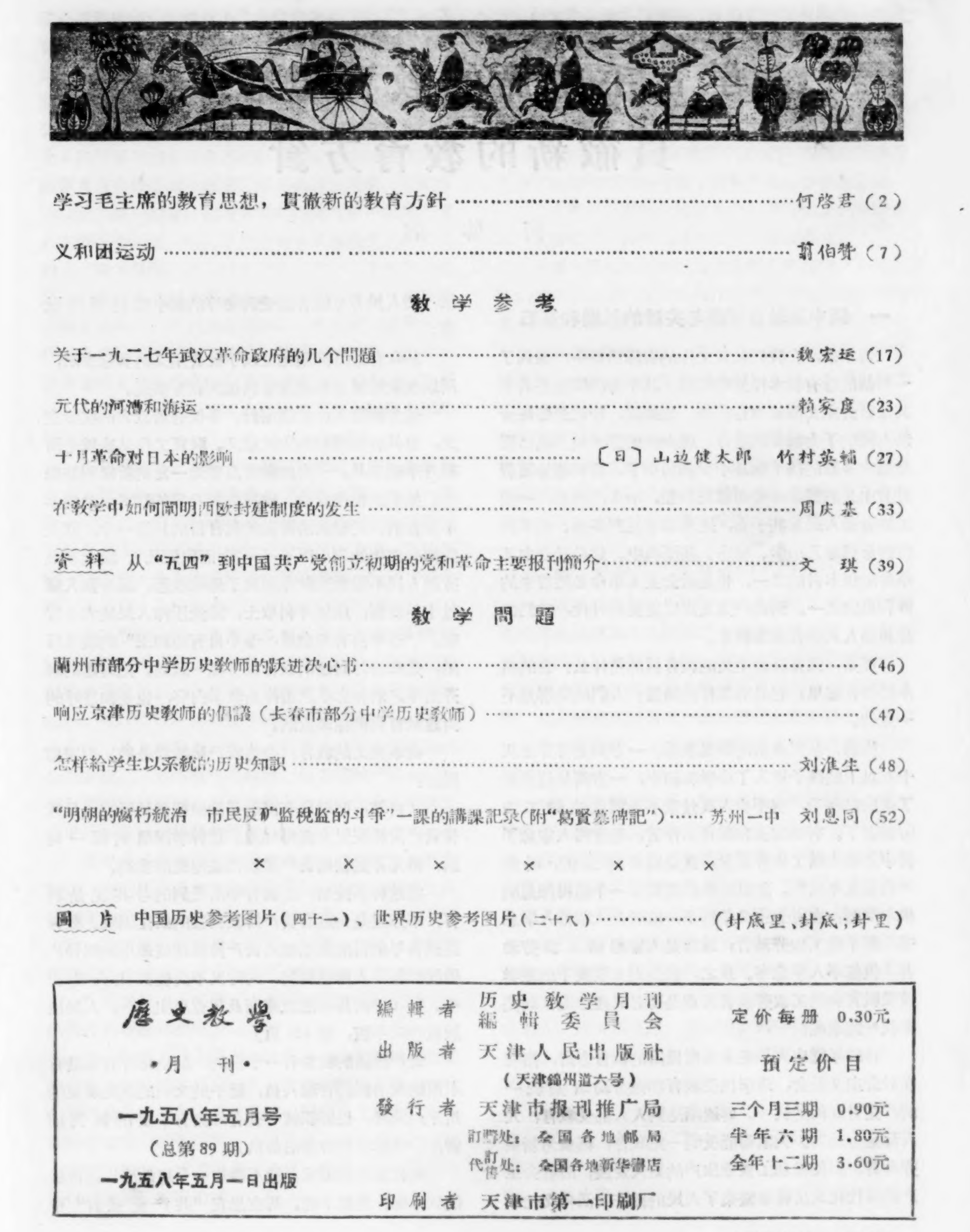
圖二　波伽丘。采自万·德·米尔·"西洋文化圖譜"，頁 128。



圖三　摩西雕像。米开蘭基罗杰作。采自万·德·米尔："西洋文化圖譜"，頁 132。



圖四　中世紀晚期的屍体解剖。采自日丹諾夫："解剖学家达·芬奇"，頁37。



教 学 参 考

教 学 問 題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八年五月号

（总第89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 輯 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出 版 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 行 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閱处：全国各地郵局

代訂代售处：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 刷 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001——27,450

学習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貫徹新的教育方針

何　啓　君

一　新中国教育理論与实踐的总綱和基石

近年来，在我們教育工作的实际活动中，遇到了一些新的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其中有的問題在若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比如說，新社会要使劳动人民的子女都受到教育，現在我国許多城市就已經是絕大多数的孩子能进小学和初中了，这种趋势随着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愈益加强。不久的将来，一般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子女，逐漸能够达到多数、大多数直到全部进入小学、初中、甚至高中。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帶来的胜利果实之一。到共产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我們的理想是人人要受高等教育。

可是，究竟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它的根本任务在哪里？它具有怎样的特質？人們的見解是不一致的。

当前，从天津市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孩子进入了小学和初中，一方面是这些进了学校的孩子，有不少人反过来不再願意去做工农劳动者了。有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覚得人家念了初中还要去做工农劳动者，这是說不过去的，叫做“白費九年功”。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根本問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者是大家都入学念书，都不做工农劳动者；或者是大家都做工农劳动者，但都不入学念书。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进学校受教育和当工农劳动者究竟是要对立起来呢？还是要統一起来呢？

1957年党中央、毛主席所提出的教育方針，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进学校受教育和做劳动者是統一的，是对立面的統一。要逐漸达到人人都受教育，人人都是劳动者。大家都能受到一定教育，都成为新型劳动者，以便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而社会生产的現代化又反轉来繁荣了人民的經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使人民有可能普遍受到初等的和中等的学校教育。

新教育方針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实际生活，所以也就能够正确地指导我国的教育实踐。

这个教育工作的指南針，不仅有着巨大的实际意义，也具有極深刻的阶級意义。教育工作从来就是阶級斗爭的工具。一定的教育总要为一定的阶級利益服务。抽象的脫离政治、脫离阶級斗爭的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統治阶級的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訓練有文化的大小臣子——“学而优則仕”。讓大多数劳动人民不能受到教育而处于愚昧狀态，讓少数人經过十年寒窗，以便开科取士，选派压榨人民的大小官吏。“书中自有黃金屋，书中自有顏如玉”的讀书目的，是和当时封建的教育任务相一致的。把封建的修齐治平之术和忠孝之道作为教学內容，也是和当时的封建教育目的相适应的。

資本主义的教育，是为資产阶級服务的。列宁指出过：

“自然，旧时所有浸透了阶級精神的学校，只能使資产阶級底兒女获得知識。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无非是根据資产阶級利益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学校里，工农青年所受到的与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为迎合資产阶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資产阶級造成适用的奴仆，他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6頁）

資产阶級的教育有一个目的，就是培养有知識有本領的政治經济管理人員，能干的文明的剝削事业的爪牙；同时，也要訓練一些有知識有本領的被剝削者，一些馴从的劳动后备队。

社会主义的国家，能不能来一个超政治、超阶級的教育呢？当然不能。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說：“难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会来决定的么？难道它不是由你們借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么？”我們的教育方針、目的与任务，內容、方法与制度，都必須以工人阶級的利益为依据，从而也就是要为人民整体利益而服务。我国当前工人阶級利益和全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之一，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和发展教育这两件事統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要把劳动和讀书統一起来，把劳动者和讀书人統一起来。使人人都是劳动者，同时这些劳动者又都是受过教育的新人。毫无疑問，要实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偉大理想，要做到人人都是劳动者，而这些劳动者又都是受过教育的新人，我們就必須肯定一条原則，讓世世代代的人民子弟又讀书又劳动，是讀书的学生，同时又是未来的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不这样行不行？不这样，就要損害工人阶級的事业，損害人民的利益。

馬克思在写資本論的时候，曾表述过他对未来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張。他講道：“未来教育——……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兒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类的方法。”（“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91頁。）

馬克思的时代，当然并沒有社会主义教育的实际，但他已經从理論上做出了科学的預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預言过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类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可以明白，馬克思所講的“全面发展”，其中心含义乃是人的智力和体力，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二者的統一与結合。馬克思对“未来的教育”所繪制的藍图，正是我們今日在社会主义实际生活中所不断出現的眞实情景。

党中央根据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的建設需要和教育实践，根据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原則，給我国教育工作指出了一个極为正确的方針，这就是：“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澄清了我們过去在学校教育方針問題上各色各样的爭論和解釋。

这一教育方針的特点和优点，是十分明确而扼要地肯定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培养劳动者。这种劳动者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同时又是有文化和身体健康的新型的劳动者。也就是說，是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結合，或者說是“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劳动者。

对于中、小学校来說，今后在一定时期內，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入学和升学；另一方面也有大批学生在毕业后不能升学，要去参加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农业劳动。但，不論是升学的和不升学的，实际上早晚都要成为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社会主义生活的客观規律。我們不能因为升学与不升学的暫时差别而弄錯了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的。

毛主席所指出的今后教育方針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阶級意义，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

我国人民在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不断地发生着和解决了許多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应当去进行理論性的概括和凝煉，以便在新的教育实践中书写我国新的教育理論。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教育方針，是我国新教育学的总綱和基石。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繼承了并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学說。这一教育方針的确定，使我国教育工作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党中央領导下，必將斬荊劈棘地去实現教育工作的偉大創举，把我国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峯。

二 政治是学校教育的統帅和灵魂

为着認眞貫徹这个教育方針，很明显的，学校教育的政治思想工作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首先必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必須实行勤工儉学、加强劳动生产教育；还必須提高文化科学知識的教育；几者要密切結合又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才能把教育工作做好，才能眞正培养出大量的合乎我們所要求的劳动者。

列宁認为脫离生活、脫离政治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資产阶級的謊言和虛伪。他說：“应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养現代青年的全部事业，都成为在青年中养成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2頁）

我們所办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着强烈的党性、阶級性。我們要使一切受教育者，都是忠于人民事业的共产主义者。要教育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成为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澤东的优秀学生，他們是把能够为全人类幸福而貢献自己的一切，当作自己最高的幸福。

实际上，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岁之間的青少年时期，是人的黃金时代，是一生的关鍵时期。在这个期間，随着身体的发育，人的品格、思想逐漸趋向成熟，可塑性很大，可变性很大，最易于受到外界影

响，一切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都容易感染他們。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資产阶級思想依然存在，这就像大量新鮮空气中仍含有某些細菌而人又不能不去呼吸一样，学生常年常月从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时时刻刻感受一切好坏影响。好学生可能变坏，坏学生可能变好。

从中世紀，就有些教育家怀疑过孩子是否眞的像一張白紙，絕对簡单，大人随意写上些好格言，就可以黑字落在白紙上，不会更改。早先有人提出过，孩子不似白紙，乃是一株幼芽，可以长成一棵有用的美材，也可以歪歪扭扭的不是材料。

現在，中、小学生数量極大。他們毕业以后要成为社会主义各种事业的接班人，所以他們的思想观点和道德品質的好坏，确实可以說会影响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繼承和发展，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之命运。

近来，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教导，在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有重大的創造。我們新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課，是我們党在中国教育工作上極其英明的創見和創举。

我們在中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課，有課堂講解、正面教育，又有生动活潑的学生討論、辯論和参观訪問。講課，是有的放矢，理論联系实际，以解决学生中实际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并且在立場、观点上树立正确的工人阶級思想，破除所受到的种种資产阶級思想影响。这样就对于教师，对于政治課的講授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教师深入地了解学生，了解学生內心的活动；要求講課能針对学生的实际观点，有所为而发。要求有說服力，能够講清道理，說明事实，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如果，我們只有教师的講課，是很不够的。現在我們的实际工作里出現了种种形式的討論、辯論，这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好方法，是以学生集体的力量，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与探討而取得正确認識的方法。学生經过其亲身的努力而获得的眞理，是他們一生也不容易忘記的。經驗已經証明，这是能够解决学生大量实际思想問題的重要方法，是在学生政治教育中适当运用群众路綫的好方法。

当前的政治課，由于改进了課堂講授，又增加了不同形式的討論和辯論，所以大大增强了教育效果，大多数学生已經非常喜爱和重视这門課程了。

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須通过各个途徑来进行，特别是阶級性、党性最强的历史学科，更要加强阶級观点、劳动观点、无产阶級立場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教育，必須經常注意适当地同当前国家生活与阶級斗爭的实际相联系。学校不能是个教育的孤島。列宁就反对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的脫节，他說："我們將不相信教学、教养和教育了，假如把它仅仅圈在学校里，而脫离了狂風暴雨般的生活的話。"在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学校是关門办学的。由于大部分中、小学校是二部制教学，学生在校內受教育的时間只不过占其全部时間的四分之一。于是学校教育怎样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配合起来，便特别値得我們抓紧研究了。比如，請电台給学生广播很好的教育节目，讓学生經常好好收听，这就是解放前人們所講的电化教育吧！其他如給学生放映好电影，体育場館要向学生开放，以及学校要經常向家长提出教育的要求并实行互相协作等等，都是需要努力做好的。

总之，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应当以政治領导，以政治教育为紅綫而貫穿起来。应当时时記住党对我們的教导：政治是学校教育的統帅和灵魂。

三　新任务与新途徑

新的方針、任务，要求新的教育內容和制度方法。中央指示我們：应当根据生产和教育相結合、理論和实际相結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的原則，进一步改造我們的教育，有步驟地实行勤工儉学的教育制度。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凡是有条件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实驗工厂、实驗农場和实驗牧場的，都可以单独举办或联合举办，一面从事教育，一面从事生产劳动。不能举办的，可以同当地的工厂、作坊和服务性行业訂立生产实習合同，进行实習，或者定期参加当地的义务劳动和农业合作社劳动，使学習和劳动相結合。

对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这种要求，完全是馬克思主义的。这里对于教育工作提出的原則是"生产和教育相結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是"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从事生产劳动"，是"使学習和劳动相結合"。好極了，这是典型的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人們知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是馬克思主义最初的和最基本的公式之一。而"生产与教育相結合"、"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从事生产劳动"与"使学習和劳动相結合"，則是馬克思和列宁对"未来教育"的最重要的遺訓。

馬克思根据一份英国"工厂视察員的报告"指出这个报告中的材料証明了，以教育与体育結合于体

力劳动，是可能的，以体力劳动結合于教育与体育也是可能的（“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90頁）。接着他又說：“工厂視察員在听取学校教师的証明以后，发覺了工厂兒童，与正式日校学生比較，虽只受了半数时間的教育，但学得的东西是一样多，且往往更多。”（同前引书）

馬克思認为勤工儉学，把教育和体力劳动結合起来，是一件可能的事和極其重要的事。他以为人类的未来，再也不应当有劳心者和劳力者的根本性矛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应当逐步达到全面发展。就是說，人們能够把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統一起来，結合起来。因此馬克思主張在学校訓練过程中，就不能給学生以片面的訓練，而应該从思想上、体力上、智力上和技能上进行全面的訓練，使学生能够受到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凝結在一起的教育和鍛煉。

这样做的結果，是否会降低学生的質量呢？馬克思做过研究，他很注意視察員报告中所說的如下的情况：

“他們虽只半日到校，但他們时时覺得新鮮，并且几乎时时准备并且願意接受教訓。半时間劳动半时間受教育的制度，使工作与教育交互成为休息和鼓励。这种制度，比之在工作与教育之中，繼續不断做其中的一項，是于兒童更适合得多的。”（同前引书）

这种情况，使馬克思又把另一种情况拿来两相比較，进行分析。他引用了西尼耳在1863年的一段演說：

“他曾說明，上層及中層阶級兒童之单方面的不生产的和長时間的受业时間，徒然增加教师的劳动。”（同前引书，第591頁）

一种学校实行勤工儉学，另一种学校毫无体力劳动，一味長时間地讀书、听講、作題；哪一种效果好些？馬克思認为生产与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視察員报告里，还有一小段，也引起了馬克思極大的注意，有一个人当时提出了如下的見解：

“我确信，产生一个优秀工人的眞的秘訣，是从幼年期起，將劳动和教育結合。当然，工作不能太重，不能太繁，不能太不衞生。”（同前引书）

馬克思經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又参照别人的观察和分析，他对“未来教育”作出了天才的論証，并繪成了最早的藍图：他主張一切青少年的教育都要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他以为这不只可以增加社会生产，而且是唯一的使人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的途徑。

列宁坚决主張要把学校当作消除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立的工具。他曾說过：“不依靠青年一代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結合，未来的社会理想是不能想像的。”他指出学校教育中，如果只有脫离生产的教学，就和只有体力劳动而沒有学習一样，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国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党中央、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要培养学生成为新型劳动者的方針任务，也提出了实现这一方針任务的基本途徑，就是要实行勤工儉学的教育制度。这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說在中国当前条件下的具体运用。由于到现在为止还沒有其他国家的很多成熟的經驗可仿行，我們必須以極大的毅力去进行严肃的創造性的努力。这件事不只是教育史上的新单元，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篇章。

有的人怀疑这是否行得通。答案是肯定的。1946年，延安“解放日报”曾以較長篇幅介紹过当时华中解放区的小学教师夏陶然的教育經驗，那就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統一起来的經驗。夏陶然的办法，曾受到劳动人民的热誠拥护，取得極大的成績。夏陶然的办法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办法。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曾比較普遍地把教育和生产甚至和战斗結合起来。

也有人担心这是否会使学生質量降低下来。要看是什么質量，什么标准。即便是片面地以智力发展作标准，許多实踐經驗証明，只要我們安排得好，也是可以提高的，而且学生在劳动中获得了許多关于人文、社会与自然方面的实际知識。至于要从品德、習慣、思想意識和身体健康各方面来綜合地衡量教育質量的話，則勤工儉学的教育制度更要有无比的优越性了。勤工儉学搞得好就可以促进教育与生产結合，理論与实际結合，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結合，它不但富有深刻的政治教育意义，而且有健康教育和智力教育的意义。所以，今后評定学生好坏的标准，不只是看文化科学知識（当然这是極重要的方面）还要看他願不願意当劳动者，以及是否在智力和体力、思想政治和生产劳动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艰苦鍛煉与学習；評議学校的好坏，評价校長与教师的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要看他們在通过学校逐步消除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矛盾的教育工作方面，取得了多少成績和經驗。

四　奋发努力，大大提高文化科学的教学質量

苏联的小月亮，已經升上了天，我們的文化科学

水平还要有一番極其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准。这一方面要靠工业生产的跃进和科学家們的努力；一方面也要靠学校教育的不断革新，不断提高。

我們前几年，在教育工作上取得了不小成績，学生的文化知識有了显著提高，今后要毫不动搖地堅持下去。同时，在我們面前已經提出了許多新問題，許多新的奋斗目标，要求我們去創造、去做好。

在天津市的普通中、小学校里，我們看到人文学科的教学工作，还存在着缺点。比如中学語文課去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脫离实际、脫离政治的缺点；汉語課有些繁瑣，也有許多不大切合中国实际的地方；历史課也有思想性貧弱和理論結合实际不够的缺陷。現在大家正在积極改进着。

可是，几年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脫离政治的歪風不小，人文学科在某些中学是不被重視的。我們应当扭轉这种風气。中、小学校都要重視人文学科的教学工作。

在培养有高度文化的新人时，人文学科具有極大的价值。比如語文課，是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手段，是通过文学講授与閱讀使学生扩大生活視野、正确認識生活的手段，是使学生好好掌握祖国語言文字的手段。这一門課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我們必須从課內課外多方面来重視它，改进它。現在我們既要注意不能使語文課脫离政治、脫离生活，同时也要防止語文課等同于政治課；既注意給学生一定的必要的文学知識，同时要着力加强关于学生的閱讀、书写、造句、写作、辞章、文理的基本訓練。我們不能設想，一个不会好好写字、不能好好閱讀、写的文章毫无章法、文理不通的学生，怎么能够說他有好的文化程度。可是，当前我們中、小学生中这样的情形，眞不算少。人民群众对于普通学校教育質量有意見，首先就是指的这些地方。

历史教学，必須認眞改变厚古薄今的缺点，改正为历史而历史的缺点，历史教学要为当前政治而服务。

我們中、小学教育中的人文学科，首先是語文学科、历史学科，实在应当用力跃进一步。

必須看到，改进和加强自然学科的重要意义也更加大起来了。美国科学的主要部門落后于苏联的原因之一，美国人自己說是他們的教育制度不如苏联。美国人抱怨美国的許多中学，沒有数、理、化、生物等自然学科；其他一些学校虽然有这些学科，可是时数少，質量次。从这里联想到我們中、小学的自然学科教学工作，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飞跃前进，有着多么大的关系！我們中、小学里的自然学科的比重很大，教科书的水平不低。問題是我們普通教育工作者应該如何加强教学領导，提高教学質量，改进課堂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自然学科的教学，应当在联系生产实际，在注意实际应用方面，进行巨大的創造和改进。

比如說，中学的化学課，要对当前国家化学工业建設特別需要的章节，进行突出的講授；要适当增加关于化学应用的某些可能的补充材料，比如关于化学肥料及杀除害虫等实际知識。

又如物理課，要把同我国当前农业机械改良有关的一些基本知識講給学生。生物課，就要把有关除四害、消灭农业病虫害以及改良种籽等种种实际知識，更多地、更好地教給学生。

数学，也应当增加在实际生产中常用的运算部分。自然要防止完全弄乱基础知識的系統性的作法。

总归一句話：中、小学的自然学科的教材和課堂教学，必須要适当地跳出現有的书本限制，必須面向全人民奔騰的生活，面向劳动生产，使学校教育更好地为生产服务。这样得向教科书編写部門提出改編教科书的要求，也向省市教育部門提出了編写地方性的輔助教材的要求，同时又向学校和教师提出了不要等待，自己先动手干起来的要求，这都是客观形势所要求的。

現在，党中央、毛主席吹起了号角，新的战斗任务到处开始了。万馬奔騰，洶涌澎湃、排山倒海的革命的巨風大浪波及全国。一切的人，一切的角落，都要变化，都要革新。我們普通教育工作者必須迅速跨上新的战馬，奔向新的目标，刷新我們的工作！讓普通学校教育在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針指导下，开始一个新阶段，跃向一个新高峯！

一九五八年，二月写。

义和团运动

翦伯贊

一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这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发生在1900年。这一年是戊戌变法（1898年）以后的兩年，中日战爭（1894年）以后的六年，中法战爭（1885年）以后的十五年，太平天国革命（1850——64年）結束以后的三十六年，鴉片战爭（1840年）以后的六十年。

这个时期，从世界史发展的进程来說，資本主义已經进到了帝国主义阶段①。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开始的夺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或者說分割世界的斗爭，已經大体完成；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并且已經发生了为了世界的再分割而进行的战爭。发生在十九世紀末叶的西美战爭（1898年）正是这种性質的战爭。

西美战爭是以美国的胜利而結束。在义和团革命爆发的兩年前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了古巴、波多黎哥、关島和菲律賓。虽然直到1902年美国还要保留六万以上的軍队鎮压菲律賓人民的武裝反抗，但基本上它已經有了可能把关島和菲律賓当作跳板爬上亞洲大陆，特别是中国。不过美国来得比較迟一些，当时中国的大門已經被欧洲的一群帝国主义强盗所把守，因此这个迟到的美国不得不向英、俄、法、德提出要求，要求它們开放中国的門戶，讓它也能进来掠夺中国。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年，英国正集中三十万以上的軍队在南非进行征服布尔人的战爭，在这个战爭中，英国遭遇到布尔人的英勇抵抗，一直到1900年九月，才压服布尔人有組織的抵抗。

德国对于布尔人的南非共和国也很感兴趣，德皇威廉第二希望布尔人击敗英国，替德国在南非保留一塊可以插足的土地，因此，当布尔人抵抗英国第一次襲击而获得胜利的时候，威廉第二，曾經向布尔人表示祝賀，在义和团爆发的那一年，德国似乎还企图暗中接济布尔人。

对布尔人的土地感到兴趣的不仅是德国，还有俄国和法国。1899年俄、法、德三国曾經联名照会英国，希望英国停止对布尔人的进攻。

当时在非洲大陆进行侵略活动的，还有意大利和法国。从1895到1896年意大利正在东北非洲进行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战爭，不过这个战爭是以侵略者的慘敗而結束。1896年意大利被埃塞俄比亞人打得大敗，二万五千名軍队被歼灭在非洲，兩員上將变成了埃塞俄比亞人的俘虜。

当时的俄国正向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东北伸出魔手，并且已經侵入了中国的东北。列宁在1900年所写的“中国的战爭”一文中曾經严厉地譴責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他說：“它(指俄国)在几年前就毫无私心地夺取了旅順口，現在又毫无私心地夺取了滿洲，它毫无私心地使与俄国毗連的中国区域駐滿了自己的大包商、工程师和軍官，这些人底行为竟使以温順著名的中国人也非常憤慨。”②

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沒有碰到清王朝的抵抗，但是它碰到另外一个侵略者日本的打击，同时也引起了英国的嫉視。为了对抗日本与英国，俄国与德、法締結了“远东三角同盟”，英日两国为了抵制俄国，也締結了“英日同盟”。显然在爭夺中国的土地与权利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着極其复杂而尖銳的矛盾。

世界的分割大体上已經完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砲口都对准中国，虽然它們之間也有或大或小的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8頁。

② 列宁：“中国的战爭”，“列宁斯大林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頁。

矛盾，但对于瓜分中国则是它們的共同願望，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的国际形势。

二

从中国历史的进程上来說，这时的中国已經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强盜們看来，当时的中国甚至已經不能称为一个国家，只是一块可以分割而尚未被分割的土地而已。

說当时的中国沒有被分割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正像列宁所說的：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經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們开始不是公开地瓜分，而是像窃賊一样鬼鬼祟祟地瓜分”①。

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日战争以来，腐敗的清王朝已經在一联串的丧权辱国的条約中，使中国遭受了不断的分割与凌辱。在这一时期中，不仅邻近中国的一些国家已經先后被帝国主义国家征服，属于中国的很多沿海的島嶼：香港、琉球、台湾等也先后被帝国主义国家霸占。很多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如广州、厦門、福州、宁波、上海、南京、天津、营口等城市也在“租界”和“开商埠”的名义之下，变成了帝国主义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仅仅在1898年三月到四月一个月中間，中国就丧失了膠州湾、旅順、大連、威海衞、九龙、广州湾这样多的地方，这不是瓜分是甚么呢？

帝国主义的侵略替中国帶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大机器工业，特别是商品傾銷，打碎了中国的手織机，摧毁了中国的手紡車，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經济所固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結合，使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沿海沿江地区的社会和它原来的古代傳統与全部过去历史斷絕联系。但是正像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②

为了这样的目的，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要依照它們剝削的目的来改变中国，另一方面又要为了它們剝削的方便而要尽量保留并利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对于它們有利的陈腐的东西的妙处，使中国永远落后，永远成为繁荣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正像馬克思論“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所說的：“丧失了旧世界而沒有获得新世界”③。

这样的情形当然要替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帶来悲慘的境遇，巨額的战爭賠款④，愈来愈重的苛捐杂稅⑤，外債⑥、內債⑦，这一切負担最后都落到农民身上。再加上地主的殘酷剝削，高利貸者的盘剝，和严重的天灾，特别是黄河接連决口，靠近黄河的直隶、山东的許多村落連同这些村落的人民都被洪水冲刷而去。其他各地的农民也因为丧失了土地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⑧。

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城市手工业工人也陷于破产的境遇，他們最后的出路，也是加入流民的队伍。又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鉄路和扩張沿海的航运，使得原来从事于水陆运輸的工人，特别是运河沿岸和京汉北段的运輸工人几乎全部陷于失业的境遇。

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已經有了資产阶級，以孙中山为首的資产阶級革命派并且有了自己的組織兴中会，但力量很脆弱，不能担負起自己的政治使命。至于以李鸿章、刘坤一、張之洞等为首的官僚資产阶級，则帶有买办的性質，他們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此外以康有为、梁啓超为首的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敗以后，已經墮落到保皇主义的泥坑。

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夕，掌握中国政权的是以慈禧

---

① 列宁：“中国的战爭”，“列宁斯大林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頁。

② 毛澤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622頁。

③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24頁。

④ “馬关条約”中規定的賠款数目为二万万兩，另外还有所謂“贖辽款”三千万兩，要在四年內分期付清。

⑤ 甲午战爭以后，清政府所征收的苛捐杂稅比以前更为繁重。从1895年以后，有增厘金、折漕米、土药、茶叶、糖、盐、烟、酒的加稅，田房稅契的驗照，以及其他各种捐輸等等。

⑥ 清政府在甲午战爭以后，在1895——1899年的五年中間，共借用外債七次，总計数目为白銀三万七千万兩。

⑦ 清政府为了償付“馬关条約”中所規定的对日賠款的第四期款項，于1898年决定发行內債，名曰“昭信股票”。每股銀一百兩，发行总額一万万兩，年息五厘，以田賦盐稅为担保，分二十年还清。見“东华續录”光緒朝，卷142。

⑧ 清德宗实录，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丁巳諭軍机大臣等：“糧价昂貴，較光緒二年加倍，……饑殍枕藉，餓斃在途，目前如此，經冬徂春，何堪設想。”

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这个保守派是由一些满洲貴族和死硬頑固的官僚組成的集团，为了要把中国牢固地放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这些保守派就死死抓住这个王朝。他們拒絕任何最起碼的自由要求、最表面的改良要求、以及最形式的立宪主义要求，并且把这种要求当作危險加以反对。但是他們对于帝国主义的任何要求，却不折不扣予以承諾。他們不惜把中国的土地当作礼物一塊一塊地送給帝国主义以延續他們可憐的統治，这种情形就正像恩格斯所說的“在他們看来，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要值得多些”①。

帝国主义的侵略愈来愈瘋狂，瓜分的危机愈来愈严重，阶級矛盾愈来愈深刻，而清王朝的統治愈来愈腐敗，愈保守，愈反动，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的国內形势。

三

义和团就是爆发在上述的国际形势和国內形势之下的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它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帶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傳統——宗教迷信。这种現象，表現在它的組織形式上，表現在它的宣傳鼓动的方式上，也表現在它的革命信条上。

大家都知道义和团是从白蓮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出来的②，而白蓮教就是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农民的秘密結社。义和团在組織上就是繼承八卦教的形式，例如八卦教是按照具有神秘意义的八卦来編制它的队伍，义和团也是如此。同时作为它的信条之一的素食，显然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宗教意識③。特别是它崇拜很多的神灵，还有各种符术和咒語④，更是充满了宗教色彩的表現。

許多資料記載着义和团的諸神。他們几乎把他們所知道的一些小說——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滸傳、西游記、七俠五义等——中的人物，都奉为神灵当作崇拜的对象⑤。在他們崇拜的諸神中，有些是历史人物，有些是神話人物，有些是自然神，也有道教的神和佛教的神。

义和团之所以把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安置在自己的祭壇上当作神灵来崇拜，当然是宗教迷信；但必須指出，在这种宗教迷信的背后，却隐藏着現实的革命狂热。因为他們之所以喚起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作为神来崇拜是希望把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的身上，使自己更有力量来击敗他們的穷凶極惡的敌人，使他們在战斗中造成奇迹。用馬克思的話說：“是为了贊美新斗爭，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斗爭；是为了提高某一任务在想像中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現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讓革命的亡灵重行游蕩起来。”⑥

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在革命的危机时代，人們往往“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裝，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裝，說着这种借用的言語，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場面”⑦。

很多資料記載着义和团的宗教仪式。他們在神的面前庄严地虔誠地宣誓，表示他們对革命的忠誠和胜利的确信，表示他們坚决服从不搶劫不姦淫的革命紀律，表示他們和洋人战斗到底的决心⑧。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和团并不是用宗教引导人們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們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經失去的現实世界，

---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頁。

② 劳乃宣：“义和拳教門源流考”，“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第四册，第433——439頁。

③ 刘孟揚：“天津拳匪变乱紀事”云：“（拳民）不茹葷，避妇人。”見“义和团”第二册，第9頁。

④ 义和拳咒語很多，大半用以加强战斗意識，如云：“弟子在紅塵，閉住搶砲門，搶砲一齐响，沙子兩边分。”見“义和团”第四册，第152頁。

⑤ 管鶴：“拳匪聞見录”云：“拳‘匪’附身神号，多出封神、西游諸書，或尋常寺院塑像，为乡愚所習知者。”見“义和团”第一册，第468頁。又柴萼：“庚辛紀事”云：“东省义和团，創始于嘉庆时，尊三国志、封神傍、七俠五义中人物为之神。”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04頁。佚名：“天津一月記”云：“团中設神牌甚多有姜太公、諸葛亮、張天师、关圣、周倉、孙行者、黄天覇、馬武等，入壇者先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見“义和团”第二册，第142頁。

⑥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224—225頁。

⑦ 同上書，第223頁。

⑧ 袁昶：“乱中日記殘稿”云：“（入团者）立意先吃素，最怕妇人冲，不准搶掠爱財。……見洋人呼曰大毛子，見教民呼曰二毛子，見則立时法上灸，神气抖擻，势將吞噬，若必杀而后快者，縱有搶砲，亦不知退惧。”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46頁。又佚名：“天津一月記”云：“入壇者先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老师戒之曰：‘毋貪財，毋好色，………灭洋人，杀贓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見“义和团”第二册，第142頁。

鼓舞人們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

义和团抱着禁欲主义，也是很自然的。恩格斯說："在帶着宗教色彩的一切中世紀騷乱中，甚至在近世一切无产阶級运动期初期中，我們已經看出这些运动的先驅者抱着禁欲主义。这种行动上的朴實，抛弃一切人生享乐的主張，使斯巴达平等的原則和統治阶級对立。另一方面必須有一个过渡阶段，沒有过渡阶段則社会最下阶層决不能发生一种运动。为发展革命的力量計，为了解自己对于社会一切其他分子之对立的地位計，为团結成为一个阶級計，社会下等阶層必須从抛弃使他們对于現存社会制度发生妥协的一切事物做起。可以使他們降到忍辱負重的卑賤地位以获得的一切享乐，甚至为最大压迫所不能剝夺的一切享乐，都不可不抛弃之。"①

义和团之所以奉行禁欲主义，也和他們的先驅者一样是农民朴質生活的抽象化，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留恋享乐而忍受压迫，忍受自己的卑賤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生活方式对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堵住和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那种罪惡的現实生活，发生妥协的漏洞，从而建立敌对的意識。

义和团就是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宣傳与鼓动，通过这种禁欲主义的教条，在革命一触即发的社会中进行宣傳鼓动和組織的活动，它的活动很快就在农民群众中煽起了原来就蘊蓄着的仇恨的火焰。"在实际上——正像恩格斯所說的——只有猛烈的努力和立时抛弃一切現存的習慣形式，才能够把无联絡的散处四方的农民，而且是在盲目服从中生长的农民，引到統一的运动。"②

义和团的骨干分子是农民，但卷入这个运动的不仅是农民，而是中国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破落下来的一切被压迫的貧穷的人民，其中有鉄匠、船夫、佣工等雇佣劳动者和手工业者，有叫卖商人，也有下層知識分子教书先生③。还有大批无业游民，如像被当时統治者指为土棍、无頼、散兵、游勇、盐梟、馬賊、乞丐、賭徒、走江湖的、被釋放的囚犯、妓女之类的人們④。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非世俗的人們：和尚、道士、喇嘛等等参加进去⑤。

在它后来的发展中，还有武举、廪生、士紳、官吏等不少剝削阶級中的坏分子参加进去⑥。

在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以后除了大批城市游民加入义和团，还有統治阶級的上層人物如世家、貴族、王公、貝勒等参加进来⑦。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爭"，生活書店1947年版，第58頁。

② 同上書，第59頁。

③ 包士杰："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二云："杀刘四家之拳匪，有后門釘补刘，是个小爐匠。"又云："方磚厂瓦匠之子"王福也参加了义和团。佐原篤介："拳乱紀聞"謂义和团首領之一張德成是白溝河的船戶。見"义和团"第一册，第219頁。艾声："拳匪紀略"謂定兴"大溝拳民王洛要，……初为北河水手。"見"义和团"第一册，第459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五云："昌平县西关外人楊貨代者，在和尚灣村馬家傭工，他学了义和团。"

佐原篤介："拳事杂記"云："有王佐臣者，向在天津一帶，以卖膏药为生，……在侯家后壇上为大师兄。"見"义和团"第一册，第274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六云："拳匪中有个姓梁的，是教書先生。"

④ 柳堂："宰惠紀略"云："即以惠民先后'正法者'而論，孙玉龙、梅鴻女，皆混也，王催仔、王雨仔、赵長命仔，人販也，盐梟也。……張黑小，馬賊也；……李芳同、王正南、于爾仔，亦土棍也。"見"义和团"第一册，第402頁。按"宰惠紀略"的作者是一个封建官僚，对义和团的紀录含有極大的敌意，但也反映一些事实。佚名："天津一月記"云："傳聞天津土棍王茉，在城內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設壇聚众，无業游民紛紛往投。"見"义和团"第二册，第141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二云："杀刘四家之拳匪，有金剛圈，是个乞丐；金禿子，亦是无業乞丐人。""拳乱紀聞"云："紅灯会首仙姑二名，……傳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过二十余岁。"見"义和团"第一册，第189頁。

⑤ 蔣楷："平原拳匪紀事"云："共党有和尚、有道士。………其人，皆外来，其中多游勇。"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56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四云："鯉魚溝喇嘛庙的喇嘛，巳竟当了拳匪。"

⑥ 佐原篤介："拳乱紀聞"謂有武举某参加义和团。見"义和团"第一册，第113頁。支碧湖："續义和拳源流考"云："阜城廪生刘蔭梧、景州附生魏書香投拳負固，屡与官軍抗。"見"义和团"第四册，第443頁。

吳永："庚子西狩丛談"謂有士紳参加义和团，謂之香客。見"义和团"第三册，第389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八云："文安正堂王廷寿居然在衙門里設壇招練义和拳。"

⑦ 佐原篤介："拳乱紀聞"云："又聞滿洲貴族世家，入于义和团者甚众，王公、貝勒等，并亦允为保护。"見"义和团"第一册，第114頁。

在个别的地方，甚至还有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某些教徒中的敗类也混进了这个組織。

显然，义和团内部的阶級成分是非常不純的。这些各种复杂分子加入义和团各有他們的目的；但他們的目的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农民是要通过这个斗爭来反对帝国主义和依附帝国主义的封建官僚地主的压迫。手工业者是希望通过这个斗爭挽救他們的破产的命运。至于游民的目的大半是为了趁火打劫。

在另一方面地主官僚参加义和团则是为了躲避农民的鋒芒，保护自己的財产，甚至还想混水摸魚傍火打劫。世家貴族、王公、貝勒的参加，則是为了篡夺农民軍的領导权并企图利用农民軍的力量来实現自己的政治目的。至于打进义和团的教徒中的敗类，則是替帝国主义充当偵探。

阶級成分不純是义和团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剝削阶級中的分子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不用說，他們是义和团的敌人，随时随地都准备从义和团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来瓦解义和团。就是游民也“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当中最坏的‘份子’”①。

这就是义和团宣傳組織和阶級成分的大概情形。

四

义和团是一个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所以他的鋒刃一开始就集中地指向外国侵略者，指向洋人。

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者洋人的斗爭中表現为一种偏狭的排外和仇視教会，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中国农民还不可能認清外国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本質，他們所認識的外国侵略者只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先鋒队，即那些深入中国大小城鎮乃至穷乡僻壤的傳教士，这些人也正是直接压迫他們的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因而他們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爭集中地表現在反对教会的斗爭中，是合乎邏輯的。

义和团仇視洋人，仇視傳教士，仇視教徒，仇視一切媚外者，二毛子，三毛子，即使帶有偏狭的性質，也不如帝国主义所宣称的是“黃种人仇視白种人”，是“中国人仇視欧洲文明”。关于这种帝国主义的叫囂，列宁在“中国的战爭”一文中已經加以痛斥。列宁說：

“是的，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甚么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們和欧洲人民并无冲突，他們是憎恶欧洲資本家及对資本家馴服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賺錢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贊頌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騙、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获得販卖毒害人民的鴉片权的人（1856年的英法对华战爭），那些伪善地以傳佈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們嗎？”②

列宁的話是完全正确的。当时中国人民反对的洋人就是那些掠夺和迫害中国人民的欧洲資本家、騙子、流氓、杀人犯、鴉片販子和披着道袍的帝国主义的急先鋒基督教的外国傳教士。难道这些坏蛋还不应該反对嗎？难道反对这些坏蛋就是“仇視欧洲文明”嗎？难道“欧洲文明”的代表就是这些坏蛋嗎？

然而当时的帝国主义者却認为中国人民应欢迎这些坏蛋，应該像死屍一样躺着讓它們宰割，“而当这个假想的死屍試图反抗的时候，他們就像对待野兽一样向它猛扑，燒毀整个村落……搶虜和殘杀手无寸鉄的居民及其妻兒”③。

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者洋人，特别是傳教士，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又本能地帶有反封建的性質④。它一开始就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⑤，最后的口号还是“扫清灭洋”⑥，只有中間曾經一度受清王朝的欺騙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爭”，生活書店1947年版，第176頁。

② 列宁：“中国的战爭”，“列宁斯大林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頁。

③ 同上書，第18頁。

④ 蔣楷：“平原拳匪紀事”云：“总署函电交馳，乃令吉观察与統領东字正軍馬参將金叙往，……計誘朱紅灯、本明和尙，致之省。起出私書数十函，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語。”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61頁。

⑤ 同上書云：朱紅灯旣冒称明裔，和尙又号本明，蓋援王郎、韓林兒故智。”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60頁。又支碧湖：“續义和拳源流考”云：“朱洪登（即朱紅灯）自言明裔，夢游闕里，見宣圣，为詔切方至吾代。”見“义和团”第四册，第443頁。

⑥ 章太炎：“駁康有为論革命書”云：“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則知扫清灭洋矣。”

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①。假如因此就以为义和团不反对封建的清王朝，甚至認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的农民和清王朝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那就是大大的錯誤。

資料証明，当义和团最初出現在山东的时候，它就被清王朝当作社会安宁的仇敌，当作最可怕的阶級敌人而加以剿灭②。袁世凱就是屠杀义和团的最凶恶的劊子手③，被帝国主义認为"縱容"义和团的毓賢，也沒有放过任何屠杀义和团的机会。山东义和团的首領朱紅灯、本明和尚、郜玉环都是毓賢杀死的④。

清王朝是企图把义和团扑灭在它的发祥之地山东，但义和团不但沒有被扑灭，而且在血的屠杀中胜利地开辟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不久就以暴風雨的形势从山东往西席卷了整个河北⑤，最后进入天津和北京。

当义和团进到北京附近的时候，清王朝还企图把它歼灭在涿州涞水一帶⑥。只有当它派遣它的重臣剛毅、赵舒翹等偵察了义和团的虚实以后，它才感到要歼灭义和团已經是太迟了⑦。一直到义和团出現在清王朝的皇宮周圍，清王朝才改变策略采取欺騙手段⑧。清王朝知道，假如这时还不改变策略，它将坐困于为数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的义和团民的包圍之中，而其結果就是这个王朝的統治被粉碎。

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經驗和閱历而又非常頑固狡猾的老太婆，她的实际本能教导她怎样在不得已的时候压制自己，而在这种压制沒有必要的时候，她的本能又教导她怎样用加倍的殘暴收回由于压制自己而受到的损失。当义和团已經分布在她的宮殿圍墻周圍的时候，她知道她应該把她的劍暫时插入鞘內，并且裝出笑容。

也許有人以为慈禧太后为了洋人干涉她的廢立陰謀，她也恨洋人，因而义和团反对洋人恰恰符合了她的最秘密的內心活动，所以認为她和义和团"合作"是有誠意的。誠然，在廢立的問題上，慈禧太后是不滿意帝国主义的干涉的，但是如果要利用义和团来反对帝国主义，那就必須眞正地武裝义和团。然而，她知道如果眞正武裝义和团，那会替自己制造很大的危險，因为武裝义和团就等于武裝农民、武裝革命的队伍，就等于武裝自己的阶級敌人；她也知道义和团战胜帝国主义者，同时也就等于战胜中国的地主阶級及其政府的靠山，战胜清王朝，战胜她自己；她自己都不能存在，还能談到甚么廢立問題呢？因此消灭义和团运动的决心，慈禧太后一刻也不曾动搖，她和她的徒党可以发誓，他們要对抗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义和团，是中国的农民。資料証明：一直到义和团逼近北京，她的上諭还是要"相机剿办""严行懲办"⑨，只有当义和团进了北京，在她上諭上才出現"剿撫兩难"⑩的詞句。慈禧太后对于义和团的态度难道还不

---

① 蔣楷"平原拳匪紀事"云："（光緒二十五年）时高唐茌平間，嚣然不靖矣。……（教士）并言'拳匪'橫行，揭有山东巡撫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61頁。

又支碧湖："續义和拳源流考"云：及朱（之友）楊（和尚）事敗伏誅，东省余党竄直隶景故間，……自称神兵，立方帜，書'扶清灭洋'四字，号于众。"見"义和团"第四册，第443頁。又包士杰："拳时杂录"載順天府宛平县"齋堂川齐家司馬欄村坎字团"的告示有云："教習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見"义和团"第四册，第148頁。

② 清德宗实录，光緒二十四年十月諭："著張汝梅加意彈压"。

③ 佐原篤介："拳事杂記"云："袁中丞治匪亦峻，得見匪即槍斃之。与諸軍約云：'如匪至即放砲，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击，則將領以下概正法'云。"見"义和团"第一册，第254頁。

④ 蔣楷："平原拳匪紀事"云："（毓賢）聞新撫部（袁世凱）二十四日上事，前兩日提朱紅灯、本明和尚出，斬之。……而撫部批牘所称，会首郜玉环者，又前斬于兗州。"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62頁。

⑤ 柴蕚："庚辛紀事"云："未几，即日盛一日，强年壯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壇，始大張义和拳旗号。嗣后从者益众，北三省几于遍地皆是。"見"义和团"第一册，第305頁。又楊慕时："庚子勦匪电文录"云："义和拳党，直隶西北境上，几于无处不有。"見"义和团"第四册，第342頁。

⑥ 楊慕时："庚子勦匪电文录"云：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示諭涿州至定兴鉄道旁各村"……如勘实某村某庄在会，叛迹昭彰，即以大兵勦杀尽淨。"見"义和团"第四册，第337頁。

⑦ 叶昌熾："緣督廬日記鈔"云："五月十三日，聞赵展如（舒翹）尚書归至涿州，不能前进。據其从人云：甫出彰义門，拳民即列队郊迎。"見"义和团"第二册，第442頁。

⑧ 李杕："拳禍記"載五月三十日諭旨云："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日之內，京城蔓延已徧，其众不下数十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兩立，勦之則禍起肘腋，生灵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⑨ 清德宗实录，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壬寅、癸卯諭。

⑩ 清德宗实录，光緒二十六年五月甲子諭。

明确嗎？不可想像一个对改良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人，会有誠意和农民“合作”。

必須指出，一直到义和团圍攻使館的期間，慈禧太后还是通过她派到义和团內部的亲信控制义和团的活动①，并保留向洋人投降的余地②。資料証明，慈禧用以圍攻洋人的軍火是鉄鍋碎片制的砲彈③，甚至是木彈④，但是偷偷送进东交民巷的却是眞正的火葯，还有西瓜和蔬菜⑤。这就說明了她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还是向东交民巷暗送秋波。

慈禧太后对于义和团可以說陰謀暗算，无所不用其極，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显示了她的“卓越”和“机智”的政治手段。可是在帝国主义的面前，她就表現出可惊的无能与卑賤。但这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她知道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如果她要保持“老佛爷”的称号，她不得不俯伏在帝国主义强盜的馬靴前面。

不可否認，义和团是受了清王朝的欺騙与愚弄，但它并沒有因此就放弃对外国侵略者的斗爭。資料証明，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頑强的斗爭。他們在天津和北京等地都向洋人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在廊房附近，曾經击退由英国海軍中將西摩尔所統率的增援北京的联軍⑥，在天津圍攻“租界”⑦，在北京圍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庫天主教堂⑧。甚至在清王朝投降以后，他們还在“扫清灭洋”的口号之下进行了兩年之久的武裝斗爭。

五

义和团运动很快就震动了世界，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奥国、意大利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軍队，从遙远的海外先后开到了中国，它們联合一起，向中国举行瘋狂的进攻。历史上称这次的帝国主义侵略为“八国联軍之役”。

这些帝国主义軍队攻占大沽砲台，攻占天津，最后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德軍首領瓦德西跑进了仪鸞殿，被称为所謂联軍統帅。

八月十四日，是帝国主义联軍打进北京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北京这一座曾經是义和团控制过的庄严的城市，就在帝国主义强盜們的血腥屠杀中变成了人間地獄。可以說这些强盜們以北京从来沒有遭遇过的侮辱侮辱了北京。

要叙述这些帝国主义强盜們的罪惡行为，那就要求我們回到一千多年前的阿提拉的时代，当时帝国主义联軍統帅瓦德西“向派往中国的官兵講話，公开地号召他們（洋兵）要那样制裁中国，就是要使中国人像歐洲各族人民，有一个时期紀念匈奴和他的領袖阿提拉名字那样地紀念着德国的名字”⑨。

所有的帝国主义强盜們，都回到一千多年前的时代。他們和阿提拉的軍队同样的不动声色地大批杀人，同样殘忍地屠杀那些沒有参加过斗爭的人，包括妇女与兒童在內；所不同的是阿提拉的軍队沒有机关槍把居民成群地槍杀⑩。同样的白日放火，燒毀民房，

---

① 包士杰：“拳时上諭”云：“义和团民紛集京師及天津一帶，未便无所統属，着派庄亲王載勛、協办大学士剛毅統率。”見“义和团”第四册，第127頁。

② 畀永：“庚子西狩丛談”載慈禧自白云：“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轉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眞正由他們尽意的鬧，难道一个使館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見“义和团”第三册，第438頁。

③ 包士杰：“拳时北堂圍困”，第24頁，樊主教日录。

④ 洪寿山：“时事志略”云：攻打西什庫日教堂时“有用圓木而充炮丸者”。見“义和团”第一册，第91頁。

⑤ 樸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館被圍記”云：“昨日又有一公文来，亦庆王領銜，所言仍系不能行之事，予等又有一公文复之，言予等居此甚为舒服，不过稍需蔬菜及水果而已；故今日有四車西瓜蔬菜送来，并言系奉太后之命，西瓜剖視，業已紅熟，想甚甜美，蔬菜亦甚鮮柔。”見“义和团”第二册，第300頁。

⑥ 李杕：“拳禍記”，第84——86頁。

⑦ 佐原篤介：“八国联軍志”，“义和团”第三册，第191頁。

⑧ 樸笛南威尔：“庚子使館被圍記”，“义和团”第二册，第242頁。又洪寿山：“时事志略”，“义和团”第一册，第91頁。

⑨ 苏联·鮑爵姆金主編：“世界外交史”第三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153頁，引用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外交大臣標洛夫所著“回憶”一書中的話。

⑩ 樸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館被圍記”云：“（北京城陷时）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內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攙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槍向之，適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槍即轟击于陷阱之中，約击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見“义和团”第二册，第358頁。

把整个村落燒成灰燼；所不同的是阿提拉的軍队沒有說这是"文明"①。同样的搶掠住民、洗劫商店和皇宮；所不同的只是阿提拉的时代沒有使館，不能把脏物搬进使館来公开地分赃，而且公使占有最大的一份②。同样的姦汚妇女以取乐，包括他們借口要保护的信奉基督教的妇女；所不同的只是阿提拉的軍队沒有說这是保衞基督教③。

当这些帝国主义强盜們一塊一塊地撕碎中国人民的肢体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統治者已經逃跑了；从北京經太原，一直跑到西安。跟着慈禧太后的逃跑，清王朝的軍队也毫无抵抗地向后撤退④，他們把北京、天津及其附近的城市和农村交給四万多名帝国主义的强盜軍队去掠夺。在这个紧急时代，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群逃亡者他們躭心的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外国的追兵和投降的接洽，当然也躭心他們窖藏的金銀宝物和来不及帶走的嬌妻美妾。至于北京、天津等地人民的被屠杀、姦汚和洗劫等等，在他們看来，乃是对于义和团所犯的"罪惡"应有懲罰。如果說北京的消息后来也有些使他們伤心，那是因为他們听到了自己的房子被焚燒，自己的家庭被洗劫，自己的亲戚被杀死，自己的妻妾和女兒被姦汚；而对于慈禧太后来說，則是八国联軍的統帅瓦德西跑进了仪鸞殿。

当时以張之洞、刘坤一等为首的洋务派的态度怎么样呢？他們是异口同声地欢呼帝国主义的每一个胜利；他們都很高兴看到义和团所受到的每一个打击；他們都很沉着地望着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强盜切为肉泥而視若无覩。他們認为自已在当时的唯一政治使命是加强"东南互保"替帝国主义死守着长江流域的陣地⑤。

当时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买办阶級的态度怎么样呢？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們向清王朝建議要它对义和团"格杀勿論"⑥；又替帝国主义組織"东南互保"⑦；还建議派袁世凱出兵配合由大沽登陆的八国联軍夾攻义和团⑧。

当时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态度怎么样呢？这些兩年前的改良主义者，現在已經变成了專制王朝的拥护者。他們痛恨义和团，認为清朝的上諭"不称团匪而称团民"是"不成国体"，是"自取复亡"，是"激外自杀"；他們还嫌八国联軍太少，要"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⑨。

当时一般的官僚和紳士的态度怎么样呢？当联軍入京，义和团还在城門和街巷抵抗的时候，他們已經扯起了降旗，穿好了朝服，匐伏在大街兩旁迎候联軍的队伍⑩。第二天早晨，很多朱漆大門上都出現了用

---

① 献县天主堂鐫印："圣教史略"云："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軍势力圈內，往来巡梭，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論官衙民居，遇則焚毁，往往全村遭劫。"又"瓦德西拳乱笔記"亦云："（自塘沽至北京）凡軍队行經之地，但見其一片凄凉荒廢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燒搶之劫而大受破坏。失所流离之民，据估計約有三十万人，但实际上似或多于此数。"……又云："沿途房屋未經被毁者極为罕見，大都早已变成瓦礫之場；……从大沽經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綫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見"义和团"第三册，第18、29頁。

② "瓦德西拳乱笔記"云："联軍占領北京之后，曾特許軍队公开搶刼三日，其后更繼以私人搶刼，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在英国方面，……所搶之物，均須繳出，一齐堆在使館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級高低，加以分派。"見"义和团"第三册，第31——32頁。

③ 劉孟揚："天津拳匪变乱紀事"云："（天津）河东一帶，时有洋兵强姦妇女情事，他处亦有之"，"某日，駐津之洋兵开往独流鎮……即將該鎮焚毁大半；居民死伤者，妇女被姦者，不計其数。"見"义和团"第二册，第48、55頁。　又佐原篤介："拳事杂記"云："（在北京）联軍尝將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賤老少，尽驅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經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軍人等入內游玩，随意姦宿。"見"义和团"第一册，第268頁。强姦教民妇女事，見樸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館被圍記"（"义和团"第二册，第342頁）。

④ 洪寿山："时事志略"云："武衞軍聞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三十里）之遙，而早遁也；旗兵神机、虎神等营，聞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貓也。"見"义和团"第一册，第92頁。又吳永："庚子西狩丛談"云："扈从兵士为神机、虎神兩营，其余尚有武衞軍，顧皆零落散漫无統紀，蹩躄而行，饑憊不支，惟肆强掠。"見"义和团"第三册，第407頁。

⑤ 1900年七月八日"申报"載"中外互相保护章程"，見"义和团"第三册，第536頁。

⑥ 盛宣怀："愚齋存稿"卷三十五，"寄北京榮中堂电"。

⑦ 同上書，卷三十六，"寄李中堂、劉峴帅、張香帅电"，見"义和团"第三册，第332頁。

⑧ 同上書，"义和团"第三册，第341頁。

⑨ 康有为：庚子六月六日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引自"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71頁。

⑩ 狄葆賢："平等閣笔記"卷一，第2頁。

各种洋文写的保护单①，还挂着洋人用过的破帽、破靴、垢衣、旁袴，表示他們从来就是洋奴。在联軍到处杀人、放火、姦淫、擄掠的时候，这些官僚士紳們竟毫无廉耻地替联軍送万民傘德政匾冒用群众的名义歌頌联軍的"功德"②。

当时地主阶級的态度怎么样呢？这些农民的敌人他們把联軍当做自己的救星，而把自己当作联軍的鷹犬。过去曾加入过义和团的一些地主这时也翻了脸，为了他們的阶級利益，他們不惜背叛祖国替联軍征发粮食和各种軍需品，替联軍充当向导去捉拿曾經参加过义和团的农民③。义和团的首領之一張德成就是被靜海县王家口鎮的乡紳醢为肉醬；另外一个首領曹福田則被靜海县的地主切成肉泥。

当时的士大夫的态度怎么样呢？他們之中有些人替洋人写布告④，有些人和洋人一塊飲酒吟詩⑤。还有一些人爭先恐后去参加瓦德西举行的考試，从洋人領取奖金⑥。但是他們从洋人得到的奖金和荣寵，如果和賽金花比較起来，还是相形見絀。

清王朝的首脑人物都逃跑了，地主阶級分子都叛变了，游民无产者大部分变了节，始終站在保衛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綫上，堅持抵抗斗爭的只有堅强不屈的英勇的农民和失业工人。

当时中国的农民对八国联軍不是逃跑，而是迎头痛击；不是迎降，而是坚决抵抗；不是背叛自己的民族祖国，而是至死不屈的为了保衛自己的民族祖国而英勇地战斗。在北京失守的前一分鐘，他們还在东直門和朝陽門一帶与联軍肉搏⑦。在联軍侵入保定的途中，他們曾經予以迎头痛击⑧。当联軍侵占張家口的时候，他們在英勇的战斗中，击斃了德国的統兵官約克伯爵⑨。就是被敌人俘擄了的义和团民，也是宁死不屈。被囚禁在天津監獄中的兩个女团民甚至使得那些图謀去强姦她們的几个法国强盗兵也不得不說："就在她們的絕望中，也有一种尊貴的風度泛濫出来，使人不意会地感到肃然。"⑩这些堅强的、英勇的、庄严的男女农民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兒女，是我們后代的最好的榜样。

六

不論义和团怎样頑强地抵抗，它終于在清王朝可耻的欺騙与出卖和帝国主义强盗的联合进攻之下失敗了。当然，它本身的許多严重的缺点，如像極端的地方分散性，流寇主义，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与領导，特别是阶級成分不純等等，也是它失敗的因素。义和团虽然失敗了，但它用血和火的文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最光輝的一頁。

北京、天津、通州、保定和其他城市与村落，到处都是中国人民的死屍⑪。帝国主义很高兴看到这些死屍，在它們看来，这不但是义和团的絕灭，也是中国的消灭。

現在帝国主义强盜开始研究懲治中国的方案，这就是所謂"辛丑条約"。由于义和团的教訓以及帝国主义相互之間的矛盾，这一次賠償不是用土地来計

---

① 柴蕚："庚辛紀事"，"义和团"第一册，第332頁。
② 孙葆賢："平等閣笔記"卷一，第2頁。又"瓦德西拳乱笔記"，"义团和"第三册，第133頁。
③ 柳溪子："津西毖記"，"义和团"第二册，第94頁。又叶昌熾："緣督廬日記鈔"，"义和团"第二册，第469頁。
④ 华学瀾："庚子日記"（稿本），七月二十六日記。（原稿藏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⑤ 华学瀾："辛丑日記"，第2頁。
⑥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四，瓦德西考試書院生。亦見"清季野史"卷二，第11頁，王无生："述庵秘录"。
⑦ 柴蕚："庚辛紀事"，"义和团"第一册，第313頁。又佐原篤介："拳乱紀聞"，"义和团"第一册，第162頁。
⑧ 佐原篤介："拳乱紀聞"，"义和团"第一册，第194頁。
⑨ 同上書，謂約克伯爵系中煤毒而死，第262頁。
⑩ 法国·畢耶尔洛諦："庚子外紀"。
⑪ 佐原篤介："八国联軍志"云："（北京城破）华人死者甚多，街上屍骸枕借。"見"义和团"第三册，第209頁。又佚名："天津一月記"云："（天津）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尸数里，高数尺。"見"义和团"第二册，第157頁。

算，而是用銀子来計算①；它們通过清王朝向中国人民勒索駭人听聞的巨額賠款②。这次的要求，也不是开放某一商埠，而是迫使清王朝拆毁大沽砲台，交出保衛首都和华北的一切軍事据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解除中国的武装。这次的懲罰也不是把清王朝作为主要的对象，主要的对象是中国的农民群众，对于慈禧太后，則准备繼續把她保留在帝座的后面；因为帝国主义强盗們認为慈禧太后不仅善于打敗仗，善于簽降书，还善于剿灭和欺騙自己的人民。她是最适合于执行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代理人。

所有这一切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的統治者看来，都是不足为奇的，而且还認为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从輕发落；因为在这些要求中沒有触及到慈禧太后本人的个人的地位，并且把她当作一个有用的廢物保留下来。

很多年来慈禧太后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子跳舞，只要听到笛子的声音，她就知道她应該踏出左脚或右脚。現在，笛子又吹响了，但在慈禧太后听来，不过是旧曲重奏，要她再一次在降书上签字而已。如果說也还有弦外之音，那就是再一次提醒她要她更忠順于帝国主义强盗們交給她的政治使命。

任何伪装都用不着了，在逃跑的路上慈禧太后脫掉用以欺騙义和团的民族国家的外衣③，披上了皇袍，拔出了宝劍，指揮她的軍队和帝国主义强盗站在一边，向自己的农民进行追击的战爭④。她知道，她只能用农民的鮮血才能換到帝国主义强盗的赦书。

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約签字以后的三个月，慈禧太后回到了北京。她踏着农民的屍骨，重新回到帝座的后面。帝国主义允許慈禧太后回来，是因为它們已經在她的身上发洩了滿意的侮辱以后，用馬克思的話說："他終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禮了，但他是在新娘已被凌辱之后引来的。"⑤

义和团是失敗了，但它是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过程中第一次遇到的中国人民的大規模的武装抵抗。在这次革命斗爭中，中国人民狠狠地打了帝国主义强盗几个耳光，告訴它們中国并不像帝国主义所想像的是一块可以分割的土地，而是一个国家，一个不許外国强盗侵略的国家；中国人民不是和中国封建統治者一样是用恶劣材料造成的，而是敢于在任何凶恶的外国侵略者之前作决死斗爭的英雄人民。

后記　这篇文章是1956年四月我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議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講座"的一篇講演稿的提綱。原来的提綱沒有注解，最近加了一些注解，把它发表。

应該說明一下，在講演以后，有些同志，对我的說法提出了一些意見，其中有少数意見是不正确的，例如：有人說，义和团与慈禧太后的"合作"和国共合作一样，誰也沒有利用誰。又如有人說，义和团的失敗和太平天国一样，是由于沒有知識分子参加。这些說法不仅比喻不倫，也不符合事实。但大部分的意見是很好的，根据这些意見，我作了一些修改，現在我借这篇文章发表的机会，对提意見的同志表示謝意。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四日

---

① 辛丑正月广学会："万国公报"云："訂立辛丑和約，当时只大量賠款而未割地者，即因各帝国主义怵于义和团的死战，故集中于經济上的压榨，避免形式上的刺激。"

② "辛丑条約"規定：中国賠款銀四亿五千万海关兩，从1902年到1940年付清，总計本息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海关兩。

③ 清德宗实录，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諭："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議十二条大綱，业已照允，仍电飭該全权大臣將詳細节目悉心酌覈，量中华之物力，結与国之欢心。"

④ 清德宗实录，光緒二十六年八月癸未上諭："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罪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务淨根株。倘仍有結党横行，目无官長，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責成帶兵官实力勦办，以清乱源。"

⑤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242頁。



关于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政府的几个問題

魏宏运

一 武汉政府的成立

武汉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大革命的胜利和发展。武汉政府成立后，武汉代替广州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为什么要把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呢？迁都到武汉是1926年十月北伐軍胜利前进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各省海外及各特别区联席会議"提出的。但当时江西問題还沒有解决，武昌也还沒有占領，所以对迁都問題沒有具体决定。到十月底，因武昌在十月十日已經占領，江西孙傳芳的軍队也被击潰，宋庆龄、鮑罗庭等就受命到武汉进行迁都考察工作，考察結果認为适宜。十一月二十日就作出了迁都的决議。

对于是否要迁都，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見。多数人認为应該迁都，因为第一，两湖江西拿下后，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并且繼續向黄河流域发展，武汉在革命形势发展上已形成了一个中心，如政府仍留在广州，有鞭长莫及之感；第二，两湖的工农运动已如雨后春筍发展起来，江西的农民也已經起来，亟需有一个最高机关就近指揮統轄；第三，两湖初下，人心未定，非有最高机关坐鎮，不足以資鎮攝。而广州革命势力已有相当基础，中央北迁不至影响后方的革命基础。但部分人反对这种看法，爭論結果，反对的意見被否定了，遂决定迁都。

迁都是1926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按照計划，从广州黄沙車站出发，由粵汉路北上，經韶关入江西轉武汉。但十二月底到达江西南昌后，又发生了迁都問題的爭执。这一次的爭执和在广州时的爭执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說第一次的爭执是內部意見的分歧，那末这一次則是革命与反革命之爭。蔣介石原是力主迁都武汉的人，但是到了南昌，他又說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政府和中央党部搬到南京去。为什么他要出尔反尔呢？因为他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占有絕对优势，他在武汉无法或者說很难实現其反革命陰謀，便計划凭借他的总司令的軍权，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扣留在南昌，把革命及党的指导机关，尽入其軍事独裁的掌握，以实現其將国民革命的成果轉到买办資产阶級手中而进行反革命的目的。于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到南昌后就迟迟不能前进，处处受到蔣介石的控制，完全失去了自由。但是他这种企图沒有实現，武汉初下后，革命的湖北省政府就成立了，从1927年一月一日起国民政府也开始在武汉行施职权，所以当时革命的領导人已相繼到达了武汉，为了击敗这种陰謀，挽救革命危机，大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員，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和政府的联席会議，組織武汉国民政府。因为武汉的中央委員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停留南昌，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又无几人，政府也仅剩了一个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財政、外交、交通、司法各部都已搬到了武汉，蔣介石在事实面前和各方面压力之下，不得不打电报給武汉，說中央政府在南昌是暫駐，如不去南京，当即来武汉，那时南京还是孙傳芳的天下，到三月上旬，蔣介石不得不贊成中央政府設在武汉。在南昌的政府人員就离开江西轉赴武汉。蔣介石則向安徽江苏等地发展他的軍事力量，扩張地盘，准备实行大叛变。武汉革命政府在經过三月間举行的国民党二屆三中全会后，就正式成立，共产党員也加入这个政府，由譚平山和苏兆征分別担任农政部和劳工部部长。武汉政府的組織机構較之广东时期要健全得多，而更重要的，它是由共产党員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組成的政权机構，因之較广东时

要进步得多。但这个政府成立之时，一批投机分子在当时革命高涨形势下，混入革命政府之中，他們本来是反对共产党的，这时却一再表示联苏联共，因而窃取了重要的职位，如汪精衛、孙科、陈公博之流，也被称为"左派"，誰知他們投入革命营壘，正是为了反对革命，准备叛变，这就预伏下了日后武汉政府的危机。

二　共产党員在武汉政府中的地位

武汉政府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組成的。共产党的力量在武汉政府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当时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被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所把持，以及其他一些因素，那末党就可以把这个左派政府更向左推进，就能大力领导工农的群众运动和武装革命力量，从而也就有可能避免至少是减輕后来的失败。

共产党員在武汉政府中的地位，是極为重要的。

首先，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的三十六个委員中，有五分之一是共产党員（見"响导"一九八期，第2179頁），他們負有很重要的責任，如吳玉章同志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員、中央党部秘书長兼常务委員，曾主持国民党二屆三中全会；林伯渠同志当时是中央委員、兼常务委員及中央財务委員。共产党員的这种地位，就可以在革命进行中来孤立右派，把小資产阶級推向左面，把国民党的政策推向左轉，把农民阶級和城市貧民团結在无产阶級的周圍。

其次，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曾实行合作，把右派革出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当时有六个部，共产党員占有两个部，并且担任部長的共产党員都是国民政府的委員。政府的一切措施和决策，都由国共两党党員所組成的联席会議来决定。国民政府的高等顧問鮑罗庭为列席代表。联席会議曾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屆三中全会，通过了为反对蔣介石独裁專制的指导机关統一案、政府机关統一案、革命势力統一案。"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議的許多决議案，形成我們联盟的政綱。这些决議是：巩固党权推翻軍事独裁；鎮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議以实現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帮助工农經济狀况之改善而設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則，而实行之；堅决的贊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这說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願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响导"二〇一期，第 2215頁）。这說明了，有共产党員参加的国民政府，是执行三大政策的政府。

第三，共产党在当时已掌握或者已影响了不少軍队。軍队是进行战爭、鎮压反革命和保衛革命政权的有力工具。在武汉政府統轄的軍队中，共产党的力量有三分之一，主要在第二方面軍內，中央軍校和湖北政府的警衛团也是由共产党来領导的。关于这方面的資料，我們引一段来自革命的敌人方面的記載，就可以知道党在軍队中的巨大力量：

"在張发奎的第二方面軍內，共党的势力，比張发奎的基本势力还要强大得多。第二方面軍本有第四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三軍，賀龙的二十軍，共产党可以完全支配。第十一軍的二十四师叶挺部，也完全是共党的。而总指揮部的警衛团，也是共党的。此外如第四軍的三十五团、三十六团、七十三团；第十一軍的七十七团、三十团等五团，也完全是共产党的。总計共产党在第二方面軍內，整整的有一个軍，一个师，五个团，另外有工兵营、特务营、炮兵营、宪兵营等部分势力。总計共产党可支配的兵力，在第二方面軍四万数千兵士中，是有三万数千人。在武汉分校，本有一万多枝槍，而共党几乎可以全部支配。至于杂牌部队，如湖北省政府的两个警备团、学兵团、工人糾察队、农民自衛軍，以及唐生智部下的一部分，朱培德的第九軍（朱德是付軍長），陈嘉佑的教导师一部分，魯滌平的第二軍一部分。总計在武汉政府的主力軍中，共产党可以支配的軍队，至少有三分之一。"（"现代史料"第四集，第275——276頁，海天出版社1935年版）

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有这样多的兵力，不仅保証了武汉出师北伐的胜利，而且保衛了武汉左派政府的存在。只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說明一切：1927年四月下旬，夏斗寅打着反共旗帜，由宜昌东下，直迫武昌，那时主要的軍队已开往河南，在武汉的唐生智的部队按兵不动，叶挺和惲代英同志便率留守武汉的直属部队和軍校学生迎击叛軍，凱旋而归，保衛了武汉。

由此可知，共产党員在国民党中，在武汉政府中以及在軍队中都具有領导作用。如果沒有共产党，沒有共产党員在各方面所发揮的革命作用，那末就不会有武汉政府的存在，也就更談不上三大政策的执行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进行。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在当时就使"无产阶級便于在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起領导者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9頁）。也正是由于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这种性質，所以它执行着既反对封建殘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武汉成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三 工农組織在武汉

在进行以土地革命为基础和內容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軍队的积極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34頁）。武汉在工商业方面有相当的基础，而經济及政治又足以綰轂长江各省，因此在武汉政府的推动下，工农运动特别发展，并影响全国的主要地区。在城市，工人組成了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武装糾察队，具有絕对的統治权。在农村，已經起来的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風驟雨，迅猛异常，无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将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頁）。“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經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懲治自己的敌人，組織自己的自衞力量。”（“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33頁）工农运动的大規模的发展，震惊了全世界。而作为这一运动的中心地区的武汉，也几乎变成为工农的世界。

武汉的工人站起来了。他們紛紛加入工会，各种职业工会相繼組織起来，就是店員和人力車工人也各自組成了自己的工会。組織起来了的工人为了要求加薪，改善生活，为了声援战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經常举行群众示威大会。工人已不再忍气吞声地受資本家的压迫，他們有自己的武装工人糾察队，如果資本家怠工或者不尊重工人权利，他們就組織罢工，或者把資本家帶到总工会进行审問。如果資本家仍然进行頑抗，問題得不到解决，工会就把商店交給店員与学徒管理。在汉陽还出現了工人管理工厂的事。如果帝国主义者不在革命面前屈服，他們就斗爭到底。1927年一月三日汉口工人群众驅逐巡捕、占領英租界，就是很好的說明。英美烟草公司工人曾因要求加薪，包圍工厂，把公司的三个美籍人員关閉起来，也是一个例証。工人們展开了各方面的斗爭。

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級覚悟，組織工人更好地斗爭，党在湖北設立了九十余所工人学校，其中在武汉有六十所。并开办了工人补習班、子弟班及妇女班来教育工人。工人还有自己的俱乐部——人民俱乐部。在人民俱乐部內挂着馬克思、列宁的照片，張貼着許多革命的标語和口号，如“爪哇暴动起来了，我們要努力！”“飢寒交迫的奴隶們起来作最后的一战！”等；同时还挂着各种各样的統計表，如湖南各县农民协会組織統計表，武汉工人組織統計表等。武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充滿着濃厚的革命空气。

因为武汉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就不时地接待着各地工人領袖和骨干分子。1927年三月在汉口曾有全国邮务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六月則有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也到武汉去訪問，武汉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城市。

和工人組織活动相伴随的是农民的組織活动。領导全国农民运动的有关組織也都集中在武汉，这就更增加了武汉的革命色彩。毛主席那时就在武汉全力領导农民运动。他是全国农民运动講習所所长，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部及农民运动委員会的領导人。总政治部当时成立了一个农民問題討論会，他也是委員之一，他并在中央軍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农民問題的講授。农民問題是当时革命的中心課題。当时有关农民运动的組織很多，如全国总农民协会筹备处、湖北省农民协会、汉陽县农民协会等。国民党左派在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也很注意农民运动而設立了一些机構。农民及其組織可以自由地在武汉活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就是三月間在武昌举行的，省城附近各县农民协会派了三千名农民自衞軍保衞开会。农民自衞軍帶着大的斗笠，一部分背着毛瑟槍，一部分拿着梭标，威風凛凛，气概英武。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澤东同志在1927年的春天在武汉召集了一次很重要的各省农民联席会議，目的在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土地革命，但是这次大会的决議沒有被当时党中央所采納。毛澤东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說：“次年早春，当我到了武汉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各省农民联席会議。我出席提出建議，主張普遍地把土地重行分配。在这一次会議上，有彭湃、方志敏和两个俄国共产党員——約克（York）及窩隆（Volen），决議接受了我的建議，提交共产党五次大会討論。可是中央委員会加以否决了。”（斯諾：“长征”，第139頁，啓明书局1949年版）

显然的，武汉已是工农活动的世界。地主、資本家感觉到在这里“压得吐不出气来”，便逃之夭夭。但他們并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在計划着联合其他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

四 东征和北伐

从1927年一月起，国民党右派就企图在南昌建立反革命中心，使南昌和武汉呈現出了分裂的局面，这一事实反映出国內的阶級力量在进行重新部署，到了四月十二日，国內的政治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民族資产阶級因为惧怕工农运动并且得到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級的支持，叛变了革命，在南京建立起买办阶級的政权，和武汉政府相对抗。

"蔣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將有两个陣营、两个政府、两个軍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蔣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自发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綫的革命轉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轉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將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和蔣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爭。"（"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03頁）无疑的，这种論断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武汉的国民党領导分子及国民政府，畏惧日益发展着的农民革命，便撿拾了反革命的余唾，痛罵群众运动的"过火"，从四月以后就发出了許多專以限制工农运动的訓令宣言，并頒布了保护剝削阶級的各种法令和限制軍队中政治工作的特別法令，湖北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也被封閉，这样千百万农民群众的革命就受到抑压和摧殘。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綫在党的領导机关中占了統治地位，对这种压抑和摧殘工农群众运动的行动，不仅沒有及时予以反击，反而高唱要和国民党"合作到底"。叛变了革命的資产阶級和帝国主义勾結在一起又向武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这就使革命发生了危机。

反革命集团和分子，把武汉革命政府从东西南北四面包圍起来了，他們組成了反革命的联合战綫。帝国主义也乘机侵迫，从四月下旬以后，武汉江面外艦如云。而对武汉威胁最直接最严重的則是东面的新軍閥蔣介石和北面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在这四面包圍之中，武汉政府是东征呢还是北伐？或者是同时并举？

同时并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力量不足，即使有强大的力量，在战略上也不宜在两个战綫上同时作战。所以当时只能在北伐或东征中来选擇一个战綫。

武汉当局領导人，有的認为应該先出师东征，乘南京蔣介石政权的基础还沒有巩固以前，迅速扑灭。有的人則認为东征不一定就能胜利，而奉軍南下，节节进逼，在京汉路的正面已由郑州长驅南下，越过漯河郾城，在豫东不仅已占領逍遙鎮，而且也占領了汝南、上蔡。如出师东征，奉軍必乘虛而入，直下武胜关而取武汉。显然，北伐奉軍是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說呢？"第一、因为奉軍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軍是刻不容緩的防御措施。第二、因为武汉想和馮玉祥軍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說又是極其重要的軍事政治事件。"（"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30頁）于是以共产党員为主力的武汉軍在四月間开始第二次北伐，到河南和張作霖奉軍作战。

我們所以說武汉北伐軍以共产党員为主力，这不仅因为共产党員在軍队中占有相当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在击潰奉軍的主要战斗中，都是共产党員牺牲奋斗的結果。如逍遙鎮就是由賀龙同志率領的独立第五师打下的；临潁十里头之战是北伐軍在整个討奉战爭中最剧烈的决死战，武汉軍曾給奉軍以致命伤，然后才得以长驅进入郑州，这次胜利就是十一軍七十七团团长蔣先云同志与陣地共存亡而取得的。正是由于共产党員的革命精神，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武汉北伐軍在两个多月的时間中，就打敗了河南的奉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会师郑州、开封。河南战役虽然把張作霖打敗了，然而損失是奇重的。

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繼續北伐？这一方面固然由于馮玉祥表示拥护武汉政府，建議武胜关以北的事由他負責、北京的奉軍由他率部攻打。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蔣介石派兵西向并唆使其走狗楊森进攻武汉，勾結武汉政府留守后方的夏斗寅、許克祥軍队叛变，欲顚复武汉政府，这就使北伐的軍队不得不回师巩固首都，来对付南京的蔣介石。但馮玉祥并不眞正是革命的，在不久当夏斗寅叛变和馬日事变以后，为反革命所动搖的馮玉祥就和蔣介石合流了。

对于蔣介石的声討，在二、三月間就开始了。当时曾提出"反对个人独裁！"的口号，二月二十八日武汉就罢工一小时，向蔣介石表示抗議，从三月六日开始反蔣运动已普遍武汉，并且动員軍队准备东征。蔣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武汉立即形成反蔣高潮。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决定"开除蔣介石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指斥其背叛党国，逆迹昭著"，"着全体將士及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懲治"。武汉革命群众曾举行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声討大会。湖北总工会的工人糾察队到处捉拿反革命。反蔣运动委員会也成立了。东南被压迫同志招待所、政治工作人員招待所、江浙皖三省党部办事处也相繼成立。武汉政府在揭露蔣介石反革命集团性质、打击反动派、动員群众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就是出师北伐时，也沒有放松对蔣介石陰謀进攻武汉的警惕性和注意可能发生的叛变，以共产党員叶挺統率的二十四师衛戍武汉；令朱培德率所部第三軍第九軍全部留守江西，对南京安徽方面警戒；令第三十五軍何鍵的一部分、第二軍魯滌平的一部分及陈嘉佑全部留守湖南，对四川方面警戒；这一切就是很好的說明。但是終因共产党員在軍队中还是少数，留守后方的，除了共产党員直接領导的少数部队（如叶挺同志的二十四师、朱德同志領导的教导团）外，大部分都是地主軍閥所統領的部队，他們在蔣介石勾結下，相繼叛变。当北伐軍返抵武汉时，政治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武汉国民党領导分子也准

备要退到反革命的陣营中去，到处弥漫着反共空气。虽然他們把"反共"与"反蔣"同时并提，想走第三条道路，他們說："南京的蔣介石，他們是往右边走的，現在共产党是往左边走的，这都不是眞正革命的道路，不是国民党的道路，不是三民主义的道路。眞正革命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道路，不是向右边，也不是向左边，而应該向前走。"但这条道路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和蔣介石一塊来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武汉国民党領导集团为什么轉到了反革命陣营中去？这一方面是他們对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他們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則是帝国主义对他們曾施以压力，要求他們和共产党分裂，特别是帝国主义对武汉的經济封鎖，使他們更加脫离革命，他們就背叛了和共产党合作的諾言。他們是假左派眞右派，但又不敢公开承認他們站在右派方面，因为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名声已經扫地，他們为了掩飾他們的眞面目，来欺騙人們，就可耻地打起了所謂中間路綫的招牌，进行反革命的活动。革命便处在危机之中。

五 經济危机

当武汉的政治情况恶化的时候，武汉又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經济危机。

北伐軍占領武汉后，就开始整理"官票"，沒收軍閥及其党徒的財产，如房产、汽車、存款等以解决財政困难。接着就发行公債、国庫券，中央銀行并发行鈔票，把武汉的經济从軍閥搜刮的萎靡狀态下解放了出来，并且逐漸得到恢复。当时所发的公債及国庫券都有重大意义，并且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总計发行湖北金融公債二千万元，实际发行者約六百另九万另七十四元，国庫券共发行一千三百三十九万元。但自資产阶級叛变后，經济情况又形恶化。因为資产阶級在配合其軍事政治进攻的同时，又对武汉采取經济封鎖政策，企图置武汉人民于死地。

在經济封鎖上，他們用尽了一切手段。他們不与武汉作买卖，停止了沪、汉的匯兌，断絕了长江的交通，使任何物資都不能运到武汉地区，就是救护伤兵的药品，也不准运进。蔣介石还亲自下令，严禁武汉中央銀行的鈔票在江苏流通。外部的封鎖也給武汉帶来物資缺乏的困难。在武汉地区属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資产阶級的工厂，又故意停閉，造成武汉十多万工人的失业現象；他們在武汉的銀行拒絕接受中央銀行鈔票，并且还串通奸商共同扰乱金融。有的奸商便將大量紙幣購买輕便土产，偷运至沪，轉售現金，然后又以低价收买汉口銀行鈔票，再运往武汉購买土貨（見"总商会月报"十卷四号，"商情"第8－9頁）。軍閥和地主也鼓动商民不用金庫券，这就使武汉物資更感缺乏，金融更加恐慌。

在这种严重的封鎖下，武汉社会就呈現出不安。各种物价都飞速上漲，許多日用品也买不到了。日用品商店"多將存貨暗行藏儲，店門半閉，形同歇业，貧苦小民，不但无錢，即有錢亦有无处糴米买柴之苦，其他如金銀綢緞各大商业，竟將貨碼横加……"（"銀行周报"1927年五月十五日版，"杂纂"第12頁）。煤沒有了，汉陽兵工厂几乎无法开工，京汉路与长武路的行車不得不用柴来代替煤；煤油也沒有了，特別是內地的燃料很感缺乏；盐也沒有了，湘西和鄂西发生了严重的盐荒。粮食缺乏的危机也漸漸显著起来，而最严重的是金融問題。紙幣的价值低落至不到实际的三成。为了对付由于經济封鎖所造成的危机，武汉政府曾經采取了各種措施，如四月十七日組成了战时經济委員会，决定將現款存于銀行作为准备金，以維持紙幣信用，当天就查封各銀行所存現洋約四百万，禁止其使用及出口，規定納稅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銀行之鈔票为限，其他各銀行鈔票准換三銀行鈔票使用；將安源煤矿改为官商合办，共同开采，收回汉冶萍輪駁运輸，借軍船航船到株州运煤，集中到武汉分配，以解决煤的恐慌；政府并且发布命令禁止抬高物价。武汉工人态度更为坚决，要求政府发給武装，維持市場秩序，鎮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汉陽則有工人沒收十五家工厂，組織工人管理委員会，管理工厂之事。但这一切都未能扭轉經济的恶化情况，因为国內的反动派实行了政治、經济、軍事的瘋狂进攻。武汉政府統治地区本来只有两湖和江西，在許克祥等反动軍队叛变后，轄区又日益縮小，接二連三的軍事叛变又加剧了經济危机，武汉的小商人在大資产阶級压迫和影响下，受着一般經济恐慌而动搖起来。武汉国民党內的領导分子和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也受到这种經济封鎖的影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决定脫离革命，革命陣营內的阶級关系緊張起来，矛盾日益尖銳，武汉政府在風雨飄搖之中度过了一些日子，到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这个政府就宣告解体。

六 武汉政府的解体和崩潰

武汉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大革命的发展，武汉政府的解体則标志着大革命的失敗。

在資产阶級叛变后，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同盟經历了整整三个月。

为什么左派的革命政府在短短的时期就垮了台？1945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議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中分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說：“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內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內（約有半年时間），党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綫，在党的領导机关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見，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襲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这是对整个革命失敗的分析，也是对于武汉政府解体的分析，因为武汉政府是革命的体現，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

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軍閥、买办、大地主、大資产阶級是怎样联合起来对付武汉政府？他們除了用經济封鎖的办法动搖武汉革命基础外，还在政治上分裂武汉政府，如使日本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誘胁国民政府的領导分子潜赴南京。在軍事上則发动进攻，組織叛变，从革命內部来破坏革命。自四月下旬夏斗寅首先打起反叛旗帜，进攻到了距武昌城四十里的地方；接着楊森順流而下，进窥武汉；长沙的許克祥也跟着发动了馬日事变。一个接着一个的軍事进攻和叛变，使武汉立即呈現出危机和不安。在这严重的关头，江西朱培德的政治态度也变了，他以“欢送政治工作人員出境”为名，把党的政治工作人員全部押解出江西而送到武汉，开始了反共反工农运动的活动。一个大的事变正在醞釀着，到六月十日武汉国民党人汪精衛、孙科、唐生智等和馮玉祥举行反共的郑州会議及六月十九日馮玉祥和南京的蔣介石举行反共的徐州会議后，武汉国民党立即发动反共高潮，集中全力策划大規模的反共陰謀。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准講了，苏联的顧問被逼走了，工农运动受到部蝕，共产党員要被驅逐了，武汉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国民党內的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也步民族資产阶級的后塵，来反对革命。由此可知，反革命势力比革命进攻力量要强大得多，但即使在这时候，党如果采取坚决的态度，依靠着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力量，还是可以击潰这种进攻，制止住国民党人的叛变，可是陈独秀的投降路綫，使党失去了决定的領导权，也使党失去了自己的路綫。

陈独秀在1927年春发表了和国民党妥协的国共两党領袖联合宣言后，就走上了投降主义的路綫，高唱“国共两党合作到底”。为了維持这种“合作”，他不惜牺牲党和革命的利益。就拿許克祥的叛变来說，“事情发生以后，共产党湖南省会，立刻就开了一个紧急会議，决定对于許克祥这种行动来一个反攻。那时总工会及农民协会等一切民众团体全被許克祥占据了，所以××（共产）党决定召集长沙近郊的农民，联合城內的工人，組織十万工农軍进攻长沙，并且决定了五月三十一日，作为进攻长沙的日子。紧急会議以后，立刻派人到四乡去糾集群众。成績很不坏，据当时的估計，以工农群众的力量进攻长沙，其胜利可操左券，所以那时长沙的情形，陷于極度恐慌与混乱之中。可是十万工农軍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計划，終沒有实現，因为当时陈独秀主持的××（共产）党中央，極力反对湖南省委的計划。陈独秀自始至終是主張国共合作的。当时××（共产）党的湖南省委书記李維汉报告陈独秀說：‘我們同志及群众，被許克祥残杀的很多，为什么我們不来一个反攻？’陈独秀立刻答复他說：‘我宁願牺牲一千万群众，不能与国民党翻臉，只有与国民党合作到底，革命才有希望’”（朱其华：“1927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233頁）。陈独秀就是这样地哀求“合作”。在陈独秀哀求“合作”之下，党的武装，党所創造出来的力量，就被解除了。

毛澤东同志曾說：“陈独秀是一个自己意識不到的出卖党的人。”（斯諾：“长征”，第142頁）他使我們的党服从国民党，他自己則成为武汉国民党領导人汪精衛的馴順工具，一切唯命是听。汪精衛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要他走东他不敢走西。这样，在汪精衛的命令和授意下，他下令解散了武汉的店員工会和总工会的工人糾察队，將工人糾察队的槍枝繳給唐生智的第八軍；他告誡負責农民运动的党員，責其不可过火，并解散了农民自衛軍，將槍枝繳給了地方駐軍；他禁止党員在軍队中宣傳阶級斗爭。这就更增加了反革命的气燄，帮助了武汉国民党的叛变，葬送了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就使革命遭受了暫时的失敗。革命虽然失敗了，但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給了極大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而是高举了革命的大旗繼續战斗。

元代的河漕和海运

賴 家 度

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在辽金时旧城的东北面建造大規模的新城和宮殿，号称大都。在忽必烈汗迁都大都的同时，蒙古帝国已經分裂成为五个大“兀鲁思”（Ulus汗国，領地），元朝皇帝仅只在名义上是这一联合体的最高統治者，其他四大“兀鲁思”（金帳汗国，察合台汗国，窩闊台汗国，伊儿汗国）已經各自执行了独立的政策，蒙古大汗实际上也无力过問他們。在十三世紀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蒙古帝国宗主君的元朝皇帝，其权力只及于直轄地（蒙古、汉地）以及別失八里、畏兀儿之地①。

十三世紀初叶中国的封建分立局面：北方的金朝，南方的宋朝，西北方面的西夏以及西辽，西南方面的大理以及吐蕃等地区，却因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借用軍事上的强力造成了一个新的綜合的統一王朝。同时，全国政治和軍事的中心，从临安（今杭州）和汴京（今开封）等处一起迁移到大都。但十三世紀时中国的經济重心却在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帶。这一国內經济发展南北不平衡的情况是由来已久，自从唐宋时代南方經济水平逐漸超过了北方。在十二世紀南宋和金朝对峙时期，很多北方劳动人民南迁，长江流域的生产力愈見提高，东南沿海并有海外貿易的影响，商业和手工业更显繁荣。相反地，北方各地在金朝的統治下，生产力从多方面遭受长时期的破坏，到十三世紀初，蒙古軍在侵灭金朝，以及灭金后又調动北方的人力和物力侵灭南宋的过程里，北方的經济基础更受到很大的耗损。因此，元代中国的政治和軍事重心虽然偏在北方，經济重心却仍偏在南方。

一 大都財政和食粮仰給于东南

我們首先可以从元朝的政治区划上看，特別环繞着大都划出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直轄于中书省，号称“腹里”，就簡明地反映了最高政权机構集中在北方。其次从元朝財政上的田賦、商稅和交通上的站赤等具体統計数字，也很好地說明了元代北方和南方的經济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元史食貨志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計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行省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按元朝腹里地区，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以及內蒙自治区的原热河省西半部、察哈尔省南部和綏远省东部。元朝的江浙行省轄区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以及江苏和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江西省东北角的上饒専区等地。从轄区面积上說江浙行省仅当腹里的三分之一。但腹里岁粮却占全国百分之十八，江浙行省岁粮反占全国百分之三十七，江浙田賦是腹里的两倍以上，实际是六倍以上了。再看商稅方面，元朝“酒課：腹里五万六千二百四十三錠，江浙行省一十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四錠。醋課：腹里三千五百七十六錠，江浙行省一万一千八百七十錠。”②两相比較，江浙行省的酒醋課稅額都約有腹里的三倍以上。显然，酒醋課只是商稅的一个部分，而酒醋的消費大半由于异乡商賈的城市活动，仅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反映元代商业繁盛程度南北差別的一斑。同时江浙行省底商稅相当于其他行省底商稅的三倍有余以至五百余倍，酒醋課相当于其他行省的二倍有余以至百数十倍③。这都可以說明江浙一帶經济的发展，占居了全国的重心。

另外，如元代站赤数字：中书省所轄腹里各路站赤总計一百九十八处。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轄总計二百六十二处④。按驛站設置的或多或少正反映当地交通的繁簡，中书省以較大的面积，并且是大都所在地，站赤数目却少于江浙行省三分之一。而江浙行省的站赤数字特占全国各行省中的第一位。这也間接說

① 参考余元盦：“內蒙古历史概要”。

② “元史”，卷九四，食貨志。

③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第203—207頁。

④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

明元代經济南北发展的不平衡。最后，我們再看元朝大都每年要从江南方面調用大批食粮，只經海运的粮石数字，历年有所增多，从1283年（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一直增加到1329年（天曆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在不到五十年間，竟增加了七十六倍以上。这也正是："元都于燕，去江南極远，而百司庶府之繁，衞士編民之众，无不仰給于江南"①一般史实中的有力論据。

二　元朝初年运河漕渠的主要路綫

元朝初年，南粮北运是依靠原先的运河作主要漕路，并用旱站陆运作輔助。从1283年起才逐漸发展海运，随后就以海运为主，河运作輔助。海运、河运和陆运三种方法在运輸费用上的比較，一般有这样的估計，如丘濬曾說："河漕視陆运之費省什三四，海运視陆运之費省什七八。"②崔旦伯曾說："海船一載千石，可当河船一之三。"③丘、崔都是明朝人，我們引用他們的話来間接推論元代的情况，也就是元明时代一般地說，河漕費約当陆运費三分之二，海运費約当河漕費三分之一。元代海运既然从1283年后有所发展，为什么不專用海路运輸呢？主要原因是当时海运航程上"風水險惡"，时常有"人船俱溺者"，也有"船坏而弃其米者"。所謂"漕船泛河則失少，泛海則損多"④。同时元朝統治者所需要江南物資，除巨額粮食以外，尙有种种手工业品和珍貴的特产等，海上运輸既不能有十分安全的把握，所以元朝統治者不断地征調农民开掘运河，以便源源地吸取江南物資。同时为了使运河的路途縮短，或改变旱站做水路，更开辟了許多漕渠，如会通河和通惠河等，情况相当繁杂。

現仅簡单地叙述元朝初期运河漕粮的主要路綫。从浙江杭州各地經江南运河，粮船集中到揚州，再經淮南运河，路过高邮等地，到达淮安进入淮水，更轉入黃河（当时黃河合并在淮水下游流入东海），逆流上行，直达中欒旱站（今河南省黃河北岸封丘县境）。到这里水路停止，必須將漕粮用車載或牛运經陆路向北搬运到淇門鎮（今河南汲县境），重新从御河（今衞河）向东北經临清，再北上过直沽（今天津市），更經白河漕渠，到达通州（今通县）。这条漕路是很迂迴艰苦的。

三　元代的海运

元朝从江南运粮到大都，中間道里遙远，各地漕渠时常毁坏，有的因水灾淤塞，有的因水源不足，不能經常保持暢通无阻。同时，中欒到淇門旱站轉运，也延緩时間，浪費力量。相反地，大都需要食粮时日是緊迫的，数量是日愈增多的。在1282年（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顏首先建議用海船运粮。因为在1276年（至元十三年）时伯顏率軍攻破临安后，掠取南宋的"庫藏图籍物貨"，曾把这次巨量的擄获品，命令"海盗"朱清、張瑄等裝入海船，从崇明州取海道运到直沽，轉入大都。所以伯顏的海运建議是元朝軍事掠夺經驗的重新提出，就在1282年开始从海道运粮四万六千石，第二年增至二十九万五百石，第四年增至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随后海运粮石，历年有所增加。当时海船路綫也逐漸改动。最初海道是从平江路刘家港(今江苏太倉县东北瀏河)出海，循海岸北行，繞过南通、海門等县海面外的"黃連沙头"、"万里长灘"，更循盐城、东海等县近海处，轉而东北行抵膠州湾外，从灵山島放洋，更向东北，但路多淺沙，經一月左右的行程，才能繞过成山角，再从成山向西北航行，到达直沽或楊村。"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⑤这是第一次海道运粮路綫，应用平底船六十艘，"沿山求嶼，風信失时"，从1282年八月啓程，次年三月才到达直沽，可見开創海运的艰辛。

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議另行"踏开生路"，"自刘家港开洋，过黃連沙，轉西行使至膠西，投东北取成山"，再西轉"一日夜至刘島，又一日夜至芝罘島，再一日夜至沙門島；守得东南便風，可放萊州（今山东掖县）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今大沽口）"。这条航綫比旧路稍見徑直些，若航程前后都有順風，則无阻碍，約半月可达。"如風水不便，迂回盘措，或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⑥

以上两条航綫，都不能使人滿意，当时从事海运者更多方試辟新航綫。1290年，"朱万戶（清）請长兴李福四押运，自揚子江开洋，落潮东北行，离长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眞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开萊州大洋，进界河，不过一月或半月至直沽"⑦。另有1293年千戶殷明略所辟的新航綫，

① 危素："元海运志"。
② 丘濬："大学衍义补"。
③ 崔旦伯："海运編"。
④ "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
⑤ "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海运。
⑥ "大元海运記"。
⑦ "元海运志"，附录"广舆图"（国学文庫本）。

"自刘家港开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东行使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刘家島，聚鯨取薪水毕，到登州(今山东蓬萊县)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 ①。李福四和殷明略两次試航的路綫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条新海路試运成功后，当航行时，若"風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②。比較以前两条航綫是方便得多，元朝应用这条海路也是比較长期的。但当时航海情况，仍然是，"風涛不測，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 ③。

四 新运河增辟的失敗和成就

元朝旣願利用海运的便利，又想避免漂溺的損失，因此，就企图实行一种运河和海路的联运。元朝曾試行从淮安向北，开通济州泗河等水，再經山东大清河，順流到利津县入海，循海北入直沽。但因利津河口沙壅水浅，航行不通。又曾試行用山东半島的膠河等水源，貫流膠州湾和萊州湾，开成"膠萊运河"，以便漕船从淮河入海，穿过"膠萊运河"，再北入直沽。其目的是要"避东海（今黄海成山角）数千之險" ④，但結果是"劳費不貲，卒无成效" ⑤。这是元朝試行海、河联运遭到失敗的方面。

另外，元朝新开运河也有比較重要的成就。如山东省西北部的会通河，南起須城县（今东平县）安山的西南，經寿張县西北到东昌县（今聊城县），再往西北到临清。这一段运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从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开凿，六月开成。1290年更加工修筑堤岸閘牐，直到1325年（泰定二年）才告完成，前后共經三十七年的工夫修成的会通河，使汶河和御河（今衞河）相連，漕运更加便利。但因济州河（今山东济宁一帶），漕渠时常淤塞，不能讓漕船暢通无阻，因而会通河的交通价值也受到了限制。

元朝另一条新运河是都水监郭守敬所建議和設計的，那就是通惠河。河道从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諸水，到大都和义門（今西直門）北入城，南匯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門（今崇文門），东到通州高丽庄，流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有余，共費二百八十五万工，从1292年秋开始，到1293年秋完成。以前南方漕粮若干万石都运卸在通州，通州到大都城內五十里，必經車牛人伕等陆运。到通惠河修成后，漕船直达大都城內。按1293年（至元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平章不灰木等奏疏称："辟新河，那怀督役公謹，今已成功，河西务、通州倉儲粮最多，俱如曠野，东城紅門內近新河有隙地，复迁紅門稍入五十余，广展基址，期数年間，尽建倉宇，移致河西务、通州粮甚便，……上是之，曰：不必再慮，尽力为之。" ⑥可以想見在今北京东安市場附近是当年元朝漕船卸粮的碼头，而地安門北什刹海一帶就是元代的积水潭，千百艘漕船停泊处。这一史实說明元河、海联运上的成就。

五 元代漕运和造船业在历史上的作用

元朝統治者以征服者的威势，压迫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剝夺人民的財产，榨取人民的劳动，本文所論南粮北运仅只是一个方面，我們也可以从里面看出在封建时代的人民，付出了无限的血汗，遭受了无限的苦痛，同时仍不断地創造社会的物質文明和科学經驗。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开凿了千百里运河，建立了亿万丈隄坝，处处修蓋了倉庫，年年創造了車船，提供多少人力和物力，长期而艰巨的劳績，那是无法記叙的。只說海船上舵师和梢工，历年在"万里海洋，渺无涯际，陰晴風雨，出于不測，惟凭針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 ⑦。熟習了航海技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識，准确地測候着潮汛、風信、雷雨等现象，随机应变地維护着航运的安全。这类的宝貴經驗多般沒有記录下来，很是可惜。现只根据胡书农所輯"大元海运記"卷下列举：漕运水程、記标指浅、測候潮汛应驗（包括潮汛、風信、观象、行船等歌訣）、艘数裝泊等項，有关航海上的技术、规程和經驗，叙說虽然都很簡略，但也是元代中国在海航史上占当时世界前列的很好論証。

我們再从元代运河和海运的发展总的方面来看，对我国內外交通、物資运輸以及国民經济生活，都曾发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山东方面新运河的开辟，它初步解除了南北两段运河中間在河南封邱和汲县一帶的旱站陆运問題，把漕渠的路程大大地縮短了。同时因运河改道对各地城市也有不同影响，例如河北大名、河南汴梁的商业逐漸衰落，山东的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等处商业则日益兴盛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海运实踐中熟習了黄海和渤海上的航綫，使中国海上运輸进入新的阶段。因为在唐宋时海上的航綫和商港，南从广州、泉州、宁波、以及杭州、秀州、澉浦

① "大元海运記"。
②、③ "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
④ 崔旦伯："海运編"。
⑤ 同②。
⑥ "大元倉庫記"。
⑦ 同①。

等处，多在东南沿海。长江口以北，只有密州的板桥鎮（今青島市附近），尙是不发达的海港。經过元代海运的增多，北方沿海的密州、登州（今山东蓬萊县）随着发展起来成为定期寄泊的海港，尤其是松江府的上海和河北海河上的直沽（今天津市），从两个小城鎮变成海运綫上南北两端的重鎮。这都是中国經济史上的創举。

交通运輸上的发展对商业和城市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元帝国京城大都的情况，据馬哥孛罗游記有关“汗八里”（指大都）一节里講：“所有希罕来自印度的东西，如宝石、珍珠和許多希罕的东西，全运到汗八里来。……还有在汗八里周圍有二千多城，距离不同。人民都来自这些城市卖貨物和买他們自己所需要的用品。不用奇怪，汗八里城就像我所說的那样大的（指京城周圍是二十四迈耳）一个商場了。”①另外游記里講杭州城更說：“京师城（指杭州）是蛮子省的都城，也是最重要的城。城里的财富是无其数之多。”“平时候每年抽得税額达黄金二百十图門，这就等于黃金一千四百七十万撒基。”又說：“离这城二十五迈耳之远，在东北和正东两方之間，就是大洋海。海濱有澉浦（Ganfu）城。城有極良的港口。有許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裝載巨量的宝貴貨物来到这港。京师城和这港口有一河相連。船艦可以上溯到这城和更远的地方，因为这条河尙流經許多别的地方。”②这是当十三世紀末外国人游历中国南北各地对海运和运河給大城市商业帶来繁荣的表面描述。我們也可以按此例推其他沿近运輸路綫的城市的情况了。

元代运河上往来船只，除官府漕运外，私商貨物的运載也日見增多，元史河渠志会通河条記載：“始开河时，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指1314年）权势之人，幷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官民舟楫。”可以反映运河上商船的情况，也可以說明民間造船业发展的一斑。同时海上船只的制造更有新的成就。因为元代海运主要是采行“雇佣包运制”，在江、浙、閩、广沿海各地，“和雇”民間的船只，使承担海上运粮。在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依驗千斤百里”的单位計算“脚价”。运粮“每石給中統鈔八两五錢九分”③。随后历年有所增减，例如1313年（皇庆二年）“斟酌地里远近，比元价之上添与脚錢，本年为头粮斛脚价内，福建远船运糙粳每石一十三两（指至元鈔，下同），温台庆元船运糙粳每石一十一两五錢，香糯每石一十一两五錢，紹兴浙西船每石一十一两”④。海运船只每年都是几百只或千只以上，例如1314年（延祐元年）的一次支裝粮船，“浙西平江路刘家港开洋一千六百五十三只，浙东庆元路烈港开洋一百四十七只”⑤，可为例証。同时也有用官船，召募水手起运的。虽然在“和雇”民船与召募梢工水手的过程里，人民受到了官吏从多方面的剝削压迫，但从另一方面看，元朝海运也刺激着沿海造船业的发展，造船技术也有所提高。

据元末史料記載：“华船之構造、設备、載量皆冠絕千古”，“舶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以上云”，“海船一載千石”。又称：“船幅殆为四角形，下側漸狭尖如刃，以便破浪”，“大型之船有四層甲板云”，“一艘之船室每至五六十之多”，“普通四桅，时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云”，“船有布帆与利篷，正風用布帆，偏風用利篷”（参考陈裕菁譯“蒲寿庚考”，第96—100頁引用各书）。从这样零星記載，可知元代造船成就的大略。当然这些文字描寫多是牵涉到远航印度和阿剌伯的巨舶，同样也可以說元代中国造船业在南宋的基础上因海运較前发达，不論对近海或远航的船只制造都有新的較多的成績，那是无可怀疑的。

总之，元代运河和海运的发展，不論在內河和海外的各方面，对我国南北交通和运輸都开辟了新阶段，便利了商品經济的活跃。同时在十三四世紀造船业技术逐漸有所提高，对十五世紀明朝初期的郑和宝船七次“下西洋”和海外貿易的推广等壮举，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从世界海航史上看，在十七世紀的时候，中国帆船在設計和制造上仍然是很先进的。1605年西班牙駐菲列賓总督为了远攻干那底，曾建造了大批中国帆船式的船只，据称这些船只“在槳帆上都很好，在現有設計用槳帆的船只中，沒有什么船会有这样大的載重量来裝运粮食”⑥。从这一点也可以旁証我国造船业水平在宋、元、明时代一直是享有很高称誉的。因此，元代的运河和海运上的創举，在我国交通运輸史上发生过积極作用，正是祖国历史上人民的光荣劳績，值得我們自豪。

---

① 張星烺譯：“馬哥孛罗游記”，第189—190頁。

② 同上書，第312—324頁。

③、④“大元海运記”，卷下，“排年海运水脚价鈔”条。

⑤ 同上書，“艘数裝泊”条。

⑥ “亚吉納上菲利浦第三書”（1605年），載“菲島史料”（参考田汝康：“17—19世紀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第4頁）。

十月革命对日本的影响

山边健太郎 竹村英輔

明治时代的俄国和日本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苏联生活上发生的偉大的变革，也是世界无产阶級解放运动发展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轉折点。

当我們迎接俄国革命的四十周年时，試就这次革命对日本无产阶級解放运动的影响，作一次回顧与瞻望。

俄国革命运动和日本革命运动的关系，远发生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反抗俄国專制政治的民粹派运动，就曾給日本最早的民主主义运动——明治十年（1877）的自由民权运动以鼓舞和激励。

为反对專制政府、爭取設立国会而斗爭的民主派們，模糊地知道了十九世紀俄国发生的民主主义运动是推翻沙皇專制政治的革命运动时，便爭讀介紹民粹派运动的文献。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的"压服虚无党奇談"、"俄国虚无党狀况"、"俄国奇聞烈女疑案"、"鬼啾啾"等书，博得很多人的喜爱。（当时称民粹派为"虚无党"）

烈女疑案，系記載維拉·蘇秀利奇暗杀警察长官事件，我們讀了該书的序言，便清楚地知道譯者柚田策太郎出版該书的意图了。

"近日翻檢书筐，偶見一薄冊，披讀之余，知系記載俄国少女維拉·蘇秀利奇憤慨警吏虐待黎民，起而刺杀警察长官特波列夫公，使負重伤，終遭法庭审訊，被判極刑，賴律师亚历山大洛夫沉痛之辯护，得获无罪判决之始末。余通讀后，不禁为之驚嘆，憂喜交集。蘇秀利奇不过一少女，外观上似敢为暴逆之行，第細察其精神所在，蓋爱国之情难抑，欲舍命誅奸，以雪蒼生之冤，其美志虽百世之后，犹足激发懦夫。而律师之仗义，陪审官之果断，皆足为后人法。抑俄国設警所以防禍，乃反釀禍患，其事固足为后世为政者之殷鑑。然則玆事有关国势民情至深且大，予豈忍置諸筐底，为蠹魚之食哉！乃抄譯刊行，以供世之閱覽云。"

日本的民主派們，就是这样地看待反对專制政治的民粹派运动。但自由民权运动衰落后，不久便把俄国革命运动忘怀了，繼之而来的，則为北方强国沙俄的南进。

明治二十年（1887），事实上沙俄在远东的扩張也是突飞猛进的。由于俄国在远东的扩張，便逐漸和久已窺伺朝鮮、中国的日本发生冲突，日本統治阶級經常对人民进行所謂"北方之威胁"的宣傳。

当时在較完整地向日本介紹社会主义方面著有声誉的民友社，自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介紹托尔斯泰起，也开始介紹了俄国的文学。

在民友社介紹的俄国文学影响下，日本的知識分子知道了除帝国主义俄国以外，另外还有一个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給这以后的日本文学和文学家以深刻影响。这便成为喚起知識分子对1917年革命的共鳴的原因之一。

明治三十年（1898），日本也第一次发生了近代的工人运动，及至明治三十七年（1904）日俄战爭时期，出現了站在社会主义立場反对帝国主义战爭的新聞周刊——"平民新聞"。此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便扩大到全国，并和国际上发生了联系。

正在这时，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知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和活动。

"平民新聞"及其后身的"直言"，經常刊載革命的記事。"平民新聞"还早在日俄开战一月之后，就发表了如下的以日本社会党名义向俄国呼吁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爭的一封信：

"与俄国社会党書

俄国的同志們！兄弟姊妹們！我們虽各在天涯海角，未得共聚一堂握手言欢，而我們知道你們，思念你們已久。

自1884年你們在虚无党、恐怖主义者以外另竪起社会民主党旗帜，在工人农民中間宣傳正义人道的主

又以来，已值二十年，其間遭受暴虐政府的迫害，陰險特务的罗織，实古今所罕見。你們前輩的烈士，或因此弃一代之名拋千金之誉，遭受流离坎坷之苦，或被拘于彼得堡监獄受辱，或在西伯利亞矿山服苦役，或作絞刑台下之鬼，或为路旁之丘者不知几万千。而你們的运动并未見絲毫頓挫，你們的勇气却历一难而增百倍，終于去冬結全俄各团体为一体，其势冲天。我們平日每想起你們苦心慘澹的情形，实不胜同情；看到你們的坚貞不屈，则更加感奋。可以說为了我們偉大的主义，为了社会的蒼生，我們有了这样可靠的同志、兄弟和姊妹，是何等的幸福！……

我們固然不能預知两国政府的胜敗何如；但不管任何一方胜利，战爭的結果必定是人民生活的更加困苦、負担重稅、道德頹廢和軍国主义的跋扈。故我們不应考慮誰胜誰敗，重要的是尽速停止战爭，早日实現和平。我們必須坚决地反对战爭。1870年普法战爭当时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議和活动，应为我們所仿效，相信你們也定有同感。

我們是同志，是兄弟姊妹，我們之間决无任何作战的理由；而我們的共同仇敌——恶魔，正猛烈地吐出凶焰，伸出毒手，凌辱百万生民，这实在是我們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奋起团結一致的时机。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語，实为今日所必須实現的。願共同努力。

同志們！当你們的暴虐政府和杀人不眨眼的特务迫害你們的时候，当你們为着社会主义而蒙受苦难的时候，請牢記着：在三千里外，有成千成万的同志、兄弟姊妹正在以最大的同情祝你們健康和成功。"（"平民新聞"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号，引自片山潜"日本的劳动运动"，岩波文庫版）

"火星"报曾发表一封回信。得到該信英譯文的"平民新聞"，便以"俄国社会党的来信"为題譯載于該报的七月二十四日第三十七号上。日本的呼吁，正如复信中所指出的，虽有"虚无党以外等等"的誤解，但作为呼吁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最早的文件，是值得注意的。

在其后的八月，普列汗諾夫和片山潜緊密握手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直言"曾作了如下的报导：

"文明史上的光彩

八月十四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大会上，日本社会党代表片山潜氏被选为副議長，他站在为数十国代表所凝視的講台上和俄国同志普列汗諾夫氏緊密地握起手来，共同表示了对两国政府在远东野蛮行为的痛恨，流露出同胞相爱之情，在滿場欢呼的掌声中走下講台。文明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件，便出現在这一瞬間。我們高兴的是片山完全代表了我們的同志，同时也認为这是文明史上的大事，全人类都应予以感謝。"（"直言"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五日）

两国社会主义者团結的思想，远在十月革命以前就被培育起来了。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革命爆发后不久，二月二十九日的"直言"就曾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俄国革命的教訓"的社論。社論中介紹了俄国十九世紀的革命运动、妇女的覚醒、民粹派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的組織与活动，并如下地論述了1905年一月的革命：

"过去任何国家的历史，一般地都是首先完成政治革命，而后才进行經济革命，前者需用很大的膂力和武力，后者則以投票权和同盟罢工为武器。惟俄国革命由于同时实現民权自由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乃同时并用了个人膂力手段和同盟罢工。不过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同盟罢工远比暗杀手段效果要大这一点，是任人皆知的。

今天的革命运动，无疑地有着各阶層的参加；但是促成这一趋势并起主要作用的，实为上述'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两派。"

最后結語写道：

"上述革命运动的历史給我們以什么教訓呢？

第一，革命之到来并非一朝一夕，而其成功也决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往往需要很長的年月和很大的牺牲。然而經过長期和重大牺牲后一旦萌发的革命思想，也决不会輕易地消失，迟早是不爆发为大冲突、大破裂决不会罢休的。

教育的普及、知識的进步促进了俄国人民覚醒这一点，从当时出現的認为欲防止革命必严加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主張这一点，也可以窺知。但是在俄国，它并未收到任何成效。

尤足惊异的是警察力量的无效。俄国警察的严酷、偵探的机敏为古今所罕見，二十年来逮捕了数万政治犯，为捕获一名犯人花費数万元巨款，亦不稀罕，然而革命思想并未因而有絲毫衰退，俄国警察力量眞是无能已極。

假如俄国政府稍有尊重人权、自由之意，早在十年二十年前頒布宪法創設国会，給人民以发洩不滿之权，可能不致染成如此可悪可怕的血腥历史。因此我們每讀俄国革命史便深感很多自戒自奋之处。"

接受活生生的革命經驗是重要的，尤其重要的应

該注意工人罢工的作用和民主权利的意义。

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在日俄战争中被俘的俄国俘虏也进行了工作(片山潜“日本的劳动运动”)，其中之一便是发表在三月十九日“直言”上的“告俘虜們！”的社論，其結語如下：

“請你們牢記着！二十世紀初年的俄国犹同十九世紀初年的法国，西欧各国的革命往往是等待着法国的信号，現在东方各殖民地国家，急待俄国革命信号来恢复独立，——看中国！朝鮮！我們豈能不渴望你們的发奋！”

这无疑地是英明的預見。这些在半个世紀后的今天，我們已亲眼看到几乎全部实现了。

1905年革命的影响，从1907年出現而一直流傳到大正、昭和时代的“革命歌”中“我們的同胞在俄国不是正高喊着不自由毋宁死嗎”一节便清楚表明了。

由于幸德事件，使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被鎮压下去了，直到1915年（大正四年）才又展开活动。但是当1915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以“新社会”为中心展开“小起事”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这里必須指出的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战爭则是坚持着幸德秋水以来“平民社”的革命傳統，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爭的立場。由于站在这种立場，才能以最大的共鳴来迎接1917年的俄国革命。

支持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1917年（大正六年）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从二月革命爆发时起，报紙上就以外电或莫斯科特电將革命的演变迅速地傳到日本。例如报导当时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列宁格勒)三月八日要求和平和面包的示威的消息，就登載在三天后的三月十一日的日本报紙上。这个消息在日本国內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

最銳敏地理解二月革命的当然是受到1905年革命洗禮（当然指精神上的）的少数社会主义者。他們虽然剛剛走出幸德事件以来的“低潮期”，但堺利彥等的“新社会”杂志在五月号以后几乎每期都以最大的共鳴报导二月革命的消息。

約三十名在京的社会主义者，在紀念五一节同时，于五月一日密集于东京市芝区新澀田町律师山崎今朝氏家中，共同作出了支持二月革命的决議书，通过外国社会党以“东京社会主义者团实行委員会”名义轉送俄国①，并发表在片山潜在美国出版的“平民”杂志上。在俄国，則由片山潜的友人路特卡斯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代为宣讀。全文如下：

“我們日本社会主义者，在1917年五月一日集会于东京，謹向以我們驚羡目光注視着的俄国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們認为俄国革命，是反抗中世紀專制制度的資产阶級政治革命；同时也是反抗現代資本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級革命。俄国革命之轉化为世界革命，不仅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問題。

目前資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已經发展到最高阶段，我們已經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了。

只要各国社会主义者，不願作帝国主义思想上的俘虜，就必須堅定地站在国际主义立場。国际工人阶級的全力必須指向其共同敌人——世界資本主义。工人阶級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我們認为俄国社会主义者为了結束战爭，为了使交战国的工人阶級达到这一目的，必須用全力將現在战壕中指向他兄弟們的槍口轉向他們本国的統治阶級。我們完全信任俄国社会主义者和全世界同志們的勇敢和果断。”

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收到这份决議书后，立即表示同意，并作出了認为这样会給在困难形势下斗爭的日本同志以鼓励的决議②。

日本送来的这份决議书，大体上看来相当正确地判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声明繼續帝国主义战爭的克倫斯基政府的政策，呼吁立即停止战爭实现和平。它之对于二月革命所以能有如此正确的反响，是因为在“低潮期”，仍坚决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爭立場的緣故。

俄国革命的胜利，是馬克思主义革命理論在俄国社会的实踐这一事实，給社会主义者以勇气和信心，推动了他們的奋起。

不过他們在当时对于群众运动还沒有直接的影响力，他們的运动还可說是小集团运动。

作为工人运动，尽管是只有以友爱会为中心的运动，且是宣傳着劳資协調主义的，但是下層的群众則通过罢工运动，逐漸地把工会变为战斗性的組織。

关于知識分子、小資产阶級的运动，可举出有名

---

① 这次集会的消息曾发表在“新社会”上，上面写的是在五月七日。笔者詢問山崎老人时，老人回答說，实际集会是在五月一日，而发表时則写为五月七日。“世界”十一月号发表的山川均氏的回忆，也說集会是在五月一日。

② 引自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記录。在会議上宣讀的决議書也写为五月一日集会。

的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不仅沒有参加工人运动，且也沒有正确認識到民主主义运动的意义。因而，只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場批判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不徹底性，还沒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参加这种运动，并在其中起領导作用，努力把这种运动跟社会主义运动結合起来。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所謂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庸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混合物，还不理解馬克思主义思想的緣故。

馬克思主义理論水平还很低，当然对于布尔什維克更是完全无知的。因此就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間，也几乎沒有人知道列宁的名字，所以很难理解二月革命的实质。例如直到同年八月的"新社会"的論文，关于克倫斯基、齐赫芝和布尔什維克的区别仍不清楚。直到十月号发表了列宁的論文（"俄国的革命"）后才知道了二月革命的眞相。其后在十二月号上山川均写了"暴風之前"一文，論述了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意义。

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說来，支持俄国革命与否，便是是否走馬克思主义道路的問題。另外，这时出現于明治时代的庸俗社会主义——如基督教社会主义——絕迹了。无政府主义者中間，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如荒烟寒村（他在七月加入"新社会"）开始接近馬克思主义；另一部分如始終不能理解俄国革命的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更加堅持其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場。因之产生了后来所謂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的論战，起了促成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分化的作用，并以此为契机，馬克思主义逐漸确立起来。从这一意义来看，俄国革命实为日本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大事件。

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的反响

下面拟从各方面具体分析一下俄国革命对当时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工人运动，随着在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出現的工业繁荣而逐漸高漲起来。关于工人表示同情俄国革命，感到革命实現了全世界工人阶級的理想，認为是其事业的先驅者的，有如下的文章：

"先驅者的悲哀　　福岡　山崎国三

充当世界悲剧主角的是俄国人民，毫不妥协的俄国人民在資本主义全盛的世界中，为实現劳动主义理想发动了乾坤一擲的革命。由于四面都是敌人，他們也是很难一下子就能实現理想的。但是不起来斗爭怎能够实現呢？假如沒有人奋起，世界无产阶級是永远不能摆脫奴隶境遇的。俄国人民作为先驅者奋起了，現在俄国人民正尝試着先驅者的苦痛与悲哀。"（友爱会机关刊物"劳动与产业"，大正七年十一月号）

十月革命使日本工人阶級感到了新世界的誕生，虽然認为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但对工人說来却是开辟了前途充滿希望的道路，給他們的生活以光明。

"給了活下去的希望　　仙台　原田忠一

我过去这样講給孩子听，几乎是成了口头語。你們出生在我这样貧穷的职工家庭是最大的不幸而死心塌地吧！你們一定是和我同样地过着无知、貧困的生活，怎么着急也是沒有一点当官发財的希望的。假如你們中間誰有这种野心，反会成为不幸的根源，因为今天的世界就是为了使我們不能抬头那样創造出来的。因此，无可奈何的你們，不死心也得死心，你們学点吃飯的本領，做个职工活下去吧！別想入非非。

然而，西伯利亞爆发了迅雷霹靂般的大革命，一刹那間天下掌握在工人手中。这是我从来不曾想过的事，一时竟慌張起来；但是事实上西伯利亞确实出現了这样的世界。我高兴的跳了起来，跑进家門紧紧地摟住孩子，这样嚷道：'喂！小傢伙們，别再担憂了，你們也能取得政权！也能当总理大臣！'西伯利亞的革命可說是給了我們活下去的希望了。"（同上，1918年十月号）

关于俄国革命的原因，工人粗淺的理解如下：

"尽管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由于貧富的悬殊人民生活困难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八幡，R.A）；"俄国革命……可說是。同盟罢工之最大者'"（神戶，立花秋太郎），又有写出他們对于專制政治看法的，"看来很强实則意外脆弱的是專制力量，一旦遇到民众奋起，較朽木尤不如。看着軟弱的民众，一旦呼应而起，盛極一时的政府就会現出一触即潰的醜态"（大阪，南政市）；"'驕侈的平氏、傲慢的罗曼諾夫家并未长久'，这一回輪到誰了"（神戶，唯雄）。对日本和世界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归根結底，俄国革命是資本家和工人的战爭，反过来看看我們大日本帝国……几乎相当于俄国革命前的社会狀态…"（南千住，松村信一）；"令人愉快的是过去認为所謂社会主义不过是学者的空想，現在却实現了——尽管是初步的生产机構的公有和土地的分配"（大島町，深川中嶺）。从这些感想便可了解友爱会的劳資协

調主义已开始动摇了。不过这些只是先进人士的談話，还不能以此推知全体工人、更不用說全体人民的思想了，但可作为窺知群众情緒发生变化的标志。（均引自前揭杂志，十、十一月号）

农民怎样对待这次革命呢？农民和工人不同，由于当时还沒有农民組織，因而看不到出現在其机关报上的意見。总同盟的德永正报氏的回忆中曾这样談到：俄国革命时期德永氏的家乡訂报看的人家还很少，他家就是其中之一，来他家洗澡的农民曾把报紙上的記事当作話題。当然俄国革命也成了話題。虽然都贊成“发生革命，地主的土地被沒收，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的記事，但認为“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嗎”而不相信。这充分說明了易于怀疑的农民心理。

詳細知道革命对知識分子的影响也是困难的。試看窺知其影响綫索之一的秋田雨雀的“雨雀自傳”，上面曾記载着当时的各种感想和回忆。認为俄国革命就是高尔基等科学主义的“西方主义”对帝政末期艺术的安得列耶夫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傾向即东方主义的胜利，便是其中的感想之一。此外，該书还写道：“白樺”派这种人道主义思潮出現了分裂的征兆，与有島武郎深夜談論索来列亞的“俄国革命和战爭”等书，或閱讀代表欧洲空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哥尔德曼“少数和多数”等等，另外还有如下的一节：

“三月（1918年——引者），片上伸从‘十月風暴’中归来。我們圍住片上打听俄国的情形。片上对于俄国的社会性几乎什么也沒有談。他拿出从俄国帶回的像馬粪般的一片黑面包給大家看，介紹了当时俄国食粮缺乏的情况。但是他說俄国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时代，文学仍然沒有衰頹下去，并介紹了馬雅可夫斯基一派的未来派运动。片上归国后不久，駐俄大使內田（康哉——引者）曾在报紙上发表談話，他說苏維埃的社会意向决不是不健全的，各国应注視苏維埃的情况。这种談話的另一作用，則使出兵西伯利亞主張获得压倒优势。”

我們也能够看到受到托尔斯泰影响的知識分子对革命前途的关怀，和期待从革命中产生新精神的情形。（其后至1922年出現了圍繞着有島武郎的“一个宣言”关于文学的阶級性的爭論，这在未来社出版的“現代日本文学論爭史”上卷有介紹文字。这些便成为日本无产阶級文学运动的思想基础。）

二月革命后，昇曙夢氏写出了“俄国革命和社会运动”一书，这虽然还不能断定，是否能算是革命对知識分子的影响，但其中对于俄国革命运动史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作了就是在今天看来大体上仍不失为正确的介紹；此外，該书还反对当时报紙上認为俄国革命即將失敗的說法，預言到革命的成功。

这本书在介紹俄国革命实况方面，可說是起了先驅作用，在向加入早期“新人会”的学生和进步的知識分子介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維克情况有很大功績。

以后还將要談到的，就是在俄国革命时期有数名日本新聞記者駐在当时俄国的首都彼得格勒，这些人大多数都曾在报紙上发表过俄国革命的見聞录。当时的日本人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內，通过这些見聞录和这些記者所写的书虽然大体上知道了俄国革命的情况，但是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和讀者都沒有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知識，所以还沒有很好地認識到革命的意义。

民主主义者反对出兵西伯利亞

大正初期的所謂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曾发展为推翻第二次西园寺內閣和第三次桂內閣等官僚內閣那般强大的群众运动。民主主义思想曾風靡当时的主要报紙和杂志。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者吉野作造、大山郁夫、福田德三等通过“大阪朝日新聞”、“中央公論”对輿論有很大的影响力。关于社会主义者沒有参加这一运动，只停止在从外部来批判的情况前面已談到了，1917—18年也仍然是如此的。这可能是一方面限于当时馬克思主义理論水平和列宁主义还沒有傳入（例如“新社会”1917年八月山川均的論文），另一方面則由于还沒有擺脫无政府工团主义（如“新社会”第二年一月荒畑氏論文）的影响。我們虽不应用今天的标准来批判它，但沒有給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以正确評价这一点，在实踐上不能不給以后遺留下很大的缺欠。

这些思潮对于俄国革命表示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当时日本新聞杂志中表現出最有見識的是明治普选运动以来站在民主主义立場的“东洋經济新报”。該报1917年六月五日的社論，已經正确地認識到俄国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和平，工农政府主張和平，而人民也支持它。十月革命后，1918年一月十五日刊载了苏維埃政府的和平宣言。“大阪朝日新聞”也介紹了这个和平宣言。另外在“中央公論”一月号上，吉野作造也談到了不应該輕視苏維埃政权。（羽仁五郎“十月革命对日本的影响”，載于“赤旗”1957年十月二十三日）

民主主义的理論上的指导者們，虽然对于二月革命表示了好感，但是对于十月革命則不一定是积極支

持的。例如当时新起的政治評論家参加“中央公論”的大山郁夫，在“世界民主化傾向和俄国革命”（該刊大正六年四月号）一文中，認为二月革命是自由主义对官僚政治的胜利，寄予很大希望；对于十月革命，则在其发表在第二年五月号“中央公論”上的“过小估价俄国过激派实力和过高評价其政治思想价值”論文中，尽管承認苏維埃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但在理論上却認为社会主义經济沒有发展的可能性，批評无产阶級專政是“民主的变相衰落”。当时他認为比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他大概在1922年以后才成为馬克思主义者）这种看法不能单純認为是不了解革命实情，根本是从其思想立場出发的。

然而猛烈地攻击、徹底揭露出兵西伯利亞計划的，也是这些民主主义者。这是出于他們的正义感。斗爭直到1922年撤兵止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东洋經济新报”在1918年三月五日的社論中，对出兵計划发出警告說：“如果日本錯誤地动兵与俄国人民为敌，必將遺下永远不可挽回的灾难”，并在三月十五日的該报上主張“与俄国人民为友”。吉野作造也在1918年四月号上发表“所謂出兵論的合理根据何在？”一文，成为运动的急先鋒。

另一方面，寺內內閣則从七月底起禁止报导出兵西伯利亞消息，压制言論以图避免人民的动盪。但当大山郁夫从在西伯利亞的“朝日新聞”記者通訊中知道了出兵計划后，立刻在“大阪朝日新聞”上发表文章，徹底揭露其侵略意图，因之当天的“朝日新聞”竟被禁止发行。

这时的“朝日新聞”虽被認为是知識分子的报紙，但在該报的“鉄扫”欄也曾发表了来稿，反对在报紙上給布尔什維克加上“过激派”字样，認为这次革命是由具有明确的布尔什維克綱領的政党完成的，而不是什么“过激派”。

以上就是直到1918年年中日本国內对俄国革命的直接反响，特别是思想上的反响。而作为工人阶級和群众运动来說，还不是支持苏維埃政权并与之有联系的运动，仅仅停止在部分的思想支持和精神上的同情，然而在其背后却潛伏着更大的变化。在寺內軍閥內閣統治时期，群众的情緒就逐漸广泛而深刻地动盪起来了。

日本政府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

另一方面，統治阶級和政府的絕大部分人認为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維克不久就会失敗的，于是便基于其阶級利益，以参謀本部和外务省为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便起而干涉。最先是十一月十四日在满洲里对苏維埃政权宣战的哥薩克謝米諾夫上尉和关东軍参謀部取得联系，繼而駐俄的欧洲战綫观战武官、参謀本部的荒木貞夫中校也和他勾結起来。第二年一月一日，便公然派出两艘軍艦借口保护侨民非法侵入海参崴，不久又派遣陆战队登陆干涉該地的苏維埃。統治阶級不只是要扼杀革命，还企图对抗英法攫取远东霸权，統治西伯利亞、北滿、內蒙古，占据压迫中国的优越地位。这就是日本統治阶級和寺內軍閥內閣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

1918年五月起米价暴漲，群众不滿迅速增大。寺內首相在五月間的地方长官会議上就曾指示：由于民众的生活非常困难，“資本家和工人生活悬殊”，必須警惕在“外国”影响下正在发生“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之变化”。原敬的五月十五日的日記中也有如下的一段：“山县和后藤的談話中，曾談到必須引导国民思想趋向軍国，严禁我国过激派和我国社会主义者通信；另外大藏省方面一旦有事时如何籌措軍費，农商务省在一旦有事时如何供应粮食等等，这些問題都应作充分的調查，以备有事……”（“原敬日記”七卷。山县即山县有朋，后藤指后藤新平）从“振奋頽廢的人心”（后藤新平）这一点来看，也是急于出兵西伯利亞的。于是便以美国的同意作为垫脚石，在八月三日以“根据美国提議，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軍队”的名义，发表出兵宣言，派出七万五千軍队到西伯利亞。这里我們把上面談到的各阶層人民对于俄国革命的反响和政府的态度相比較，便可以看出它是迥然不同的。日本統治阶級經常隐瞞这种不同，但是事实确是如此。

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不仅使世界資本主义体系陷入了总危机，也給日本資本主义帶来了总危机。群众和社会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的反响，就反映在这一客观过程上。当然統治阶級和政府，是无从知道这种反响的背后潛伏着的深刻危机和群众的力量的。国內立即頻于米騷动的危机；在国外，不久便遭致干涉西伯利亞的慘敗。（待續）

（楊　輝譯自日本“前衞”杂志1957年十二月号）

在教学中如何闡明西欧封建制度的发生

周庆基

人类历史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这一經济規律的体現。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不同，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制社会的飞跃，也就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

一般說来，西歐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是这一飞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在那里，奴隶、隶农革命和"蛮族"的入侵推翻了罗馬奴隶主阶級的政权，新的封建制度在奴隶制度的廢墟上发生了，旧質态到新質态的轉化过程采用了爆发的形式。

因此，在教学中闡明西歐封建制度发生的問題，是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学生領会了这个問題，则不难理解东欧和亞洲各国封建制度发生的不同形式，也就易于掌握中世紀初期世界历史中的最基本的內容。

根据我个人的經驗，学生对西欧封建制度发生問題往往弄不清楚。原因不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現象非常复杂，不容易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本質的东西；其次，西欧封建制度几乎是同时在許多国家发生的，在一一叙述的情况下，很难使学生有一个比較系統的概念；此外，在一般的世界史書籍中，許多名詞的定义不甚明确，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本文的目的：首先，打算指出哪一些問題是西欧封建制度发生中的最主要的問題以及在教学中应該如何闡明它們；然后，再以法蘭克为例說明如何給予学生以西欧封建制度发生的系統和具体的概念；与此同时，对某一些名詞則給予較詳尽的解釋。

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其中錯誤之处当所难免，希望批評指正。

一 罗馬社会內部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問題

关于西欧封建制度的发生，馬克思曾經写道："在一切征服中可以有三种情况。征服民族或者把它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或者該原来的生产方式維持下去，滿足于征收貢納……；或者由于互相影响，产生一种新的、綜合的制度（日耳曼人的征服中有一部分就是如此）。"①因此，在說明西欧封建制度发生以前，应先从罗馬帝国和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內部寻找其根源。

如所周知，在罗馬帝国內部曾出現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在講授这部分时，必須將罗馬奴隶制度的衰落和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原因、隶农和特許析产奴隶的地位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旧的上層建筑的矛盾諸問題闡述清楚，否則学生无法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发生有較深刻的理解。

在說明罗馬奴隶制度的衰落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时，首先应具体指出当时罗馬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片面地强調奴隶对劳动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奴隶对劳动从来就不感兴趣，只有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时，奴隶对劳动不感兴趣这一事实才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在說明这一問題时，必須指出早在公元前后罗馬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当时在罗馬出現了帶有两个輪的犂，細作农业广泛发展，水磨开始使用，此外，釀酒和榨油的方法也有所改进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奴隶对劳动不感兴趣，經常毀坏工具，排斥了这些較精細的工具的使用，所以奴隶制生产关系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致使奴隶主阶級也感到使用奴隶劳动无利可图。这也說明了为什么不是公元前二世紀的加图，而是公元一世紀的科琉美拉在他的著作中抱怨道："我們把耕耘土地之举委之于技术拙劣的奴隶，正好像把土地交給劊子手去处决一样……。"③这样，不仅使学生了解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和最革命的并且是生产发展过程中决定的要素，并且使其認識奴隶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

①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0頁。

② 参閱王滌："論罗馬奴隶制經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③ 論农业，緒言，轉引自阿·格·薄克什察宁："論古代奴隶社会的崩潰問題"，"历史問題譯丛"，1954年第3輯。

力的发展最后又否定了奴隶制本身这一过程。

其次，应指出奴隶的斗爭在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起着巨大作用。斯巴达卡斯起义曾給予罗馬奴隶主阶級以極其沉重的打击。其后，奴隶并未終止他們的斗爭，如公元前48年塞里阿斯·魯法斯运动所表現的那样。在屋大維和塞克斯都·龐培作战时，曾有三万多名奴隶拿起武器反对罗馬奴隶主国家。帝国建立后，虽然奴隶主阶級加强了他們的統治，但是奴隶仍然采用各种方式来反对他們的剝削者，奴隶杀死主人的事件数見不鮮，使奴隶主們产生了对奴隶極为恐惧的心理，以致当时的哲学家辛尼加也主張寬待奴隶。应該估計到这一系列的奴隶的斗爭，曾迫使罗馬奴隶主阶級改变剝削的方法，推动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

再者，商品貨幣关系的衰落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应予以闡明。商品生产可以和任何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但不能創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共和时代罗馬商业的发展，曾使罗馬的家長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資料为目标的奴隶制度轉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奴隶制度，奴隶制的庄园皆被卷入商业中，加图在他的“論农业”中，曾主張庄园应設在大城市、海洋和河流的附近，以便运輸和出售产品。但是，公元前一至二世紀时，意大利的农业品(主要是葡萄酒和橄欖油)受到了高盧和西班牙的农业品的排挤，縮小了它的銷售市場，商品貨幣关系在罗馬开始衰落下来，致使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售农产品的奴隶制庄园无利可图，此外，前一时期商品貨幣关系发展的結果，許多中等土地所有者在和大土地所有者竞爭中失敗，趋于破产，破产的中等土地所有者无力养活奴隶，更感到奴隶成为他們的贅疣。正如恩格斯所說：“但庄园及其园艺，却随着主人的貧穷和城市的荒涼而日趋衰落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經济，再也不能获利了。”①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

將以上三方面闡述明白后，再对奴隶来源枯竭等其他因素予以說明，則学生对罗馬奴隶制衰落和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闡明了罗馬奴隶制衰落和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原因之后，应更进一步指出隶农和特許析产奴隶在生产中的地位，这样才能使学生对罗馬社会內部封建生产关系萌芽有具体的認識。

首先談到隶农，在說明罗馬隶农的地位时，应注意它的发展和变化。隶农拉丁文为 Colonus，最初是指一切自耕农，到了共和末期，小佃戶被称为隶农。公元一世紀，奴隶制衰落的征兆即已出現，將土地租給隶农的办法盛行起来。当时隶农的地位可从科琉美拉的著作中窺見一斑。由于商品貨幣关系在那时还未完全趋于衰落，隶农向大土地所有者繳納的租金主要是貨幣，有时也要繳納实物貢賦。不过，隶农对大土地所有者負債在当时已經不是罕有的現象了。公元二世紀时，隶农制度更加发展，不仅是隶农的数目增多，隶农的地位也日益惡化。在这时期实物貢賦开始代替貨幣租金，同时，由于租稅的苛重，隶农无法償淸他們的債务，日益依附于大土地所有者。外省的隶农的情况更为惡劣，他們不仅要繳納实物貢賦和服劳役，还要繳納国稅②。在外省，罗馬皇帝自元老院議員手中沒收了大塊土地，成立帝室庄园，帝室庄园中的隶农应繳納麦类和橄欖的收获量三分之一，豆类收获量的四分之一，并且在一年中还要服几次劳役。

自公元三世紀起，隶农的地位急剧惡化。大土地所有者力图把隶农束縛在土地上。这时的隶农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已經不再是建立在契約上，隶农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者，終身束縛在土地上，并把这种地位傳給他們的子孙。公元四世紀以后，罗馬奴隶主国家为了保障国庫的收入，更用立法手段把这一点固定化了。例如君士坦丁、发楞提安和发楞特等都頒布过禁止隶农迁移的法令。此外，隶农所固有的自由公民权利亦被剝夺殆尽。

仅說明隶农地位的变化还是不够，必須还要指出他們和后来的农奴的不同，这一点对学生理解以后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把隶农制与农奴制区别开来，会使学生产生封建所有制在罗馬帝国末期业已形成的錯誤概念③。在帝国末期，隶农的地位是和奴隶接近的，他們对自己所耕耘的土地沒有稳固可靠的使用权，后来他們又丧失了支配自己財产的权利。公元395年，阿卡狄和赫諾留曾在勅令中，指出隶农的全部財产皆属于主人。此外，隶农也无权在民事案件中对主人起訴，并且不能和别人簽訂契約。到了公元五世紀末，隶农常常和奴隶用一个名詞——Macipia 来表示④。

闡明了隶农的地位以后，应再向学生說明罗馬特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98頁。

② 参閱A.Г.根普：“晚期罗馬帝国的特利布塔里隶农和因克維林”，載“史学譯丛”，1956年第2期。

③ 苏联学者施塔耶尔曼認为在罗馬帝国末期封建所有制已形成，但多数苏联学者都反对此意見。

④ 参閱A.P.科尔松斯基：“論四至五世紀时罗馬帝国西部各省中奴隶、被释放奴隶与隶农的地位”，載“史学譯丛”，1955年第1期。

許析产奴隶的地位。按，特許析产拉丁文为 Peculium，意指奴隶所积蓄的财产；后来奴隶主將土地交付奴隶耕种，向他們征收貢賦，这种奴隶称为特許析产奴隶。公元一世紀，由于奴隶制衰落的征兆的出現，奴隶主將土地交給特許析产奴隶的現象普遍起来了。特許析产奴隶的地位又是如何呢？特許析产奴隶虽然具有某种經济上的独立性，但是他們和奴隶并沒有原則上的区别。特許析产奴隶对自己的财产沒有支配权，他們沒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沒有自己的收获物，他們的一切皆被認为是主人所有，主人可随时收回他們耕耘的地段，他們死后应將財产的半数留給主人，有的甚至要將全部財产交給主人。同时，特許析产奴隶也不能和別人訂立契約，不能以証人或起訴人的身分来反对他們的主人。此外，特許析产奴隶还不能服兵役。关于特許析产奴隶的地位在帝国末期和查士丁尼时代的立法中皆有詳細的規定①。

封建社会內的农奴則与奴隶和特許析产奴隶不同，虽然农奴們的地位亦不尽相同，并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总的說来，农奴的土地使用权是稳固的，他們拥有一些生产資料，包括农具、牲畜、种籽和房屋。他們独立經营着农业和其他副业。封建領主主要通过地租形式向他們进行剝削，他們所保有一小部分的財产是巩固的。在法律地位上，他們不是完全沒有人格，領主不能任意屠杀他們，他們可以与別人訂立契約，可以自由处理自己所保有的一部分財产，也可以服兵役（当然，在当时兵役与其說是权利不如說是义务）。

由此可見，隶农和特許析产制都只是罗馬奴隶制社会內部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隶农和特許析产奴隶不同于后来的农奴，而是恩格斯所說的“中世紀农奴的先驅”②。

在闡明了罗馬奴隶的衰落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以及隶农和特許析产奴隶的地位后，应向学生指出在罗馬帝国內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萌芽和旧的上層建筑間的关系，也就是說明西欧自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社会为何采取爆发的形式。

隶农制和特許析产制皆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因为隶农和特許析产奴隶具有农奴的某些特征，他們都是独立地經营着自己的經济，都是个体的直接生产者。然而，奴隶制社会的上層建筑極力阻止他們成为有自己的經济和生产工具并具有某种劳动兴趣的眞正的农奴，也就是極力阻止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但是应該說明的是：晚期罗馬帝国的上層建筑不是单純的奴隶主阶級的思想体系，同时，这个时期的奴隶主的思想体系和奴隶制发展时期的也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明白当时思想意識的复杂性和統治阶級政策的矛盾性。某些学者把君士坦丁描写为代表新兴大地主阶級利益的君主就是因为不理解这点。虽然如此，在晚期罗馬帝国占統治地位的上層建筑仍是奴隶主的上層建筑，旨在巩固奴隶主的政权和奴隶制度③。

說明罗馬旧的上層建筑阻碍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时，应首先說明奴隶主国家如何力图使隶农降到和奴隶相近的地位，除以上举出的限制隶农的法令外，又如422年罗馬皇帝赫諾留曾頒布禁止隶农簽訂契約的法令，其后，在发楞提安三世的法令中，又授权法官如拷打奴隶一样地拷打隶农。此外，帝国末期的法律否認隶农和自由人的結婚是合法的，这一切都說明了旧的上層建筑曾阻止隶农变成眞正的农奴。

其次，应該說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在罗馬帝国中已經出現，但是奴隶主阶級仍然尽一切力量来維护奴隶制度，他們决不輕易放弃使用奴隶劳动，奴隶制度在当时仍占优势便可証明这点，这也阻碍了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此外，奴隶制国家还要向隶农压榨大量的捐税，促使隶农經济地位的惡化。同时，奴隶制社会的道德对劳动又采取鄙視态度，自由民輕視体力劳动，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的隶农在自由民的心目中与奴隶无別。这一切也不利于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最后应总結說明：在罗馬帝国初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奴隶制度开始趋于衰落，出現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公元三世紀以后，奴隶制危机加深，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奴隶制的上層建筑阻碍这个新的因素进一步地发展，因此，只有在奴隶、隶农革命推翻了罗馬奴隶主国家后，眞正的封建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在西欧发生。

二　古代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問題

西欧的封建制度旣是罗馬社会中的因素和日耳曼人社会中的因素互相影响所产生的新制度，所以，闡明古代日耳曼人社会制度中的因素，也是使学生理解

---

① 参閱王藻：“論罗馬帝国后期封建因素的萌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98頁。

③ 关于基础与上層建筑的問題，参閱布·布罗德斯基：“基础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和〔苏〕“哲学問題”杂志編輯部：“評編輯部收到的論文”兩文，載“学習譯丛”，1957年第10期。

西欧封建制度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說明这个問題时，应从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上着手。

和其他人民一样，古代日耳曼人也是过着氏族制度的生活，恩格斯曾經指出："日耳曼人，直至各族人民大迁徙为止，曾組織成为氏族，那是不可置疑的。"①凱撒在他的"高盧战紀"中曾对公元前一世紀日耳曼人的生活和社会情况作过一番簡单的叙述。当时日耳曼人的主要职业是畜牧和狩猎，以奶酪和肉类为食品，农业还处于原始阶段，經常更換耕地。土地由全氏族共同使用，沒有阶級，也沒有阶級压迫的机構——国家。

經过一个半世紀，罗馬作家塔西佗曾經在他的著作中詳細地描写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已有較高的发展。鉄器出現了，农业技术也有了进步，开始有較固定的村落，制陶和冶金等手工业已經萌芽，此外，并知道用盐和黄金从事交换。日耳曼人当时已处于家長制氏族制阶段，并有类似荷馬时代的希腊人和王政时代罗馬人的类似的組織。

应該特別提出的是日耳曼的奴隶制度。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已出現了奴隶。关于日耳曼的奴隶制度，塔西佗这样写道："至于一般的奴隶，不像我們的奴隶这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家务，他們每人都有自已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們对待佃农一样，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屬从关系仅此而已。"②日耳曼的这样的奴隶制度，后来与罗馬的隶农制和特許析产結合，进一步发展为中世紀的农奴制。

但是下面这一系列問題就发生了：为什么日耳曼未能发展为古典的奴隶制社会？对日耳曼这种奴隶制度应該如何理解？事实上这一些問題都常常存在于学生的脑海中。

为了解决这些問題，須考察一下塔西陀时代以后的日耳曼人的历史，同时，必須从日耳曼和罗馬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約方面来研討。但是有关公元二世紀至"民族大迁徙"这一段时期日耳曼人历史的文献甚少，而考古发掘却提供了許多丰富的材料，恩格斯利用这些材料对当时日耳曼人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作了扼要說明③。

公元二世紀后，罗馬和日耳曼的貿易频繁起来。在欧洲大陆，罗馬的商品通过西利西亞沿着奥得河或通过波西米亞沿着易比河輸往日耳曼；在海上，罗馬商船也不断来到北海和波罗的海。在西利西亞和勃蘭登堡等地曾发現有罗馬人的墓葬和什物；在北海沿岸曾发現有大量的罗馬錢幣。由于和罗馬的貿易遂促进了日耳曼人本身生产力的发展。公元三世紀上半期，日耳曼人的手工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什列斯威的塔什堡沼地曾发現了有五金絲編成的鎖子甲和其他的精美的金属器皿；在巴伐利亞又曾发現有精美的玻璃器皿，此外，当时日耳曼的农业和家畜飼养业也很发达，有品种优良的馬和大白牛。公元前二世紀后日耳曼生产力的提高，致使利用奴隶劳动已无利可图，这决定了日耳曼社会不可能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而使其原有的不发展的奴隶制日漸向封建制度轉化。

其次，日耳曼与罗馬发达的奴隶制帝国毗鄰，这样也限制了日耳曼的奴隶制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罗馬的胜利战争减少后，向日耳曼購买奴隶是罗馬奴隶的主要来源，塔西陀也曾記載日耳曼有出卖奴隶的事实。和罗馬的貿易关系发展以后，出卖奴隶成为日耳曼人和罗馬取得貿易平衡的唯一的手段，由于奴隶的大批輸出，也妨碍了日耳曼本土的奴隶制度的发展。

另外，在日耳曼人中間，还有一种亲兵制度。这种制度在別族人民氏族制解体时期也曾有过。这种制度后来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結合起来，发展为中世紀的封建等級制度。亲兵制度虽然不能称为封建因素，但其特点却保留在后来的封建制度中。

由此可得到一个結論：日耳曼人原始公社的解体，奴隶制度并未获得发展，而产生封建因素。罗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的封建因素和罗馬社会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結合在一起，发展为中世紀的封建制度。

三　西欧封建制度发生的問題

奴隶、隶农起义和日耳曼人入侵推翻罗馬的奴隶主的政权，为封建制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但是封建制度不是一下子就取得优势的，而是在長时期中逐漸发展起来的。这一段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長达数百年。首先应向学生說明这一过渡时期較長的原因，也就是要說明西欧封建制度是在处于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日耳曼人入侵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处在氏族制度解体阶段的日耳曼人，在侵入西罗馬帝国以后，曾按照氏族制原則来分配土地，致使在一定时期內，公社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因此，西欧的封建大地产不是直接从奴隶制大地产轉化而来，而是在公社分化和农民破产的長期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此外，当时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85頁。

② 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二十五。三联書店1958年版，第67頁。

③ 参閱恩格斯："論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載"史学譯丛"，1955年第2期。

人类历史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发的过程中，上層建筑的建立远落后于基础的发展，因此封建上層建筑在促进基础的巩固和形成也比較緩慢。当然，这并不是說封建上層建筑并未起任何作用。

西欧封建制度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必須向学生指出西欧封建制发生时期（五、六世紀）社会的主要特征。在闡明这些問題时，应該援引具体史料。

法蘭克的薩利奇法典为研究西欧封建制度发生时期的社会特征，提供了比較丰富的資料。根据这部法典，可以將西欧封建制度发生时期的社会特征归結如下：

首先，应該注意当时基本生产資料——土地的所有制。在西欧封建制度发生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这应該說是日耳曼人入侵的結果。日耳曼人沒收了大部分罗馬奴隶主的地产，由于他們尙处于氏族社会（虽然已开始解体），所以乃照氏族制度的方式进行分配，其后，日耳曼人和当地的罗馬人相处日久，氏族公社也就被农村公社——馬尔克所代替了。在当时公社成員只是世襲地占用土地，而尙不能自由地处理土地。薩利奇法典第五十九章中曾經規定：土地和动产不同，不能傳給女性，必須傳給男性，如果沒有子嗣，則交給公社处理。

这里应該指出的是，在当时已經出現了土地买卖的萌芽，法典第五十八章規定：某人如无力为犯杀人罪的亲属繳納贖罪金时，可以出售自己的份地。土地买卖是公社进一步分化的决定的因素。

除占支配地位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外，大土地所有制当时也发生了。最初的大土地所有者是国王的亲兵、廷官和一部分旧日的罗馬大地主。其后，随着土地买卖的产生，从公社也分化出一些大土地所有者。恩格斯曾經指出：“所以，从那一瞬間起，当自由地一旦变为可以出讓的土地财产，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从那一瞬間起，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間問題了。”①薩利奇法典虽然沒有明白指出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但是却提到在大地产上工作的手工业者。应該注意的是：当时的大地产都是不附有任何条件的、世襲的、可以自由轉讓的大地产，不同于日后的采邑和封土。

其次，应該注意到当时的阶級結構。旣然农业是当时的主要职业，而公社土地所有制又占支配地位，那么农村公社的成員无疑地是当时的基本人口。农村公社的成員在身分上是自由的。他們拥有自己的份地，除对公社負一定义务外，还須負担氏族制度殘留下来的义务。

与农村公社成員同时存在的还有大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包括从国王手中获得大塊恩賜土地的人和农村公社分化出的富有者。大土地所有者不仅經济地位不同于农村公社的成員，在法律地位上也不尽相同，薩利奇法典中規定杀人贖罪金不一致，就反映了这一点。

最复杂同时也最为学生不易了解的問題就是在大地产中劳动的人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了解这个問題也就知道罗馬封建制萌芽和日耳曼封建因素如何綜合在一起，发展为封建制度。

这个問題之所以复杂和不易了解主要是由于史料缺乏和含混不清，一般的教科書对此也未予以充分說明。薩利奇法典中提到奴隶和半自由人的地方很多。根据法典的暗示，奴隶和半自由人是大地产中的主要劳动者②。此外，也有为数不多的失去份地的公社成員在大地产中劳动，成为佃农。所以我們可以說当时在大地产中劳动者的地位是不一致的。奴隶的地位最低下，半自由人地位稍好一点，佃农的地位最好。但是他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自己的經济。奴隶虽然不是法人，但是有自己的固定住所和家业，薩利奇法典中有課奴隶罰金的条款，是可說明这点。这在当时并非新鮮的事，罗馬的特許析产奴隶和古代日耳曼的奴隶都是有自己的財产的。半自由人包括隶农和里特，他們的法律地位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知道他們也是有自己的經济的，只是要向主人繳納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并服劳役。佃农有自己的經济則自不待言，他們和地主的租佃关系最初是有一定期限的，后来变为終身的了。随着日后地租和劳役的慣例的出現，这二种劳动者所負担的义务漸趋相同，法律地位也日益相近，乃溶合一起成为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农奴。

在闡明以上的問題以后，应該向学生做出这样的結論：西欧的封建制度不是一下子代替了奴隶制而成为主导的生产关系。西罗馬奴隶主帝国被推翻以后，公社土地所有制占着优势，公社成員是当时的基本人口。大土地所有制剛剛发生，在大地产上的劳动者的地位还不一致，大地产还沒有成为真正的封土。但是，大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剝削基本上已經是封建制的剝削，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西罗馬帝国灭亡

① 恩格斯：“法蘭克时代”，載“史学譯丛”，1956年第3期，第3—4頁。

② 薩利奇法典，第三十五章，关于杀害和盗劫，將奴隶、半自由人、仆役、手工业者分列在各条中，可見这里所說的奴隶、半自由人不是仆役或手工业者，同时，日耳曼人在以前也是在农業中使用奴隶劳动。

后，封建制度就已經发生了，虽然它在当时尚未臻于成熟并且还不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

四　西欧封建化过程的問題

在說明西欧封建化过程以前，应首先向学生指出封建化是大土地所有制增長和自由农民淪为农奴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不附有任何条件的、世襲的、可以自由轉讓的大地产也轉变为封土，并出現了封建等級制度。

說明西欧封建化过程，必須說明这几个問題，就是大土地所有制增長的基本原因是什么？暴力、欺詐和政治手段对大土地所有制增長起了什么作用？封土制和封建等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农民反抗大土地所有者的斗爭起了什么作用？法蘭克国家的历史为答复以上这些問題，提供了較丰富的材料。

大土地所有制增長的原因实际上也就是自由农民破产的原因，一般的教科書往往忽略了这个問題，很容易給学生一个不正确的观念。自由农民破产的原因应該从經济方面寻找。恩格斯对此已有明确的指示。他写道：“因而，当我們看到，在这一阶級（指大土地占有者阶級——引者）兴起与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手段、暴力与欺詐，怎样往往发生很大的作用，甚至仿佛决定性的作用，那末，关于这，我們千万不要忘記，这种政治手段，只不过用来促进和加速这一个必然的經济过程而已。”①自由农民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无論在何时小农經济都是不巩固的，經不起一連几年的天灾。土地一旦可以轉讓或买卖，土地兼并就必然发生，大土地所有制就必然增長起来。当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出現别的大土地所有制，只能是封建型的大土地所有制。

暴力、欺詐和政治手段是不是起着作用呢，誠如恩格斯所說的起着仿佛决定性的作用。从法蘭克的許多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教会大土地所有者是如何地对小农进行掠夺和欺詐。他們采用捐献、勒索、假造文書以及其他犯罪的方法，来增加他們的地产，世俗的大土地所有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迫使自由农民依附于他們，“委身制”盛行起来。委身制使自由农民变为农奴，例如，某个农奴在委身文書中这样写道：“……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一定为你自　人服役并服从你，而且沒有从你的权力与保护下脫离的权利，我的一生將永远留在你的权力和保护之下。”②当然，法蘭克的封建混战也是加速自由农民破产的因素之一。

至于封建的上層建筑如何帮助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从法蘭克的历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查理·馬特尔为了战爭的需要所实行的軍事改革，促进了法蘭西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增長。查理大帝的兵役制度更加速了这个过程，馬克思对此曾有明确的指示，除此以外，查理大帝为了牽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势力，又將土地賜予他的官吏——伯爵，这也有助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增長。应該特别提出的是：在这时期，佃农的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領导作战，致使佃农成为他們的下層。这样一来，佃农的“經济上的屈服取得了政治上的認可”③。自由佃农的法律地位跟大地产上的其他的劳动者更为接近，形成了中世紀的广大的农奴阶級。847 年的法令，更把农奴的地位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

与大土地所有制增長的同时，封建社会的其他特征也形成了。在这时期，大地产轉化为封土。查理·馬特尔的改革，以采邑代替了过去的自由大地产。采邑是以軍事服役为条件的土地，土地的領受可終身占用。如果領受者違背条件或死去，則土地仍由国王收回。但是在自然經济的情況下，大土地所有制的增長必然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势力的增强。查理·馬特尔和查理大帝的任何加强中央权力的企图，最后必然趋于失敗。大土地所有者力求使他們的土地世襲下去，加洛林朝的統治者不得不承認这个事实，877 年的克萊西法令承認了采邑世襲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封土制乃最后形成。封土与采邑的区别，就是它虽然是主要以軍事服役为条件的依附于上級領主的土地，但是它也是世襲的。

随着自由大地产向采邑和封土轉化，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等級制度也形成了。早在侵入罗馬帝国以前，日耳曼中間就出現了亲兵效忠于領袖的战斗組織，但是当时还不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采邑制实行后，土地的賜与是以服务和效忠为条件的，封土制也是如此，由于層層的分封，遂出現了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塔形封建等級制度。封建等級制度和过去日耳曼的亲兵制度的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不同者，亲兵制度是团結了氏族貴族来鎮压氏族成員，封建等級制度是团結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来鎮压农奴，当然为了对外掠夺也是它們形成的原因之一。

最后，应該指出农民（包括自由农民和农奴）在这个时期反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斗爭。农民反封建大

---

① 恩格斯：法蘭克时代”，載“史学譯丛”1956年第3期，第4頁。

② 格拉欽斯基：“中世紀史料选讀”，卷一，俄文本国家教育書籍出版局，1953年，第153頁。

③ 恩格斯：“法蘭克时代”，載“史学譯丛”1956年第3期，第17頁。

土地所有者的矛盾是当时基本的同时也是主要的矛盾。农民的斗爭虽然不能阻止封建化过程，但是由于他們的斗爭而产生了慣例，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剝削，在以后，农民的斗爭也促进了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轉化，这一切都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发展的眞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的战爭的結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对西欧来說，这些話也同样是适用的。

闡明以上諸問題以后，可以下这样一个結論：在西欧从封建制发生到封建化过程的完成經过一个很長的时期。在这时期，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逐漸增長，最后取得支配的地位，自由的大地产轉化为封土制，封建等級制也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自由农民紛紛破产，失去土地与大地产上的原有的劳动溶合为一，成为广大的农奴阶級。小农經济的不巩固性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增長的基本原因，而暴力和政治手段在这方面也起了極大的促进的作用。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619頁。

资料

从“五四”到中国共产党創立初期的党和革命主要报刊簡介

文 琪

講授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及党产生后如何在党的正确領导的影响、推动与組織之下展开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并用先烈們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事迹来教育青年一代，繼承先烈革命傳統，克服一切困难，建設好社会主义社会，是当前思想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

本文試就历史发展为綫索，將这个时期有关主要报刊重点地作一簡略介紹，以作搜集資料的一些参考。

一 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报刊

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推翻了自鴉片战爭以来，帝国主义借以統治中国的清代王朝，建立起民国，这是它偉大的历史功績；但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却沒有徹底解决，中国并沒有富强，甚至連“民国”的招牌都有岌岌不可保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在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中引起怀疑；他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辛亥革命并沒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思想，爭取实现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反对封建主义宣傳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新青年”便产生了。

“新青年”月刊原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由1915年創刊到1922年七月停刊。它經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末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創立。在这个时期思想界的斗爭極为复杂，而“新青年”正是这一思想运动的主要中心。它充分地反映了“五四”时代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傳入中国及其变为思想运动的主流过程，而这一思想运动的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性質由旧民主主义变为由无产阶級領导的新民主主义。因此，在研究五四运动、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傳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創立，“新青年”月刊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大体上說来“新青年”第一卷到第五卷，是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共同領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陣地，如李大釗同志在“五四”时代的代表作“青春”、“青年与老人”、“今”分別登載在二卷一号、三卷二号、四卷四号上面。“青春”鼓励青年以自由主义精神大胆地向封建主义进攻，这是“新青年”号召徹底反封建主义初期的著名論文。特別应当提到的是李大釗同志在五卷五号所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論文，給当时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注入了全新的內容。其他像陈独秀、吳虞、魯迅等在当时的“新青年”上也发表

了許多反封建主义的文章。他們批判了中国的封建思想，宣傳了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啓蒙工作給統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傳統封建思想以有力的打击，并且在客观上为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傳播起了某种程度的扫清道路的作用。从第六卷到第九卷，它逐漸由一个民主主义的刊物轉变为社会主义的刊物，在傳播馬克思主义思想上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个时期，"新青年"曾先后发表介紹馬克思列宁学說的文章有十多篇，研究苏联的文章有四十多篇，关于世界无产阶級革命运动的文章有十篇，从八卷起并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組的机关刊物和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各种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派进行了激烈的斗爭，为思想上准备党的建立起了积極的作用。

当然，我們应該承認"新青年"在它的前期所刊登的文章当中曾包括各种不同思想流派，在后期馬克思主义宣傳方面也有一些錯誤和混乱，但它的基本功績是不能抹煞的。

此外，在"五四"时代与"新青年"同样起过重大革命影响的报刊还有"每周評論"。

"每周評論"191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創刊，到1919年八月被北洋軍閥政府封閉共出三十七期。它是以反映当时迫切的政治性問題为中心的刊物，同时也連續地发表过不少介紹苏联社会主义建設情况、苏联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論文。发起者和編者是陈独秀和李大釗。經常写稿的人还有胡适、周作人、沈玄廬等，从第一期到二十五期它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以及"五四"前和五四运动中，支持群众反对軍閥的政治斗爭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出版的第二十一期到二十三期一連几期都用"山东問題"为大标題，并以全部或大部的篇幅(有时并增出專頁)来詳細报道和評論这个偉大的群众运动，如二十一期就曾詳細报道五月四日群众示威游行的情形。另外对于陰謀破坏这一运动的反动論調也及时給以有力的抨击，如二十二期以"山东問題与上海商会"的标題，全文刊載了代表买办資产阶級的上海統一商会致北洋軍閥政府的一封意在破坏运动的电报，同时又分析和揭露了买办資产阶級这一叛卖性的主張。另一方面在二十二期也全文刊載了代表封建地主阶級的梁漱溟的一篇"論学生事件"的論文，他認为学生的爱国行为是錯了，"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每周評論"严正地抨击了这种反动論調。"每周評論"出到二十五期之后，正是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由于胡适攫取了編輯的地位，使刊物起了質的变化，完全丧失了它的战斗的面貌，二十六、二十七期連續两期全部篇幅刊載"杜威講演录"就是最明显的标帜。

除"新青年""每周評論"外，当时宣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还有"湘江評論"。"湘江評論"1919年七月十四日創刊，由毛澤东同志主編。它是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适应"五四"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斗爭要求出版的刊物，現在所能看到的几期全部內容貫穿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大部分主要的文章，都是毛澤东同志写的，在第二、三、四期連載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是毛澤东同志开始以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踐相結合的早期著作，他認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只有"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相信只有人民群众大联合才能救中国，充分反映出毛澤东同志早年的关于建立人民革命統一战綫的战略思想。"湘江評論"仅出版了五期，第五期未及发行便遭軍閥封閉。

此外，上海共产主义小組于1920年十一月七日創办了一个大型的理論刊物"共产党"月刊。現在能看到的有第一至第六期，出版于1920年十一月七日至次年七月七日。

"共产党"月刊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向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識分子进行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介紹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經驗和列宁的学說。这些文章对于正在各地着手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組織以便准备建党的人們，是实际而有力的材料。

除上述刊物外，在"五四"时代傳播馬克思主义、反帝、反軍閥的刊物还有"湘潮"。它是由何叔衡、夏曦同志編輯的。另外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創刊的"星期評論"也是党成立前介紹苏联、宣傳社会主义的重要刊物。1920年五月一日，"星期評論"曾以十倍的篇幅出版过"劳动节專号"。

此外，当时以报道群众运动和学生会的活动、宣傳新思想为中心的报刊，有上海出版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和"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北京学生的"五七日刊"，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以及武汉的"学生周刊"（惲代英同志曾是該刊的主要撰稿人）等。

二　社会主义报刊的出現及其与敌对思想的斗爭

五四运动之后，在原来的民主主义报刊中出現了以宣傳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报刊。而这种报刊的成长过程是充滿了反对敌对思想的艰苦斗爭的。

自1918年李大釗同志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

"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等文之后，报刊上的馬克思主义宣傳便逐漸增多起来。由于馬克思主义的广泛傳播，便引起了资产阶級右翼知識分子的恐慌和反对。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曾和他們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論战，这些都反映在"新青年"月刊和"每周評論"等刊物中。第一次論战就是胡适发动的"問題与主义"的論战。他除了在1919年七月的"每周評論"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一文以反对馬克思主义外，在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再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攻击馬克思主义，說"十篇'贏余价值論'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繼續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最有力地抨击胡适这一反动論調的是李大釗同志所写的"再論問題与主义"一文，它发表在1919年八月十七日"每周評論"第三十五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社会問題的解决必須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行动，而且必須有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問題都解决的希望。而根本解决中国問題的主义，只有馬克思主义。

第二次論战是从1920年起，地主买办阶級的代表梁啓超、張东荪等在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和由研究系分子所組成的"新学会"主編的"改造"月刊（其前身为"解放与改造"，自1921年二月改名为"改造"，在改組后的第六期特辟"社会主义研究"專欄，来回答对他們反动思想的批判，）上，发动了对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們首先是由張东荪出面在1920年十月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里宣傳一种論調說："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发展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貧困"，这就是說他們認为发展資本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因而他們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否定工农在革命中的作用、否定工人阶級的領导。为了反击梁啓超、張东荪等人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从"新青年"的八卷四号起一連发表了許多文章，向他們展开了尖銳的斗爭，堅持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立場。

为了傳播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立工人阶級政党，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不仅与研究系的梁啓超等人进行論战，而且还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斗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在1907年就在法国巴黎創办"巴黎新世紀"周刊，是由吳稚輝、張靜江、李石曾等人經办的。他們以徹底的无政府主义自居，但在辛亥革命后，他們却与同时在日本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張繼一样，变成各种形式的反动官僚。1913年国內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民声"周刊在广州出版，这个刊物到1915年二十三期起时出时停，而在1921年后更公开向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不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斗爭，这种斗爭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都有若干反映，如"新青年"八卷一号（这时已改組成上海发起組的机关刊物）发表的"談政治"一文，便闡述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1921年九月以后出版的九卷四号上又发表有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論战的六封往来长函，組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討論"的專輯。而"共产党"月刊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和无政府主义报刊作斗爭，比如第二号上"社会革命底商榷"、第四号上"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們为甚么主張共产主义"以及譯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第五号上的"我們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也都反映着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爭。关于与研究系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論战的許多文章，后来大部分都彙集在1922年九月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之一"社会主义討論集"里面。

三 中国共产党創立初期的党和革命报刊

由于"五四"以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傳播及实际斗爭的鍛煉，国內几个大城市都成立了党的发起組，他們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工作，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报刊，向工人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組出版的工人刊物有上海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等。前者1920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后者1920年十月十日創刊，都是周刊。这两种刊物的主要写稿人是陈独秀、沈玄廬、陈望道等人。"劳动界"的主要对象为产业工人，而"上海伙友"的主要对象是店員。另外还有北京的"劳动音"和广州的"劳动声"也是共产主义小組創办的工人报刊。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傳播和工人运动相結合的基础上，1921年七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創立初期，主要的报刊有1922年九月根据党的第二次大会决定創办的党中央机关报"响导"周报。"响导"創刊于1922年九月十三日到1927年七月中旬停刊，共出201期。"响导"是党的第一个机关报，是当时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刊物。"响导"一創刊，就集中力量宣傳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統一中国为眞正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革命阶級的統一战綫的主張。例如第三十三期"美国侨商团体之对华主張"、第三十七期"'自动处置'声中之共管案"以及三十七期、三十八期的"中国一周欄"、第

四十二期的“丧权辱国的临案复牒”等許多文章，都是針对当时津浦路上临城劫車案（有外籍乘客二十多人被土匪綁架）发生以后，根据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向我国进行侵略活动的种种事实，指出“国亡在即”，要求全国人民抵制帝国主义亡我之侵略；又如在八十二期登载的我党第三次对时局的宣言，以及根据宣言的精神，在同期发表的“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八十三期“江浙战争之世界政局的背影”，八十四期“江浙战争与国民党”等文章，都是針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揭露英美以大批借款和軍械扶助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和日本扶助奉系、皖系軍閥，制造中国內战的罪恶，明确的向全国人民指出，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內战就永远无停止的希望，要停止內乱，只有打倒帝国主义。

同时“响导”也宣傳了帝国主义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圍的手段，是利用軍閥作为它們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必須打倒軍閥。在揭露軍閥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时，还反复宣傳不打倒軍閥，中国任何政治問題都不能解决，比如第一期“統一、借債与国民党”、第二期“武力統一与联省自治——軍閥專政与軍閥割据”、第五期“国庆日裁兵运动”等文章，都是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打倒軍閥，才能使国內和平和实現眞正統一得到保証。

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只有建立工人、农民、小資产阶級、以及民族資产阶級的革命統一战綫才有可能，在党与国民党建立統一战綫方面，“响导”也发表了許多文章，如第二十一期“怎么打倒軍閥”和“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四十九期“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等，反复强調有把国民党建設成一个民众性的政党以集中全国革命势力来和帝国主义、封建軍閥作斗爭的必要。而在国民党改組前“响导”曾陆續发表文章，如十八期“四派势力与和平統一”、第十九期的“反对‘敦請一友邦’干涉中国內政”、第二十三期的“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对国民党向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妥协的言論作了不少的批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国民党1924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組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資产阶級、民族資产阶級的革命联盟。

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的大風暴。这个时期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出色地指导了五卅运动，当“五卅”惨案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为反对帝国主义野蠻殘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見“响导”一一七期），这篇告民众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这次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資本帝国主义統治下的必然現象，資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級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根据这一精神，“响导”一一七期还发表了“大屠杀中上海报紙的論調”，針对当时上海若干报紙，認为这次血腥屠杀不过是偶然的无意識的事件，只有求“法律”“公理”“人道”以至求“公正之西人”甚至卑躬屈膝地“求理智者之同情”等錯誤的論調进行了批評。当运动不断扩大和深入，帝国主义認識到单純的鎮压不能收效时，就决定利用資产阶級从內部分裂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綫”。于是“响导”一一九期又登載了“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就立刻指出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并指出“我們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張”，否則已經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終要被他們破坏掉的；而当資产阶級已經妥协、叛变，加之奉系軍閥屠杀压迫，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爭，不可能很快地得到胜利时，“响导”一二五期又登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士兵、学生书”、一二六期登載了“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国主义的斗爭”等文，提出改变策略，并对党的策略作了解釋；同时提出今后繼續反帝国主义斗爭的总的口号。

“五卅”周年以后，上海工人又在上海总工会領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并在十月举行了第一次武裝起义，1927年二月、三月又举行了两次起义，从軍閥手里夺得了上海，有关这时期詳細地反映工人斗爭情况以及党指导工运的文章都分别登載在一五九、一六〇、一六一、一六四、一六七、一六九、一七二、一八九、一九三期上（大多是上海工运領导赵世炎同志以“施英”的笔名发表的）。

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級所显示的偉大力量，吓坏了資产阶級，他們害怕工农群众比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还要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就力图限制工人阶級力量的发展，从而就加紧反对徹底代表工农群众利益并坚决把革命貫徹到底的中国共产党，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陰謀破坏革命，因此就有戴季陶主义的出現及国民党新右派所謂西山会議派的形成，而戴季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的国民党”和“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积極倡导阶級合作、反对阶級斗爭、反对工农群众运动的反动論調就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理論基础，他們主張在中国建立所謂資产阶級專政。当时除了国民党西山会議派以外，还有向各种当权的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領取津貼的国家主义派（醒獅派）曾琦等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地主买办阶級指使下加紧反革命活动。在他們出版的“孤軍”和“醒獅”等主要刊物上面，以狹隘的国家主义来反对

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

为了粉粹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西山会議派，当戴季陶主义一出現，瞿秋白同志就在“响导”上給以堅决的斗爭，如一二八期的“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二九期“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階級斗爭”等文章对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論調，进行了批駁，指出这种反动論調不仅在思想上摧毁工人階級斗爭，实际上还是削弱国民革命的主力軍的工人階級，因此也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运动；同时也指出現时工人階級的斗爭是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証。此外，他还写了“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以及“不平等条約”、“国民革命观”、“中国关税問題”等小册子，进一步从理論上对戴季陶主义加以駁斥。

繼西山会議派形成之后，1926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广东組織了反共的“中山艦”事件，五月十五日蔣介石又在国民党中央会議上，提出了所謂“党务整理案”以排斥共产党，1927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員，但这时党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集团，拒絕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东同志及其他同志正确的意見，在革命領导权、工农群众运动等一系列有关革命成敗的关鍵問題上，完全采取了退讓、妥协、投降的方針，从而反动派的气焰愈发高漲，一直到七月十五日汪精衞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这个时期有关陈独秀放弃党的領导权、夸大資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对資产階級代表人物破坏革命的行为的妥协态度、以及对工农群众运动領导等一系列右傾机会主义观点，大部分反映在“响导”周报他所发表的文章当中。例如在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議派公开的反革命行为，和对蔣介石在革命內部进行反革命陰謀的斗爭方面，“响导”一二九期、一三〇期发表的陈独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一文中，根本不提工人階級在这个革命运动中的領导作用的重要性。第一三九期“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傾向”一文中，他仅認为西山会議派帶有反动“傾向”，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第一四八期“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現在及將来”一文中，他認为西山会議派“并不主張根本上反俄反共”，他們只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在对蔣介石有計划地排斥共产党的所謂“中山艦”事件及“整理党务案”的斗爭方面，陈独秀在“响导”第一四八期“中国革命势力統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中，不但沒有积極地反对蔣介石，而且还把蔣介石称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第一五七期“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一文刊載时，蔣介石已經在国民党中央会議上通过“整理党务案”，而陈独秀还在消極地辯解共产党并沒有“倒蔣陰謀”，并告訴蔣介石說：“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陰謀，你就应該槍斃他”，对蔣介石仍恭維备至。在对北伐革命战爭方面，第一六一期的“論国民政府的北伐”一文，陈独秀認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尙未成熟；現在的实际問題，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此外他在这篇文章中，公然自称是在野党，这就明显地表示他願放弃对北伐革命战爭和武裝部队的領导。当国民革命軍在广东已經誓师北伐时，“响导”第一六三期刊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張”，由于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中央領导机关的影响，这篇对时局的主張根本不提北伐。另外第一七〇期彭述之写的“我們的北伐观”一文，同样反映着陈独秀集团对待北伐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态度。在对待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权問題方面，“响导”第一七二期“我們現在为什么爭斗”和一七五期“我們現在怎样爭斗”两篇文章中，陈独秀認为，国民革命的成功，取得政权的是資产階級，中国將成为一个資本主义社会，而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問題。另外第一七七期彭述之写的“論浙江和上海事变与孙傳芳”，这篇文章最后一段与陈独秀的論調也如出一轍。在对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問題上，从第一九八期陈独秀所发表的“蔣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独秀对蔣介石所謂“忍耐、迁就、讓步”的原因。在对农民問題方面，“响导”一〇一期“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第一五八期“紅槍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第一九九期“湖南政变与討蔣”（在1923年十二月出版的党的另一刊物“前鋒”月刊第二号上他还发表过“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階級”一文）等几篇文章中，他認为农民沒有什么革命性，不承認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对于当时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則認为是幼稚的行动。

陈独秀这一系列的对待資产階級的机会主义立場，以至在这次革命的后期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綫，都反映了他对中国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他認为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若失了資产階級援助，便沒有階級意义和社会基础，这样当然这个革命运动的“領袖”应該是中国国民党了，这在“响导”第二十二期“資产階級的革命与革命的資产階級”、第一五一期“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間的中国劳动运动”、第一七二期“我們現在为什么爭斗”、第一七五期

"我們现在怎样争斗"等文充分表现了他这一机会主义的錯誤。正因如此，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襲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終于失败了。

总之，作为党的第一个机关报的"响导"周报，在它創刊后，即通过大量的事实，集中地宣傳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的主張，和各种各样反动的和改良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爭，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沒有这些宣傳，就沒有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也就不会有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和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这充分說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威力和党的报刊强有力的宣傳、动員、組織的作用。但"响导"因为受到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影响，也有若干如上所述的錯誤宣傳，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的紧急阶段——武汉时期，发表了好些束縛群众运动的主張，沒有起到党报应起的作用。

除"响导"外，从中国共产党創立到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失败的这个期間，还有"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先驅"、"中国青年"、"前鋒"、"中国工人"等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

"新青年"季刊是在1922年七月"新青年"月刊出版九卷六号休刊后，于1923年六月重新在广州出版的。由第一期到同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四期后又成为不定期刊。它在1925年四月出版第一号到1926年七月出版第五号，现在已看到的影印本到这期为止。这个时期的"新青年"已改組成为以純粹宣傳馬克思主义思想为目的的党中央的理論性的机关刊物了。由瞿秋白同志担任主編。"新青年"季刊和以后的不定期刊曾用大量篇幅介紹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先后刊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以及研究苏联和有关国际无产阶級革命运动的文章各有卅多篇。如季刊第一期便是共产国际專号，瞿秋白同志除发表了"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文介紹由第一国际到共产国际簡要发展的历史外，还写了"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資战爭与革命"两文，介紹共产国际党綱和策略，第四期譯載了列宁"民族与殖民地問題"、"中国的战爭"、"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以及斯大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的第六部分"民族問題"（题为"列宁主义之民族問題原理"）。在不定期刊第一号瞿秋白同志又譯述了"論列宁主义基础"第一、二、三、四、八各章的大部分，发表时的标题为"列宁主义概論"。此外，季刊从理論上闡明党的民族統一战綫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第二期瞿秋白同志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

"先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半月刊），1922年一月十五日創刊。在发刊詞中明确指出"先驅"的任务"是努力喚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襲、奴性、偷惰、和依賴的習慣而代以反抗的創造的精神，使將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第二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問題的方案"。除此以外，"还要介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績和失败之点，以供我們运动的参考。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俄国革命的狀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設"。此外，"先驅"在抨击張东荪宣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方面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从第一至第三期在北京出版，后为北京反动政府查禁，四期起由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出版，第八期起由团中央执行委員会主办，1923年八月休刊共出二十五期，編輯人有蔡和森等人。

"先驅"停刊以后，社会主义青年团另一个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于1923年十月二十日創刊，它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和知識界以及各大城市一部分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紹共产主义思想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作思想斗爭中起过很大作用，如"中国青年"第七十六期至一百期的彙刊集上，就刊有十四篇批駁国家主义的文章。1927年因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而停刊，負責編輯工作的有惲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任弼时同志也曾为該刊写稿。

"前鋒"（月刊）是党在1923年在广州創刊的一个政治性刊物，现在看到的影印本共三期，截止于1924年二月一日，由瞿秋白同志担任主編。在发刊露布中說："……我們認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們在此运动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觉，只願当前鋒，只願打头陣；这头陣也許大失敗，但我們并不怕失败，我們只希望无数的爱国同胞，不断的踏着失敗的血迹前进！"經常写稿的有瞿秋白、陈独秀、向警予等。

1924年，在国共合作、工农群众高漲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工农刊物，通过这些刊物，使我們对当时蓬勃发展起来的工农群众运动的了解会有很大帮助。如"中国工人"，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1924年十月創刊，于1925年五月停刊。当时的"中国青年"第五十八期曾著文介紹，指出"中国工人"是指导工人进行經济和政治斗爭的唯一刊物。經常写稿人有邓中夏、刘少奇、瞿秋白、赵士炎等同志。现在看到的"中国工人"影印本只有五期。

此外，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指导运动前进的

刊物除了"响导"外，党为了加强領导报刊宣傳工作，还特别发行了"热血日报"来指导这个运动。"热血日报"于1925年六月四日創刊，由瞿秋白同志担任主編。另外，在五卅运动中，"中国青年"也大力进行了宣傳和鼓动工作。

在"热血日报"发刊的同时，各个革命的群众团体也发刊了自己的报紙。比如五卅运动爆发后的第五天，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刊物"公理日报"也創刊了。它在党的領导下成为五卅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的刊物，至六月二十四日停刊。另外，上海反帝运动的最高領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在六月七日成立，也出版了"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作为該会的机关报，由李立三同志負責。

在这个期間，許多大中学校紛紛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出版了期刊，除"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出版的革命刊物"中国学生"（1924年在广州創刊）外，許多学校为了五卅运动进行宣傳鼓动，还專門出版了一些刊物，如上海学联在五卅运动爆发后第七天創刊的"血潮日刊"（上海学联1925年十二月还出版了"五卅后之上海学生"，它詳細地叙述了学生参加五卅运动的情况和"五卅"以后上海学生的工作，以及五卅运动的教訓），上海南洋大学出版的"五卅血泪"以及北京燕京大学，为了响应上海所发动的五卅运动出版的"北京、燕京大学抵抗英国殘杀同胞特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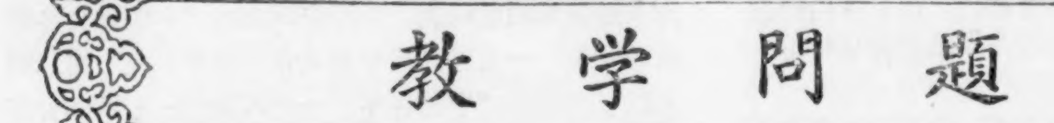
五卅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掀起了汹涌的反对帝国主义怒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当时出版有关叙述和紀念这次罢工的刊物，有邓中夏同志写的"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談判"。1926年七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員会印行，它揭露了在省港罢工后举行的中英談判中，帝国主义的无耻面目。此外，还有省港罢工委員会宣傳部編印的"罢工与东征"，中央軍事政治学校的"拥护省港罢工"以及省港罢工記录文献之一"省港罢工概观"等。

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农民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5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发表了告农民书，分析了农民被压迫和受痛苦的根源，号召农民只有和工人兄弟联合起来，在共产党的領导下，組織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衛軍才能解除自己的困苦和压迫。1926年四月在党的領导下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給农民代表大会的信中更进一步指出农民运动必須与全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工人运动相配合，并在无产阶級領导下，才能得到真正胜利和解放。当时报导和指导农民运动的刊物有国共合作期間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1926年一月在广州創刊。当时担任农民部部长的是林伯渠同志。毛澤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一文就是最早发表在"中国农民"第二期上的（当时的"中国青年"一一六和一一七期亦曾連續登載）。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也經常刊载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領导农民斗争的經典文件——毛澤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是在"响导"一九一期发表了前一部分，由于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阻撓沒有把全文刊出，但这时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的三十五、三十六期却連續登載了全文。"战士"在从理論上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27年它出版"湖南农民运动問題論文集"，給国民党右派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誣蔑以沉重的打击。另外，报道和指导农民运动的刊物，还有广东省农民协会主办、1926年四月創刊的"犁头周报"（原为旬刊），湖南省农民协会出版的"农友"，江西省农协出版的"江西农民"。另外，当时有关农民运动問題的丛书还有"海丰农民运动記"、"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記"、"农民合作概論"等。除此以外，并有1926年三月十六日在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員会議上决定毛澤东同志担任全国农民运动講習所长后，由毛澤东同志主編的"全国农民运动講習所的教材"、"农民問題丛刊"等。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出版的刊物除上述"中国农民"外，还有：广州的"民国日报"，广东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新聞"，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政治訓練部編輯的"軍人日报"，黄埔同学会主編的"黄埔潮"周刊，"青年工作"月刊（青年部主办），"海外周刊"（海外部主办），"妇女之声"旬刊（妇女部主办），"新商民"月刊（商民部主办），以及"政治周报"等。其中"政治周报"是这些报刊中的权威刊物。"政治周报"系由国民党政治委員会議决办理，于1926年十二月五日創刊，先是毛澤东同志担任該报主編，后由張秋人接办。"政治周报"在树立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帜和抨击右派"戴季陶主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更　正

本刊1958年4月号第25頁左欄第二行"1864年"系"1854年"之誤。




教学問題

蘭州市部分中学历史教师的跃进决心書

我們蘭州市的部分中学历史教师除堅决响应北京、天津部分中学历史教师的跃进倡議外，决心苦战三年，力爭上游，兴无灭資，紅透專深，充分利用每一秒时間，达到思想工作两跃进。我們的战歌是白天干，晚上鉆，干勁加鉆勁，扭成一股勁，思想大跃进，教学大革新。我們的口号是两年跨京津。我們的跃进决心规划是：

（一）堅决跟共产党走，堅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心交給党，永远做政治上的左派，爭取在一、二年內把自己改造成为紅色的历史教师，眞正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献出我們的一切力量。

1.努力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树立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堅持每日学时事，反复鉆研党的政策，使自己的思想随时赶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并要积極参加党所領导的各項政治运动，爭取在运动中做积極分子。

2.积極参加校內外的体力劳动，保証每周达到八小时，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結合起来，使自己与工农結合起来，树立工农的思想感情。

（二）在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的指导下，搞好历史教学。使之在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工作中，成为宝貴的营养資料之一。本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精神，努力改进工作，爭取两年內精通本門业务。

1.刻苦鉆研历史科学知識和教学大綱教材教法，在一、二年內精通中学历史教材內容。

2.以无产阶級的立場，唯物的观点，辯証的方法，深入挖掘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联系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設、社会主义改造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学生进行兴无灭資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3.努力学習教育理論，学習苏联和其他各地兄弟学校的先进經驗。以学以致用的精神，边学边用，随时写出总結或專題，通过互相交流，达到共同提高。

4.在課堂教学中一定要講深講透，重点突出，保証做到节节熟練，堂堂成功。

5.堅决貫徹新的教育方針，每个教师除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外，一定要經常关心学生的生活与学習，做到九管（管課內、管課外、管校內、管校外、管平时、管假期、管教、管导、管劳动）；三联（多联系学生、多联系班主任、多联系学生家长）；三勤（勤教育、勤輔导、勤檢查）；树立对学生全面負責的精神。

6.結合教材內容，在一年內，有創造性地繪制一套在教学上所必需的图表等直观教具。

7.在本学期內，分头广泛蒐集有关乡土教材的資料，爭取在1958年暑假編出一本乡土教材参考資料。

目前我們除堅决执行自己的跃进决心规划外，并願与全国各地中学历史教师比紅專、比先进、比干勁、比鉆勁，互相推动，共同提高，从而使我們的历史教学研究工作普遍高漲起来。

一初中	王　云	女　师	朱民权	三　中	伏子和
四　中	关意权	一　中	严九如	四　中	岳維宗
一　中	周恩崇	工农速中	罗学义	三　中	張照坤
四　中	張培鈞	三初中	張桂桐	二　中	郭耀宗
师院附中	楊万福	女　中	盧　震		

（以姓氏笔划为序）

响应京津历史教师的倡議

亲爱的中学历史教师同志們：

我們几个长春市的历史教师热烈响应京津两市二十一名历史教师的倡議。为了貫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使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开創一个新的局面，为了把自己早日鍛煉成为紅透專深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按照多快好省、兴无灭資、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精神改造自己，改进教学，特提出我們的跃进保証如下：

一、坚决跟着党走，把心交給党和革命事业。苦干一、二年把自己改造成为政治立場坚定、思想进步、忠于党和革命事业，且具有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并以革命大跃进的精神努力鉆研业务，坚决做一个紅透專深的中学历史教师。具体要求是：

（一）积極地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

深入地学習和体会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一偉大著作，并选讀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章；閱讀有关党性修养的书籍（如“論党”等），并深入联系思想进行檢查；經常閱讀人民日报、吉林日报、教师报、中国青年报等主要报紙；二年內系統地学完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經济学、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和历史教学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理論书。

上述各种学習，除报紙要剪裁外，其他的都認眞做好学習笔記。

（二）积極参加党所領导的各項政治活动，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和教学工作上的促进派，积極响应党的各項号召，在当前，特别要积極参加“双反”运动，以加强自我改造。

（三）經常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把心交給党。主动地向組織彙报自己的思想情况，不保留任何問題；虛心地接受意見，大胆地展开批評，坚决地向一切不良傾向作斗爭。

（四）积極参加劳动鍛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培养工农情感。保証每人每年参加体力劳动三百二十小时以上(包括假期和平素同学生一起劳动)，在劳动中要成为学生的模范和表率，并在一至二年內掌握一至二項劳动技能。

（五）在充分掌握教学大綱和教科书的基础上，結合教学实际的需要，系統地学習史学中的有关部分，系統地掌握住史学的基本知識，并随时随地吸收史学界新的科学成就，以提高业务水平。爭取在一、二年內能用普通話进行教学，并能胜任由初一到高三各年級的历史教学，三、五年內能教相近的学科一至二科（如政治、語文等）。

（六）在一、二年內学完邏輯学、心理学，并能熟練地按教学法的基本原理进行教学，还要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貢献。

二、坚决貫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克服教学脫离生产、脫离政治、脫离学生实际等缺点，体現新教育方針对历史教学的要求。具体要求是：

（一）在課堂教学中，根据教材的科学性、思想性，恰当地結合时事、配合中心工作，講述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并力求結合学生实际，加强“兴无灭資”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学生在一、二年內，不仅对教学大綱所要求的基本知識能牢固地掌握，并能站在工人阶級立場，初步学会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問題。

（二）在課堂教学的四十五分鐘里，重点突出地講深講透教材的基本內容，爭取做到使学生当堂消化理解，并做好巩固工作。

（三）做到管教管导，并对成績較差的个别学生进行課外輔导。

（四）积極創造教具，节省一切教学用品。

根据上述条件，我們保証在“五一”前訂出个人規划，在“七一”前互相把个人执行規划的情况进行一次檢查，并爭取上級对我們的督促。

最后，願与全国中学历史教师同志們一道，为爭取做一个紅透專深的中学历史教师而共同奋斗，为历史教学工作的大跃进而貢献出所有的力量。

东北师大附中 王 蓥　　長春十中 高世久　　長春三中 張敬賢
吉林实驗中学 楊德远　　長春十一高中 蔣茂才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本刊四月号发表了北京天津部分中学历史教师的跃进倡議書后，各地教师和教研組寄来了一些响应書或跃进規划。因为限于篇幅，我們在这里只发表了以上两篇。——編者

怎样給学生以系統的历史知識

刘 淮 生

中学生历史知識的零碎、紊乱、不系統是目前中学历史教学质量不够高的表现之一。我在几次和中学毕业生談話时，曾要他們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或近代史上的几件大事順序地講出来，他們几乎沒有人不感到困难。至于平时在考試、考查的工作中，发現張冠李戴、顚三倒四的現象更属普遍。这种情况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历史教师沒严格貫徹或不善于貫徹系統性的教学原則应該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要改变这种情况，提高教学质量，历史教师应該首先負起責任来。

学校是系統化了的知識的源泉，是訓練工作中的严格的連貫性的工具①。任何学科的教学，若要求得較高的知識質量，无論在內容上或教学方法上都必須严格遵循学科知識的系統性。特別是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規律、培养学生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其本质任务的历史学科，强調这一点，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說明的，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各个教学原則的运用又是緊密地联系着的。解决学生历史知識的系統性的問題，正如解决其他教学問題一样，必然要涉及到教学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系統知識的获得在頗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巩固性的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在这些方面不作过多的探討，笔者只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就教师应如何在对学生进行工作的体系中尽可能为学生系統地掌握历史知識創造有利条件的这一点，談談个人体会。

历史发展是有一定規律的。这正是历史教学所首先必須加以闡明的。不过，历史发展規律是有其事实內容的，不是空洞的。这种規律性的具体体现，只有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一切事件、現象間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的因果关系中去寻求。換句話說，只有从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事实材料的連貫性中才能反映出史实的因果联系、依存关系和客观規律。事实証明，也只有因分析总結一系列的具体史实而得出的客观規律才容易为学生所理解而具有教育意义。否则，历史会“……变成一笔偶然現象的糊塗賬，……变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②。1934年五月十六日苏联人民委員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本国历史”的著名决議中所以特別强調“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講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必須牢固地記忆着一些重要的历史現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③，其意义就在于此。所以，历史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的系統性和邏輯性，在課程的講授中应有充分反映，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值得研究的是：作为中学教学科目之一的历史，它的发展規律的揭示，是依靠課堂教学进行的。由于班級授課制度的特点，它的全部教程必須分解为許多个別段落或題目，而每一段落或題目还要再分解为更多更小的段落或題目，然后一課一課地講授。在教学过程中始終居于領导地位的历史教师，应該在分解和再分解的过程中，在丰富多样、錯綜复杂的史实中，不迷失規律綫索，不倒置輕重本末，从整体看部分和从部分到整体，都能按照历史的科学体系和史实內部的邏輯联系，系統地进行教学，正确地充分地向学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使学生認識“支配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性，必然地引导到共产主义的胜利”④，从而进一步确立学生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方向。完成这样的教学任务，对我們每个历史教师来說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工作。

首先，我們应該注意的是：教师的备課工作（包括鑽研教材和教学大綱），如果只是从某章某节的局部教材出发，不能高瞻远矚，总攬全局；对整个教程缺少系統的透徹的了解；对整个教材不能統筹的組織安排，那么，教师的講授必然会顧此失彼、挂一漏万；把必然的講成偶然的；把系統連貫的講成支离破

① 参考 И.М. 杜賀夫內伊著，方德厚譯，“教学法原理”，第46頁。

② 参考“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139頁。

③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解放社版，第338頁。

④ 苏联大百科全書选譯之一，“历史·史料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頁。

碎的；对事实間的因果联系的交待必然不全面不明确；对問題实質的揭示和闡发也就很难确切恰当。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教学方法，可能是学生历史知識零碎、紊乱、不系統的根本原因。因此，要給学生以系統的历史知識，首先要求历史教师应全面而深刻地掌握整个的課程內容，对任何具体課时的教学內容都能从一定历史时期內的相互联系和时間的发展方面去观察，正确地确定一节課在課程中的地位。从而明确課时內容中的哪些問題同已經学过的教材有关；哪些問題是新知識；又有哪些問題尙在繼續发展，需以后逐步充实和加深的。这一切，教师都該心中有数，运用自如。

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年寒暑假我就全面地鉆研新教材，在学期教学計划中写好下学期"講授新課的注意事項"。1955年夏，我認眞地研究了初中中国历史第三冊（当时尙无参考資料），除了通过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的侵略战爭、强迫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約，以及在这个时期內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內外敌人的英勇反抗的种种具体事实，眞正理解"从鴉片战爭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这是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勢力相結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勢力的斗爭的历史"①的深刻含义，并把它当作一条紅綫貫串在整个近代史的教学以外；对教材新增加的經济文化史料如維新思想、中国无产阶級、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等重要历史現象的发生、发展以及結果影响都全盘地加以考察，掌握其发展綫索，便于講授时前后呼应。对新旧教材的关联部分，如講"鴉片战爭以前的中国社会"、"捻軍和少数民族的起义"，就找出它与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冊的"明朝手工工場和城市經济"、"清朝前期的农业手工业"、"清朝对各族人民的統治"，以及"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等节的有机联系；講"中国軍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的斗爭"，就与第二冊"东南沿海的抗清斗爭和台湾的建設"一节联系……。类似这种互相关連、互相銜接的地方，都需細致探索，具体安排，以便在講授新課时引証、联系。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教师对全部教材心中有底，講解时前后連貫，互相照顧；新旧教材始終保持着有机联系；且可詳简得当，避免重复。例如，講鴉片战爭的影响（第三冊第一章第五节），当然"中国社会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点是主要的，"維新思想的萌芽"是派生的，因此，教师对本节課的知識要求往往只着重前者忽略后者。但如果从外国侵略势力开始侵入以后，我国社会改革思潮逐漸兴起的这一点着眼，"維新思想的萌芽"正是这一思潮的啓蒙时期，就不能不予重視。再如，講民国初年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凱窃夺革命果实以后，不久即取消了南京临时政府頒布的"临时約法"，段祺瑞重新做国务总理的时候也要廢弃"临时約法"，在同一时期里，孙中山則始終以保护"临时約法"为号召，积極同軍閥們进行斗爭。"临时約法"何以会成为当时南北斗爭的焦点？为了透徹地說明这个問題，不能不在講这些問題之前的一节"中华民国成立"时，强調指出（教科书的叙述嫌簡略些）：在当时的条件下"临时約法"的进步意义。再如，講"义和团运动前夕的中国社会"要講到"四川人民反对外国教士压迫中国人民的斗爭"，而后面"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的那一节又要講"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压迫的斗爭"，根据教材的特点和課时教学目的的不同，前者可簡略些，后者可詳細些。

講授新課不仅要同以前的旧課联系，还要注意同上一节旧課間的联系，即使是一节新課之內的这个問題与那个問題之間，这一段与那一段之間的联系也要引起足够注意。試以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冊七章九节"蒙古的兴起和南宋的灭亡"为例，新課开始时教师在檢查"宋金对峙下的南北經济"的旧課之后，接着指出："就在这宋金对峙局面剛剛稳定下来的时候，在金国的北方（指图）又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族。"从此轉入对新課"蒙古族的兴起"的講述；在講完蒙古族的統一，接着問："像这样野蛮的蒙古族成为一支强大的軍事力量之后，它还能同周圍一些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嗎？"自然地轉入蒙古族对外扩張的講述；"蒙古族为掠夺别人財富而西征，灭金，那么对于靠近蒙古、人口众多、生产又很发展的南宋会不会放松不管呢？"以此再轉入"南宋灭亡"这一段的講述。这样把所有新旧課的过渡、段与段之間的联系，使人自然地感覺到旣是史实本身的发展，也是邏輯性的引伸，部分与整体都是一脈相承的有机联系。因为層次清楚，条理分明，凡事有原委，时間久了，学生对任何历史事件、現象的发生就不会孤立地去理解了。这对培养学生系統地掌握历史知識的自覺性是有幫助的。

教师的講解还应該在內容結構上力求严密，沒有彼此分散的論点。所有論点都互相制約着，被教学目的的主导思想所凝聚着。例如，講十一、十二世紀蒙古族正飞跃地由氏族社会末期向初期封建社会过渡的时候，教师就該着重地指出："这时蒙古族还保留着

---

① "初級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綱（草案）"，第9頁——10頁。

許多氏族社会里的野蛮、殘忍的落后習慣，把劫掠看成光荣，把战争当成經常职业………”。这几句話非但給后来蒙古族的对外扩張作了伏笔，且为后来分析对被征服地区的残酷破坏提供了理論根据。为了在課时小結时使学生辯証地認識成吉思汗这个历史人物在統一蒙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不能不在叙述統一的經过时，把蒙古族还沒被統一前的人民要求和在統一过程中成吉思汗这个人的軍事、組織才能都适当地加以强調。这样有計划地闡述某些論点，使講授內容更加緊湊和完整。不仅深刻的邏輯性和精确性能促进学生的思維活动，而結構的严密性也是学生系統記忆历史知識的有利因素。

講授了一定数量的史实，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分析和概括，正确地形成学生的历史概念也是学生历史知識系統化的一个保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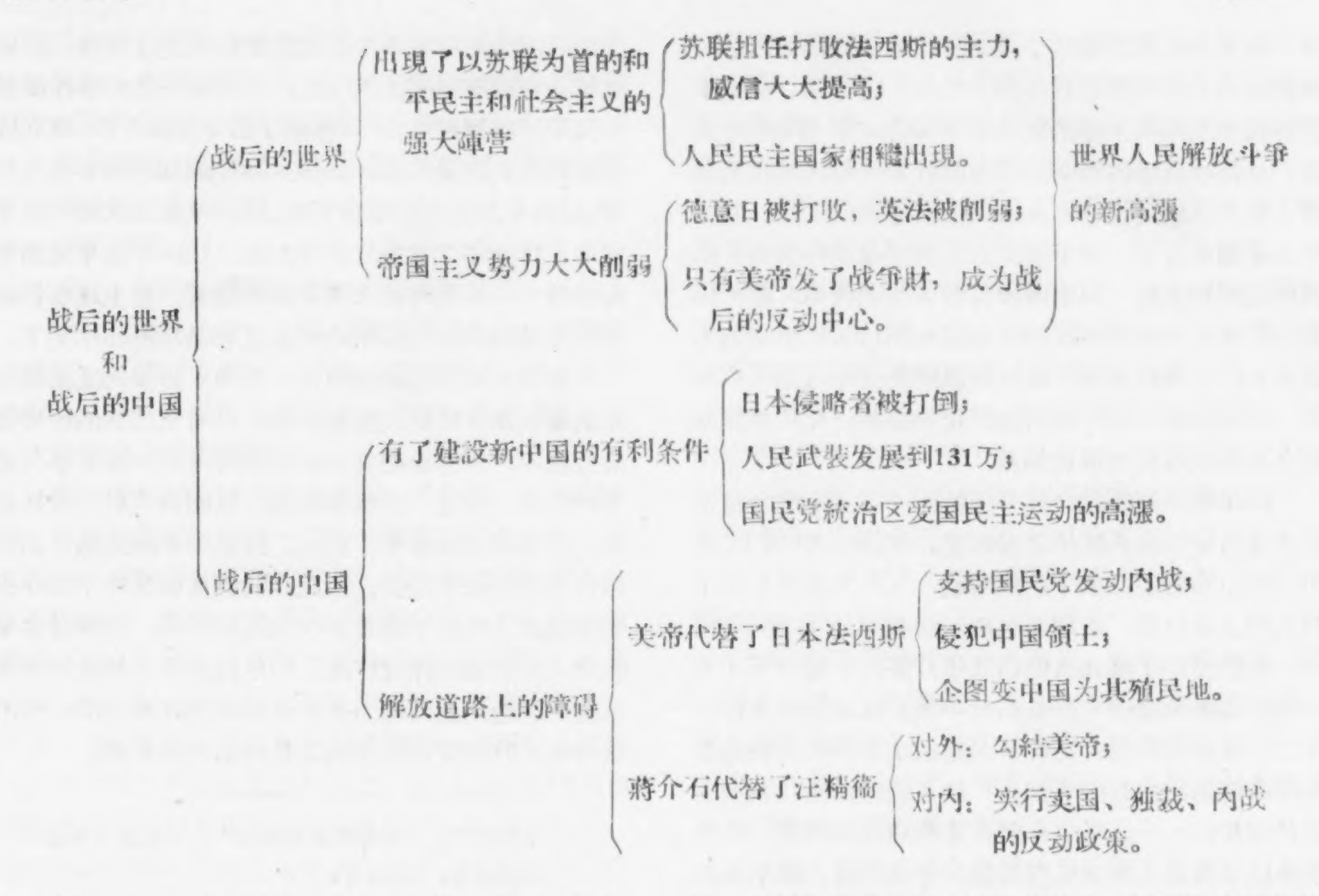
概念永远是概括的东西。但概念是在确切的、內容丰富的表象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而学生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和他們对具体的、生动的历史教材的理解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任何一个历史概念既經学生所掌握，概念的定义便成为学生学習該阶段的历史知識的总結。例如，当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分析和概括了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史实后，得出資产阶級革命这一历史概念的实質：資产阶級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爭而取得政权，然后把政权机構当作压制人民群众和保障自己对人民群众进行剝削的工具；資产阶級革命意味着：社会从封建專制制度的鎖鏈中解放出来，然而却又給人民群众帶来了新的資本主义和資产阶級剝削的鎖鏈。这一概念的形成，轉回头来便可以指导学生系統化自己学習过的历史事件：斯图亞特王朝的專制統治給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帶来灾难，农民运动的高漲，城市手工业者和貧民的起义，国会和国王的冲突，內战中英国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工人对資产阶級的支持，国会廢除地主对国王的一切封建义务，但却依旧要农民向地主交租，胜利了的克倫威尔对农民运动和爱尔蘭起义的鎮压，英国資产阶級对荷蘭的战爭，1688年权利法案的公布……等等。

要想使概念的定义轉回头来对学生历史知識系統化起上述的調节作用，教师在形成这种概念的时候，必須注意如下的两个因素。其一，教师所提供的历史事实一定是具体的生动的；分量要求适当，以說明問題为限度。例如，如果沒有圈地运动、濫征新稅、出卖商业專卖权、向工商业勒索“贈品”以及任意逮捕政府的反对者的具体事实，要学生理解和記住斯图亞特王朝的專制統治給当时英国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帶来灾难的这个簡单概念，那是困难的。但如果补充过多，不分主次、本質与非本質，就会累贅誤事，也容易使学生厭倦。如过于簡略籠統，浮光掠影地提一提，就难以形成生动的历史表象，不以历史表象为基础的历史概念，不过是失掉了內容的一种公式，記住它不独困难而且无益。其二，当作历史概念的物質基础看待的历史事实，还需經过教师或学生（在教师的啓发下）的分析、概括的思維加工过程，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質特征，形成正确的概念。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表象只能反映事物的最簡单的某种形态，事物的內部狀況和一般本質属性的反映必須依靠对具体事物的分析、概括，使感性知識跃进到理性知識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对具体事物的分析、概括是学生积極进行抽象思維的活动过程，会促进学生智力和識記能力的发展。上述英国資产阶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为什么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前面的一樁事件跟后面的一樁事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些問題都触及到史实的本質，解决这些問題，只靠生动的历史表象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根据史实发展的先后順序逐一地加以分析、綜合的研究，最后在分析綜合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概括。这样才能使学生的感性認識逐漸地向邏輯思維轉化；并使抽象的概括和直观感性成分建立起正常的相互联系。这时历史概念才眞正为学生所理解所掌握，并能以概念的定义反顧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現象，有助于历史知識系統化。

实踐証明，在进度快、內容多、学生感到头緒乱的情况下，教师用表解式的板书提綱来配合課堂教学，对于学生系統知識的获得有好处。高三代用課本“中国人民解放战爭簡史”（廖盖隆編著），除章节課題以外，沒有标題，篇幅又长，限于时間，学生閱讀教材确有困难，我們編制了如下的表解式的提綱以后，学生認为眉目清楚，便于系統地理解和記忆。以第一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新的大内战第一节战后的世界和战后的中国为例：（見51頁表解）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学生注意力去專心听講，并便于从大小标題的从属关系上系統地理解历史知識，提綱应該是边講边写；它的作用只能是对理解和記忆教材作系統的綱領性的提示，至于具体內容、事例还需要从教师的講述和教科书中去体会，决不能陷于空泛的或教条式的背誦。

教师对学生历史知識系統化的关怀和誘导，不能只限于备課、講課工作，还应該貫串在練習、复習等其他工作中。



在检查旧課的环节里，教师可根据上节旧課的重点系統地組織問題向学生提問，如講初中中国历史第三册第一章“鴉片战爭”第二节“英国发动侵略战爭”时，課前可就第一节的旧課提出如下的三个問題：（一）鴉片战爭以前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二）鴉片輸入对中国的影响怎样？（三）禁烟运动是怎样开始的？意义怎样？在这个基础上然后轉入新課講授。这样既評定与考查了学生的旧課知識，通过合乎邏輯順序的提問也系統复習了旧課，假如旧課的問題較多，省略了一部分会有损于系統性的时候，教师可就被省略部分加以概括的复述作为过渡。总而言之，不要孤立地提出几个問題，单純地为提問而提問。

在教师启发和示范的影响下，逐漸培养学生能概述一节（或一章）旧課的中心大意的能力，也能促进学生系統地掌握历史知識。教师在概述旧課的过程中来提問学生，固然比孤立地提出几个問題好，但問題与問題之間的联系，依然由教师的概述来包办代替，系統性的重要性有时还不能被所有学生都認識。要学生概述旧課的中心大意可弥补这个缺点。如新近我們要学生概述“清政府的立宪騙局和革命派的堅决斗爭”这节課的中心大意时，学生回答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各地起义暴动的事件不断地出現了，清政府为緩和国內人民的反抗，公布了所謂立宪的办法，虽然这是騙人的，但以康有为、梁啓超为首的紳士、地主却积極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得不向他們进行斗爭。”之后，教师再轉入对某些重要問題的檢查。一般地說，这样做，学生是注意了也掌握了上节課两个問題間的联系。經常这样地鍛煉学生，会使学生在注意思考題的基础上适当地照顧知識的連貫性，因而加深对知識的理解；同时概述旧課中心大意时，也是学生重新組織和高度概括旧教材的思維过程，还会发展学生的归納、概括能力。

上好单元复習和期終复習課是学生系統掌握历史知識的关鍵。尽管平时是如何重視了新旧課的联系，但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全部面貌，毕竟限于一章一节的講解，学生的領会总是不够全面的。等新課告一段落进行单元复習和期終复習的时候，正是給学生一个全面回顧和系統整理旧知識的好机会。无論单元复習或期終复習，最經常使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总体复習，把某一个历史时期內的全部材料，根据事物发展的先后順序加以系統組織，不受原来章节的限制，使旧課匯合成为一个整体。如講完初中中国历史第三册第一編以后，把两章十一节的旧課可归納为第一次鴉片战爭、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战爭等三件事情，然后从发生的原因、經过、結果影响等三方面来看这些事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因果联系。使学生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各項事件有一个綜合、全面的認識。

另一种是在学生掌握某个历史阶段綜合的情況之后，再就某些具体問題进行專題小結的复習方法。如把中国近代史上四次主要的侵略战爭作为一个專題來复習，从每次战爭的影响来看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也可以把民族資本主义和維新思想的发生、发展作为專題来复習，便于学生对这些問題求得全面、系統的理解和記忆。以上两种复習方法的使用，都可以通过教师的归納概括或系統地組織題目采用談話的方式来进行。其結果旣可以从旧課的复習中巩固历史知識，又可以使一定时期內的历史知識系統化和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历史知識。

編年表和解答綜合性習題的作业方式来配合日常复習会督促学生系統地复習旧課。如講完中国近代史，可以布置类似如下的思考題：（一）从鴉片战爭到五四运动以前，这期間积極侵略我国的有哪些国家？他們发动了哪几次侵略战爭？签訂了哪些不平等条約？扼要地說明这些条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怎样？（二）这期間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統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运动，主要的有哪些？結果怎样？为什么会有这种結果？……。学生在解答这些問題的时候，必然会系統地有重点地去复習旧課和考虑問題。編年表的作用是因为：历史事件必然发生在一定时間內，历史过程是表現在时間的演变上，“只有把各种事件依照年代順序排列起来，才可能明了历史过程”①，确立历史事件間的因果关系。如学生通过編制1840年鴉片战爭、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开始、1857年第二次鴉片战爭发生、1860年二次鴉片战爭結束、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敗……等事件的大事年表的練習，对上述事件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容易理解和牢記了。

强調历史知識的系統性，是由于历史知識系統性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有从眞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探明这一历史事件与那一历史事件之間的因果、作用、影响等联系，从而确定社会发展規律，并用以武裝学生。如此，历史教学的知識、品德教育才不致流于形式。因此，我們反对那种不能在应有的程度上保証学生对教材的透徹理解，使知識合乎教学大綱規定的深度广度，而单純醉心于知識的表面系統，或毫无意义地为系統而系統的教学方法，因为这与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質量是絲毫不相容的。

---

① 卡尔曹夫：“小学历史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第113頁。

“明朝的腐朽統治　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爭”一課的講課記錄（附“葛賢墓碑記”）

苏州市第一中学　　刘恩同

去年五月，我在学校做了一次历史課公开教学，以高中中国历史第二册第三十章第二节作为講授內容。課文共分三段，标題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爭”、“东林党反宦官的斗爭”。表面看来，好像是三个各自独立的內容，头緒較为复杂。关鍵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深入地鉆研教材与体会教材，只有掌握这一节教材的基本綫索，才能很好地处理这一节教材。这一节教材有它典型的代表性，它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从明代中期以后到清代鴉片战爭前的一个历史时期的阶級斗爭的面貌。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与深刻化，也表現了光明势力的逐漸成长和腐朽的封建統治的日趋沒落。通过这一課的教学，要使学生从具体史实中，理解到封建統治必然走向解体以及是如何走向解体的，預示着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要产生的历史規律。因为今年使用的新課本，把一条鞭法也列入这一节，所以这次我写的講課記录，就把它也包括进去了。下面是我的講課記錄，希望同志們多提意見。

講課記錄

教学目的：講述明朝后期土地的高度集中，市民斗爭和东林党反宦官斗爭，使学生了解：（1）明中期后，土地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阶級矛盾更加尖銳化，实行一条鞭法也未能达到緩和阶級矛盾的目的。（2）市民已成为一支反封建斗爭的力量，是我国历史上的新現象。（3）东林党代表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利益，所进行的反对宦官、反对暴政、反对

对工商业者掠夺的斗爭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

教具：葛賢墓碑拓片（1601年苏州市民斗爭領袖葛賢的墓碑拓片，“苏州画廊”有售）。

复習提問：从叙述明朝后期苏州絲織业发展情况中說明資本主义的萌芽。

講授新課：

（一）明朝的專制政治和宦官特务統治

問：明初統治者采取哪些措施以加强君主專制中央集权？（把地方民政、司法、軍政分归三司，直接由朝廷指揮；六部尚书和都督，直接对皇帝負責，軍国大事都由皇帝亲自决定。）

明中叶以后，皇帝多半昏憒，貪图享乐，不理政事。皇帝居深宮，往往一二十年沒有接見过大臣；宦官代替皇帝批答大臣們的奏章，成为皇帝的代理人，是实际掌握政权的人。武宗（正德皇帝）时人們称武宗是“坐的皇帝”，宦官刘瑾是“站的皇帝”。在外省設鎮守太监，軍队出征有监軍太监。倉庫、营造、开矿、市舶、織造，凡有权有利的职事，无不归太监掌管。大官僚如严嵩尚且要結托宦官取得权柄。明朝宦官們有龐大的特务組織，大小太监最多时达十万人，散布全国各地，监視官吏活动，压制士大夫言論自由（統治阶級內部矛盾的尖銳），鎮压人民反抗（阶級矛盾）。

（二）土地的高度集中

（1）明朝專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特点之一；另一特点是土地的高度集中，而皇庄和庄田的圈夺民田又是明朝土地兼并的特点。

庄田——皇帝常把官田賜給貴族、宦官和大官僚，这些田地叫“庄田”。皇庄——皇帝自己的庄田。

明中期起，愈往后土地愈集中。1506年武宗即位后，先后建立皇庄达三百余处。十六世紀后期神宗賜給福王田四万頃，大臣們力爭，才减半。神宗时有亲王、郡王三百人左右，賜田数目可想而知。外戚、宦官、勛臣也可以“賜乞庄田”，有人一次賜給万頃。

皇庄和庄田用庄头管理，常常仗势侵夺人民的土地財物，非法逮捕农民，任意打死佃戶，硬指垦熟了的私田为荒地，硬說农民侵占了官田，就仗势圈夺民田。全国总田数中官田（主要是皇庄和庄田）占七分之一（1502年統計）。全国最肥美的江南地区，官田竟占十六分之十五（据宣德实录所載苏州知府况鍾，即昆曲“十五貫”中的主要人物的奏章說：“苏田如按十六分計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

（2）官僚地主对农民压榨的加緊。

（甲）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有的农民卖去了土地，还要照旧交納田賦，有的地主勾結官吏把自己的田賦暗里分攤在农民头上。农民被迫卖妻鬻子，卖自身，流亡他乡。中期起各地不断起义，例如宪宗时，荊襄一帶，有刘鬍子、李千斤百万以上的流民大起义。这是封建社会最本質的矛盾。

（乙）不断地增加田賦，但政府財政收入却不断地减少，为什么？

由于官紳隐瞞土地，規避賦役，百多年来，額田减半（1393年八百五十万頃，到1502年减到四百二十二万頃）。明朝的統治者日趋腐朽，而商品經济的发展却扩大了封建主的胃口，提高其豪奢的消費量，“明自中世以后，日趋淫靡”。举二例：1.抄严嵩家产仅皮衣一項，有一万七千余件，帳幔被褥二二四二七件。2.明末宮女用的胭脂和白粉年达白銀四十万两。

（3）改良主义的一条鞭法遭大地主阻撓行不通。

1581年明政府推行一条鞭法。所謂一条鞭法，就是清丈地畝，按畝納銀，令田主繳納一定数量的銀，所有田賦差役各种杂費包括在內，官府募人充役，不再攤派，对无田貧民，确有利益。一条鞭法只是徭役方法的改进。有二層分析：

（甲）按畝征銀，不論人口。攤丁入畝，对无田的农民，釋去力役的負担，对田少的农民，使他們可以較多地从事耕种，多少对发展生产起了点作用。暫时緩和社会危机，但不能根本解决社会矛盾。主張实行一条鞭法的人，目的是想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

（乙）一条鞭法規定用銀两交税，这跟以前用米麦等实物来交税不同。用貨幣交納田賦反映商品經济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反映了封建社会逐漸走向解体。但一条鞭法并未照顧到工商业，說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一条鞭法通行不久，明政府又以辽餉、剿餉、練餉等名目按亩加派，日益增加了农民的負担，激化了地主与农民間的阶級矛盾。一条鞭法根本沒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矛盾。更何况因触动大地主的利益，由于他們的反对，推行不久就停止了。用銀两交税的办法却一直保留下来。一条鞭法沒解决問題，而明政府的財政困难却越来越严重，于是就派出大批矿监税监，加緊对工商业的压榨和掠夺，因而激起了市民的猛烈反抗。

（三）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爭

（1）矿监税监的敲詐勒索。

在明神宗的时候，由于对外連年用兵和大修宮殿，財政瀕于絕境。神宗就派出大批宦官做矿监税监加緊对工商业的征斂，首当其冲的又是城市經济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

“矿监”的原意是派宦官至各省监收矿税（金、銀、銅……矿）。他們設了税局，不問矿的产量多少，任意规定产額，勒令人民包賠亏短。后来发展到矿监到处乱指民宅、坟墓下有矿脈，或誣指民家私自开矿，勒索賄銀，弄得“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

“税监”就是宦官监收商税。在水陆交通要道，設立关卡，一件貨物，过一道关，收一次税，甚至在水道的一天航程里，設立关卡五、六处，斗米只鸡都要收税。現在讓我把墻上挂的“葛賢墓碑”拓文第一段講給同学們听（文見附录）。矿监税监敲詐訛騙甚至公开搶劫，姦污妇女，任意捕杀人民，激起了市民斗爭。这里所說的市民，主要的是手工工人、城市小商品生产者、工場主和商人等。

（2）市民斗爭的时間、地区、次数。

时間——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从1600年武昌市民反陈奉的斗爭到1626年苏州五人倡义反对逮捕周顺昌的市民斗爭），約三十年。

地区——全国各地以东南地区較普遍（自經济发达的东南、浙江、閩广各省直到經济較落后的辽东、云南、山西、陕西，中間包括山东、湖广等省）。

次数——规模較大的有二十余起。

課本上举武昌、苏州二例。武昌市民斗爭，經过从略，只补充說明武昌市民反陈奉斗爭是湖广十多个县鎮的人民持續九个年头反抗斗爭的一个焦点。

（3）斗爭的一个例子——1601年以織工葛賢为首的苏州市民斗爭。

从今天复習提問中，我們都知道当时苏州已經成为全国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出現了规模比較大的織綢的手工工場。这些工場和工人集中在現在濂溪坊以北临頓路以东的地区。当时在苏州和杭州一帶收税的是宦官孙隆，他的衙門叫織造局，就設在現在北局的地方。1601年，孙隆的走狗黃建节想把每一匹緞加税三分，每一張机每月加税三錢，紗緞下机，要先到玄妙观交税打印，才能出售，否则重罰。这个消息傳出去，机戶們立即罢市停織，全市約万余工人陷于失业，形势非常严重。

六月初六，工人們齐集玄妙观，“集众徐元、顧云……等二千余人，推昆山人葛成（按即葛賢）为首，分作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蕉扇为号，后执絞棍随之，矢誓倡义，不取一錢……”（“吳县志”卷五十四，“兵防考二”），“……斃黃建节于乱石之下，付湯莘等家于烈焰之中……不挾寸刃，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燒，毆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財。……”（“神宗万曆实录”卷三六一，参見教学参考书第190頁），可見紀律是怎样的好。葛賢墓碑記中也有如下記載：“成乃誓于众曰：……有听吾約束者从，否则去。众皆許諾，乃相率入湯莘等家，毀其屋聚其橐而焚之。有窃得一古鼎者，成即縛而杀之。”他們放火燒了税棍的住宅，并包圍了孙隆的衙署。孙隆吓得連夜逃往杭州，不敢回来。

运动进行到初九，沒有一个人違犯紀律，全市市民都很感动，因此参加的越来越多。地方官为了維持他們的封建秩序，要派軍队捕捉参加运动的人。葛賢听說，挺身前往知府衙門說：“运动是我一个人搞的，不許乱捉人，如果那样，会有更大的麻煩。”官方用笞刑拷打他，要他招出更多的人来，他不肯。苏州人民听了十分感动，給他送了許多食物和銀錢，他都分給监獄里同难的朋友。事情报告到皇帝那里，皇帝处他死刑，但暫时沒有执行，可是从此皇帝再也不敢派人到苏州乱收税了。

葛賢在獄中囚禁了十余年，到1613年終于在人民营救下被釋放，1630年他死去。苏州人民在山塘街五人墓旁边給他修了墓地，立了墓碑，至今仍受着苏州市民的崇敬和凭弔。

1601年苏州市民斗爭，在工人們領导之下，运动出現了一个新的場面：有組織，有紀律，斗爭很頑强，領导者葛賢表現了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了一面旗帜。以后有許多次市民运动，都提出学習葛賢的口号。在苏州、昆山、松江等处，都曾有过反乡紳、反貪官的激烈斗爭，取得一定的胜利。

（4）市民斗爭是我国历史上的新現象。

上一課我們学的是明后期商品經济的发展和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矛盾新的斗爭随之爆发，市民已經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一支新起的力量。市民斗爭的目标是反对矿监税监对工商业的掠夺，要求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城市的自由发展。这是反映着正在发展中的市民的要求。（在客观上农民斗爭和市民斗爭是互相呼应的，它們都是針对着同一个封建專制主义政府，但內容有別。假如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只是想維持較固定的小农經济地位，而明末市民斗爭却是要求商品貨幣經济的自由发展。因此說市民斗爭是包含了新的、区別于农民反封建地主斗爭的东西的。——以上一段分析，只供教师自己参考，不一定对学生講。）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已經成为一支反封建斗爭的力量，斗爭中最坚决的是作为无产阶級先驅者的手工业工人。虽然斗爭还在自发阶段，但在反封建中独树一帜，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現象，也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新現象。这在农民对地主的本質矛盾以外又加上了新的矛盾。

（四）东林党反对以宦官为中心的大地主專政

"有吴葛賢之墓"的墓碣是文震孟題的字，他是东林党后期的領袖之一。为什么东林党人会同情市民斗爭，为題墓碣做墓碑記呢？

（1）东林党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反对誰？

土地高度集中，不仅使阶級矛盾尖銳化，也使得統治阶級內部起了分化，引起內部斗爭。

明中期十五世紀三十年代起，貴族大地主專政，这集团包括帝国中最高統治者大貴族、大宦官、大官僚和北方系的大地主豪紳。他們在政治上實行宦官特务專政，压抑其他阶層政治勢力；經济上壟断掠夺。明宦官專横与特务統治，皇庄和庄田的迅速扩張，矿监税使对工商业的压榨，无一不是貴族大地主專政的直接結果。被宦官排斥的大批官僚士大夫，逐漸形成一个在野的政治集团。他們以顧宪成为首（1594年起在无錫东林书院講学，議論朝政），在朝的一部分較正直的官吏也跟他們通声气，人們称他們为"东林党"。东林党代表一般（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东林党人的成份主要是官僚地主士大夫，也有新兴的兼营商业的地主），反对貴族大地主專政，对專政宦官和腐敗官僚互相勾結所形成的集团展开激烈的斗爭。

（2）东林党的主張和反宦官斗爭的性質

政治主張——反对以宦官为中心的貴族大地主專政、壟断政权和排斥其他政治势力，要求地方势力可以参加政权——开放政权；反对压制言論自由。

經济主張——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要求實行有限度的定額税收政策，这些都是代表发展中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农业問題上反对大封建主倚势兼并土地，主張减輕賦役，开垦荒田，規复水利等。

性質——东林党反宦官斗爭的目的是緩和阶級矛盾，維持本阶級（官僚地主）統治，是統治阶級內部的斗爭，是保守与改良两派間的斗爭，是改良性質。

东林党反宦官、反暴政、反对对工商业者的掠夺是符合人民要求的。市民斗爭蓬勃开展时，也就是东林党斗爭最激烈的时候，这不是偶然的現象。东林党同情市民斗爭，也有中小地主出身的中下級官吏参加到斗爭中去。东林党反宦官的斗爭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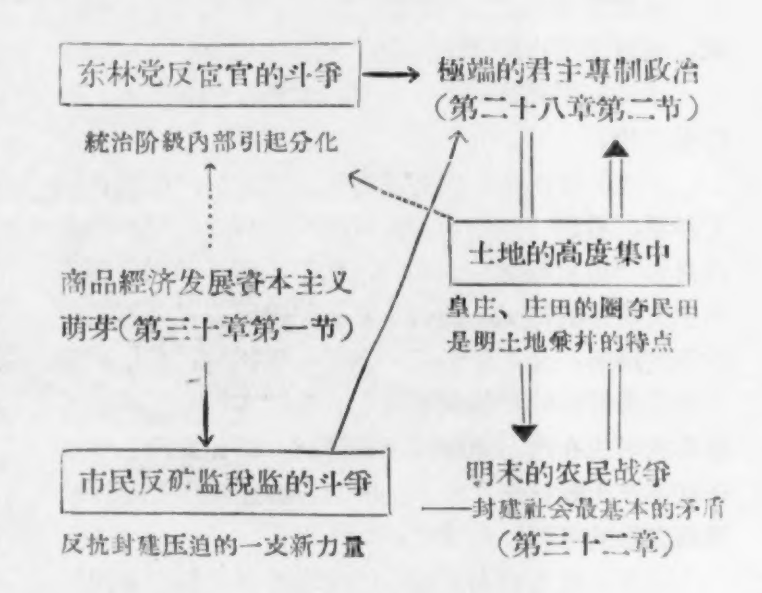
（3）宦官魏忠賢屠杀东林党人

东林党楊漣等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魏忠賢編黑名单屠杀东林党人，著名首領楊漣、左光斗、周順昌（与苏州虎丘"五人之墓"有关）、黃尊素（黃宗羲之父）等被杀害，并公然下令毁东林党在各地講学的书院。但是东林党跟宦官的斗爭并沒有停止。

东林党反对宦官的斗爭是想挽救統治阶級的危机，但是这样一个腐朽的統治已經是无法挽救的了。那时更大的斗爭已在开始，就是再下一課要講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終于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

巩固：为什么說明朝后期的市民斗爭是我国历史上的新現象？东林党人对市民斗爭的态度怎样？为什么？

小結：本节的基本綫索



明代的政权是貴族、宦官、大官僚的联合統治，特别是中期以后，由于他們瘋狂地掠夺土地，形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使統治阶級与农民的矛盾更加尖銳，这是封建社会里最本質的矛盾；正由于政治上的腐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經济的发展和資本主义的萌芽——加强了对城市工商业的剝削，必然激起市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爭，这是中国历史上新的情况，这是在原有的本質矛盾之外，又加上新矛盾。由于这两个矛盾的发展，又促使了代表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的东林党人与以宦官为中心的大地主集团的統治阶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

这三种矛盾和斗爭錯綜复杂地交織着，总的趋势，必然促使封建統治的解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末期，逐漸走向崩潰。

最后，同学們回去复習时，着重考虑以下二句結語：1.明朝專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土地的高度集中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特点。2.市民斗爭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新現象，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新現象。

（課本第103頁"东林党反宦官斗爭"标題下，第一第二两段应該倒置一下。因为顧宪成卒于1613年，魏忠賢專权是在1621年—1627年間，明熹宗的时候。）

附　錄：

（一）用葛賢墓碑拓文作为直观教具的体会

苏州的园林和古迹胜处，藏有碑刻很多，学生們常去游玩，可是很少有人注意碑刻內容。文言文不大

懂固然是原因之一，在平时教师沒有經常联系乡土教材进行教学，也該是原因之一。葛賢墓碑經三百年来的風侵雨蝕，斑点累累，字迹模糊，要不是人民委員会在前年將該墓修葺一过，这碑刻將还是一直在荒草叢中，少人过問。

用葛賢碑的拓片作为直观教具，我自己是初次嘗試，有以下三点粗淺的体会。

（1）用葛墓碑帖作教具，緊密地結合課本，收直观之效。

（2）很多学生到过葛賢墓，也常去离校很近的玄妙观，看到734年“永禁机匠叫歇碑’（見1957年六月号“历史教学”封底），这二塊碑反映明后期資本主义萌芽的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可是不經过教师的講解，是不会引起同学們的重視的，其他碑刻文物也类都如此。我亲眼見过有些游客，包括某些不懂事的学生在內，用磚石磨击碑刻，破坏文物。所以在联系乡土教材进行教学的同时，要讓学生知道保护碑刻文物的重要，加以爱护。

（3）近来有人主張最好能培养学生初步懂得如何使用第一手史料。我以为对高中学生来說，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似嫌过早，但对部分喜爱文史的学生进行課外輔导还是可以这样做的。

由于上課时把葛賢碑記作为直观教具，学生們的兴趣提高了，課后主动地要求教师在課外講五人墓和葛賢墓碑記。我曾这样指导学生：讀墓碑先要知道是什么时代誰写的，先得在来龙去脈时代背景上做到心中有数。例如地主阶級文人陈繼儒撰手工工人葛賢墓碑記，自有其阶級立場的局限。（怎样分析碑文从略）第一手史料的运用要参証其他有关史料知所取舍，讀葛賢墓碑記就該把明神宗万曆实录以及吳县志和其他筆記等书的記載互为参証……。从这里入手使学生初步懂得一些关于运用第一手史料的常識。

（二）葛賢墓碑記

“葛賢墓碑記”过去流傳不广，知者較少，其实是研究資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重要史料之一，堪与“五人墓碑記”、“永禁机匠叫歇碑”并列。茲將原文附录于下。“口口”符号示碑文模糊，一时无法辨認处，姑暂缺其字。

葛將軍墓碑

万曆辛丑內監孙隆私設稅官于江南津渡处，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屬，无不有稅。参随黃建节者，憸夫也，隆昵而任之，乃与市儈湯莘、徐成等謀分鬮断壟。吳人罢市，行路皆哭。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时建节方踞葑关，稅一卖瓜者，其始入城也，已稅数瓜矣，归而易米四升，又稅其一升，泣而反撻之，适成等至，遂共击建节斃之，时六月之六日也。

成乃誓于众曰：“今日之事，为朝廷除民害也，若因以为利，則天下其熟能說之。有听吾約束者从，否則去。”众皆許諾，乃相率入湯莘等家，毁其屋聚其橐而焚之。有窃得一古鼎者，成即縛而杀之。于是义声大震，从者益广。当事聞之，惊口口之以兵口，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鉏奸以至召乱，若反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耳。”乃率僚屬口騎入市，呼諸百姓而慰之，杖湯莘等而系之于獄，众皆悅服。成因請于太守曰：“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遂請就獄。太守曰：“我实不德，以致于斯，尔民何罪，壯士其无辱。”成曰：“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无义則乱，无法亦乱。成固当死，敢逃刑乎？公若不許，請自杀也。”乃自投于阶下，太守不得已而听焉，乃改其名曰賢，誠賢之也。

旣入獄，哭泣送之者万人，其以酒食相餽者，日以千計，辞不获，悉以散于諸囚。四方商賈之慕义者醵百金遺之，坚却不受，曰：“我罪人也，焉用諸！”皆再拜而退，归而尸祝之，祠于江淮之間，称为將軍而不名至于今。因之事聞天子，为罢織璫而并徹諸关之稅，四郡以宁。越十余季，逢肆赦得釋，复为編氓。有新安富商程尙甫者，敬而爱之，贈一艾姬，成笑而納焉。居浹旬，絕不与私，备装遣还其母家再适人。嗚呼！可謂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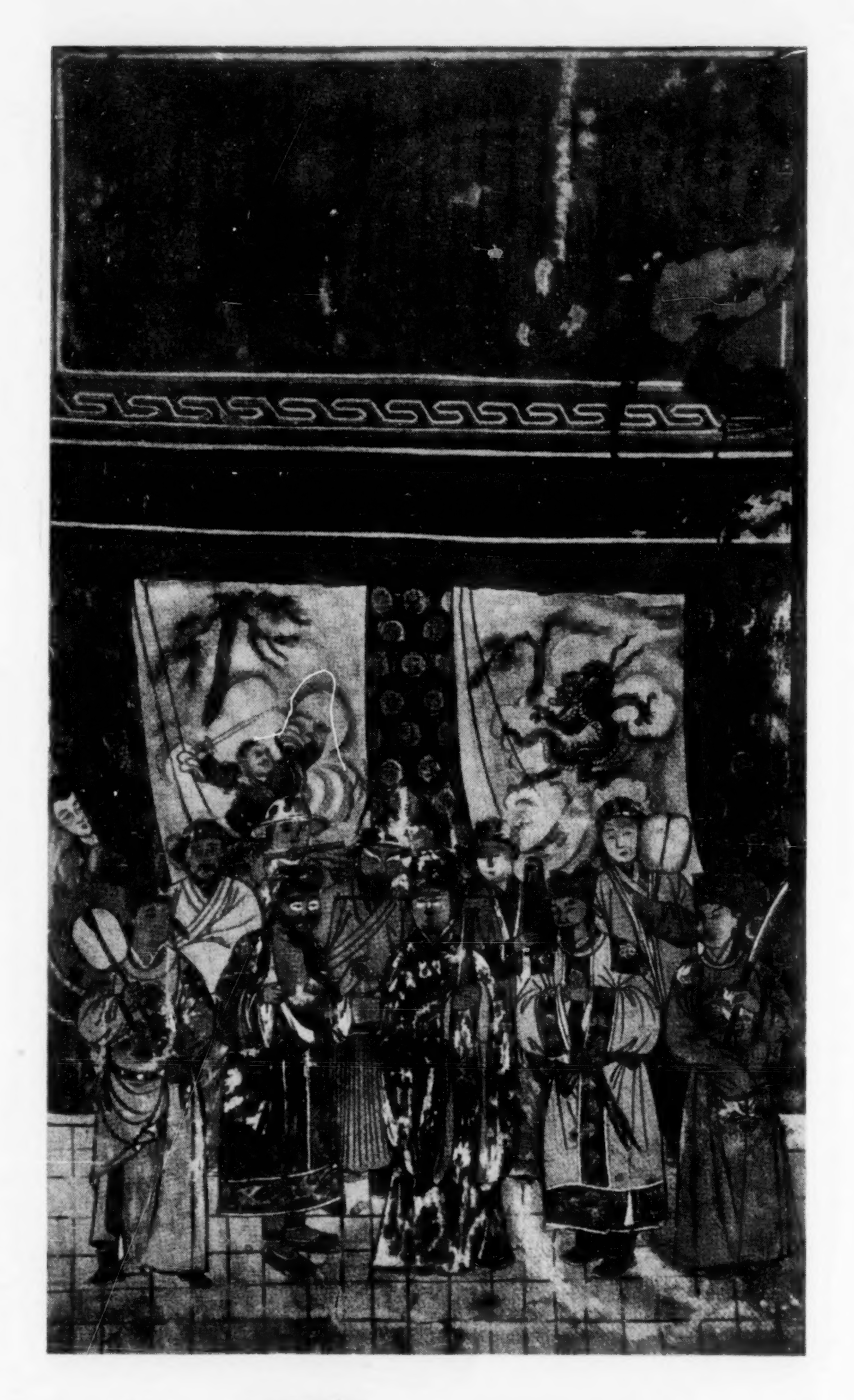
后成又以賢令陈公文瑞事走京师頌寃，朝紳口而交义之，陈即令吳，値周忠介公被逮，五人倡义周旋患难者也。五人死后五季，而始以病終。先是其犹子天民家于五人之墓傍，傍有隙地屬曹，曹甥口文学朱君口士口宋請口于口氏，而口奉將軍葬焉。

五人之葬也，吳太仆公默直书其碑曰“五人之墓”，而張庶常公溥为文記之。今將軍之葬也，文相国公震孟亦做太仆书法而直題曰“有吳葛賢之墓”。余以口人职稗史，不可无一言以志其事实，而即用朱相国公国禎歌詩四句以銘之。五人前死实后勁，將軍后死实前茅，而又得两賢相手筆以不朽，將軍眞足千古矣。將軍生隆庆戊辰九月二十日，殁崇禎庚午十月一十有二日，得季六十有三。銘曰：

吳中义士气如云，留得余生代有聞，东海长虹挂秋月，丹青齐拜葛將軍。

康熙癸丑孟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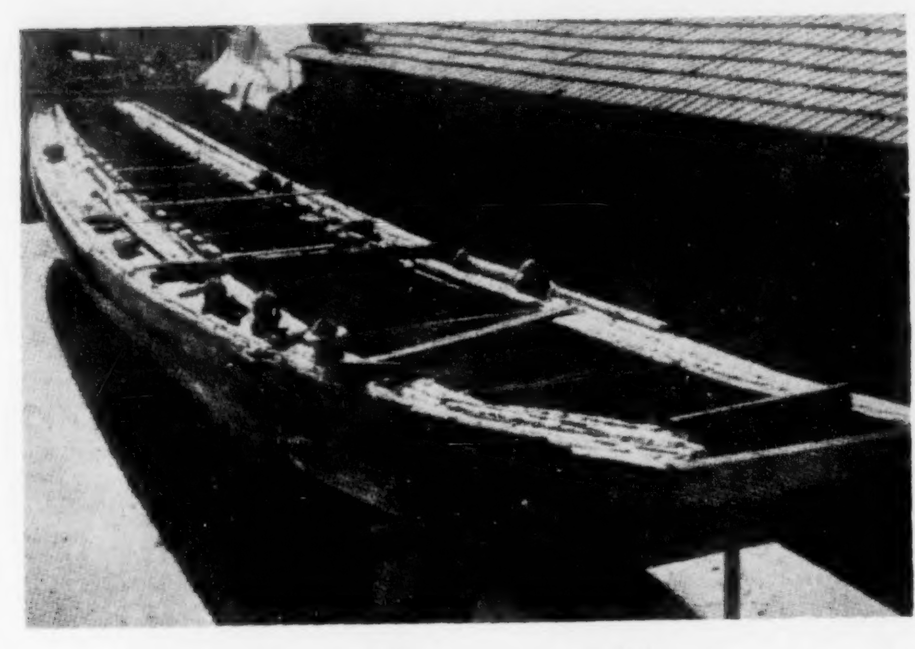
云間陈繼儒撰　古吳周靖书并篆額



圖一　　元代雜劇壁画

1324年画，在山西省洪趙县广 胜寺明应王殿內。演員在前列，化裝和道具（砌末）都很分明，音乐 伴奏在后列，乐器有笛、鼓、拍板等。黎新摹繪，采自“戏曲研究”。

中國歷史参考圖片（四十一）



圖二　　兵船

説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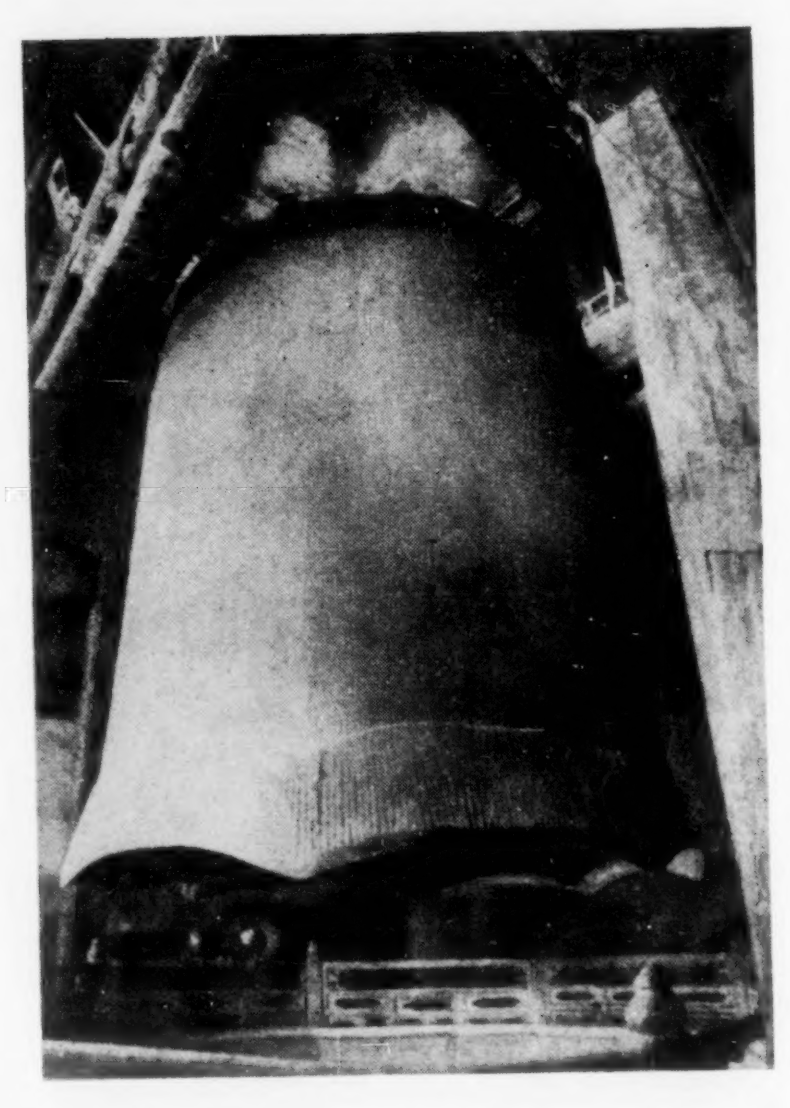
圖二　兵船

山东省梁山縣發現的明初兵器，現在山东博物館，長21.8米，最寬处3.44米，共有13艙。船中遺物很多，內鉄錨一件，有“洪武五年造”（1372年）等字，銅炮一件，有“洪武十年月日造”（1377年）等字。采自“文物参考資料”。

圖三　大鐘

中国的鐘王，在北京西直門外大鐘寺，明永乐（1403—1424）初年用銅鑄成，高7公尺，最大直徑3.67公尺，重42吨。鐘內外鑄着220,000多字的佛經，字迹端正清楚。采自“人民画报”。





圖三　　大鐘

